

2015 年第 1 期

总第 77 期

学科信息参考

A 辑

（经贸、金融、会计、管理、信息）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学科信息参考

2015 年第 1 期 总第 77 期

目 录



主办：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责任编辑：孔凡娟

编辑：
经贸：赵珊珊
金融：唐永辉
工商管理、商务信息：李谋信

制作：艾致
出版日期：
2015 年 3 月 30 日

国 际 贸 易

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基于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 RCEP 的比较研究.....1

产 业 经 济

创意产业与经济结构转型.....8

物 流 管 理

中国商品流通费用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马克思流通费用构成的经验识别.....19

技术经济与管理

NSFC 资助下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投入产出分析.....28

会 计 学

MBA 会计学课程之教学思考.....33

金 融 学

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学》教学思考.....36

企 业 管 理

创新生态系统: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38

统 计 学

服务业统计研究的国际进展与展望.....46

快 讯

1月国际贸易收入2113亿美元 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启用
最新国际标准..... 53

18重点行业年利润超万亿 23部委再布局新兴产业54

第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力推港口物流领域投资合作.....55

中国央行进一步降息空间或正被封杀.....56

中国再度降息凸显经济形势严峻.....59

中国政府准备大规模整合国有企业.....60

破除通缩恐惧论.....62

陈春花:互联网公司生命力不够 传统企业春天来了.....65

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

——基于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 RCEP 的比较研究



1 引言

放眼当今全球经济形势,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在曲折进程中艰难复苏。在此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自2012年以来,国内GDP增速已连续跌破8%,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增大。传统意义上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驱动、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目前都不能担负起驱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重任:因为内需疲软依旧,对经济的刺激和拉动仍然很弱;投资驱动由于产能过剩正面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地调整;出口也面临着复杂多变和持续低迷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局面。此外,“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改革开放红利”等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也在渐失“活力”。因此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暖”,成功打造出经济的“升级版”,需要挖掘新的经济驱动力。

“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是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与会各方代表重点关注在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减速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贸区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可见,自贸区正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一大驱动力。纵观我国自贸区发展史,其始于2002年的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谈判,CAFTA也就成为我国同其他经济体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可见我国自贸区建设谈判起步很晚。但经过十三年的建设努力,我国在建的自贸区已有18个,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与印度、哥伦比亚和斯里兰卡的自贸区建设正进行启动谈判前的准备工作,发展速度较快。

目前对我国自贸区谈判的研究多是从我国与某一经济体的角度出发,对于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的研究亦是如此,相关文献要么只关注中韩自贸区的发展(黄鹏、汪建新,2010; Cho, et al., 2013; Cheong, 2014; 胡渊、杨勇, 2014),要么只研究中日韩自贸区(刘翔峰, 2004; Choi, 2013; Bean, 2013; 徐春祥, 2014),要么只涉及到RCEP (Lewis, 2013; Anuradha, 2013; 赵亮等, 2013; 陈淑梅、倪菊华, 2014)。本文将三者综合起来进行研究,试图探究它们是否能够驱动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具体的驱动情况,并比较驱动力的大小。

2 文献回顾

目前对自贸区的研究在诸多方面展开,大量学者从经济效应角度对自贸区建设进行了分析,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四种。大部分学者都肯定了自贸区建设对成员发展的促进作用。朱颖(2005)认为中澳自贸区的建设将对双方的贸易及投资产生促进作用。Siriwardana 和 Yang(2008)利用 GTAP 模型,在四种假设情景下分析了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的经济效应,认为中澳自贸区将给两国都带来福利增加。Bouet 等(2012)认为亚洲和拉丁美洲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将让几乎全部成员受益,而且拉美相关国家受益更多。Fadeti 等(2014)利用引力模型验证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CU)建设对各成员间农业贸易的促进作用。刘冰和陈淑梅(2014)认为 RCEP 框架下各成员的经济福利都会增加。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自贸区建设对各成员的发展既有利又有弊。Chong 和 Hur(2008)从“轮轴—辐条”结构的视角,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研究了新加坡—美国、新加坡—日本和假设的美国—日本自贸区,认为作为轴心的新加坡受益最大,日本损失更多。Hur 和 Park(2012)认为在双

边自贸区建成后成员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距会不断扩大。刘文革和王文晓(2014)通过 GTAP 模拟发现,建设金砖自贸区能提高各成员经济福利收益,却不利于各成员的产业升级。

少数学者认为自贸区建设对成员发展主要带来消极影响。Don Harpaz(2008)定性研究了以色列与欧盟经济一体化问题,对以色列从中获得潜在收益提出质疑,认为以色列会为一体化付出较高代价。李明权和韩春花(2010)通过对中日韩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发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将导致中日韩自贸区的调整成本偏高。戴臻和魏磊(2013)认为,发展迅速的自贸区建设已经出现诸如贸易成本增加等一系列对各成员经济发展不利的潜在风险。

还有少数学者认为自贸区建设对内部成员经济影响作用不大。蔡鹏鸿(2005)通过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视角,认为东亚双边自贸区合作水平低且福利收益有限。Brown 等(2008)采用 Michigan 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型对美国—SACU 双边自贸区的收益进行研究,认为该自贸区建成后带给美国和 SACU 的收益都很小。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国内外学者对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研究结论莫衷一是,但主流意见认为自贸区建设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尚未见将中国与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RCEP 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文献,也未发现从贸易效应、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三方面进行全面探究的文献,并且鲜有文献明确提出“自贸区驱动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本文的研究试图填补这些空白。

3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和 RCEP 谈判概况及展望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和 RCEP 都是我国极力倡导和推动的周边自贸区谈判,这三大自贸区有着各自的发展概况和谈判前景。

3.1 谈判概况

三大自贸区谈判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成员数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及其他自贸区谈判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情况(见表1)。

表 1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和 RCEP 谈判概况表

	中韩自贸区	中日韩自贸区	RCEP
谈判前的论证阶段	2004 年—2006 年、 2007 年—2010 年	2003 年—2009 年、 2010 年—2012 年	2011 年—2012 年
启动谈判时间	2012 年 5 月	2012 年 11 月	2012 年 11 月
首轮谈判时间	2012 年 5 月	2013 年 3 月	2013 年 5 月
谈判进程	已开展 11 轮谈判	已开展 4 轮谈判	已开展 4 轮谈判
成员经济体	中国、韩国	中国、日本和韩国	东盟、中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涉及议题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以及知识产权等领域	货物贸易的降税模式、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方式、协定的范围和领域等议题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
争取结束谈判时间	2014 年	尚无时间表	2015 年
2013 年经济总量	10.4 万亿美元	15.3 万亿美元	21.27 万亿美元
占 2013 年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	14.06%	20.69%	28.7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中国商务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根据表1 可知,中韩、中日韩自贸区在宣布启动谈判之前的学术论证和官产学联合研究比较充分;相比之下,RCEP 从概念提出到正式宣布启动谈判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覆盖成员最多的RCEP 有如此快的启动速度主要是受到同处亚太的TPP 谈判刺激的影响。中韩自贸区谈判启动时间最早、进程最快、谈判最顺利,至今已经开展了11 轮谈判,双方争取在2014年结束谈判。相比之下,启动谈判后的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 进展都较缓慢,均仅开展了4轮谈判,RCEP 的第5 轮谈判即将在新加坡举行并争

取在 2015 年内结束所有谈判,但中日韩的下一轮谈判及达成协议时间尚无明确时间表。在谈判内容方面,三者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的经贸领域的合作为主,非经贸领域的议题涉及较少。在经济总量方面,三者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建成后的中韩自贸区 GDP 总量有望占全球总量的 $1/7$;建成后的中日韩自贸区 GDP 总量有望占超过全球 $1/5$ 的总量;建成后 RCEP 的 GDP 总量有望占全球总量的三成,并且 RCEP 的 GDP 总量已远超同期欧盟的 17.37 万亿美元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 19.88 万亿美元的总量。

3.2 谈判展望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和 RCEP 谈判具备“地利”、“天时”的特征,但在“人和”方面相对欠缺。首先,三者的成员基本都地处亚洲尤其是集中在东亚,地理位置较近,各成员之间相互毗邻,谈判具有“地利”优势;三者正式启动谈判的时间都处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寒冬”大背景下,各经济体的 GDP 增长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均渴望“抱团取暖”、优势互补及扩大市场规模来提振自身经济,这使得三大谈判符合“天时”的特点。在“人和”方面,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政治因素和岛屿领海等争端,部分主要成员之间纠纷不断,导致谈判断断续续,影响谈判前景,所以“人和”不足。

具体来讲,在三大谈判中,中韩谈判建成的可能性最大,中韩两国都在积极努力地推动自贸区谈判,我国就明确表示愿意与韩国建成自贸区,而且我国近期内的自贸区谈判重点就包括中韩自贸区;韩国在与欧盟、美国和东盟等经济体建成自贸区后,目前也在集中力量与我国开展自贸区谈判。此外在三大谈判中,中韩自贸区是最早启动谈判和谈判进程最快的自贸区,谈判前景最为明朗。再看中日韩自贸区,由于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岛屿争端,受到这些问题的干扰,谈判在步履维艰中前进,尽管参与方都希望能够建成自贸区来享受自贸区红利,但历史遗留问题、岛屿纠纷等始终在困扰着这一谈判,谈判前景最不明朗。RCEP 在三大谈判中参与方最多,覆盖 7 大经济体共 16 个成员,各成员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迥异,各自都有自己的敏感产业部门及利益诉求,而且部分成员之间也存在政治纠纷及岛屿、领海争端,未来的谈判任重道远。但 RCEP 有领导轴心——东盟,并且在 TPP 谈判的刺激下(邹国勇、杨灵一, 2014),东盟及中国正在积极地推动这一谈判,谈判前景依然可期。

总之,中韩自贸区若建成将会给中日韩自贸区和 RCEP 的谈判奠定坚实基础,而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成功与否又直接关系到 RCEP 的谈判质量。尽管三者的谈判过程会曲折不一,谈判前景近期内也不一致,但最终都会达成协议的结果预计是一样的。

4 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基础

自贸区理论根植于关税同盟理论,罗布森(2001)提出的专门研究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理论就是在关税同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类型的划分中,自贸区是比关税同盟更低一级的形态。

罗布森指出,自贸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自贸区内部各成员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但保留各自不同的海关税收政策,即不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在自贸区内切实遵守原产地规则,自贸区内原产地规则是指要在自贸区内进行自由贸易的商品必须是全部或主要部分原产自各成员内部的商品。这两个特点是自贸区有别于包括关税同盟在内的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类型的主要特点。

我们采用罗布森自贸区理论中的两国模型来探究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

假定 A、B 两个经济体对商品的需求情况较一致,在经济体 A 内的单位商品劳动生产率低于经济体 B 的单位商品劳动生产率,因此 A 的商品价格 P_1 会高于 B 的商品价格 P_2 。另假定 B 的商品供给曲线弹性大于 A 的商品供给曲线,因此供给曲线 S_B 较 S_A 会平缓一些。价格 P_3 表示同种商品的世界价格,假定 P_3 低于

P_1 和 P_2 。此外, A对进口的单位商品征收 P_1P_3 大小的关税。

由图1和图2可知, 经济体A、B在建成自贸区之前, A在价格 P_1 下对商品的需求量为 OQ_3 , 供给量为 OQ_2 , 供需缺口 OQ_3Q_2 会以价格 P_3 从世界价格最低的其他经济体进口($P_2+P_1P_3 > P_3 + P_1P_3$, 故排除从B 进口的可能); B在价格 P_2 下对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达到平衡, 数量均为 OQ_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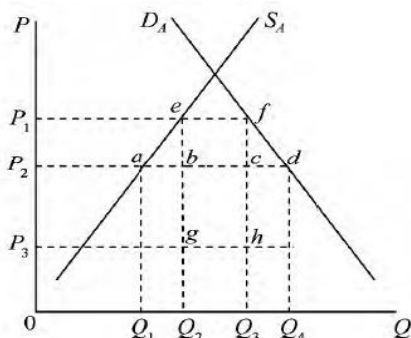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体A的商品供需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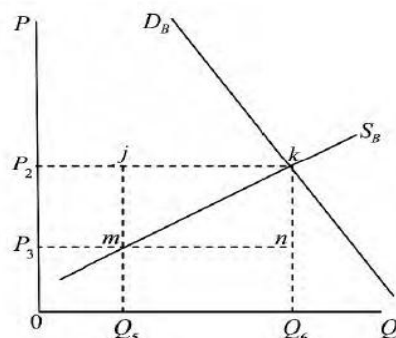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体B的商品供需情况

A、B建成自贸区后, 在自贸区内, A 不会向从B 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 此时 $P_3 + P_1P_3 > P_2$, 因此A将向B进口商品, B 将以低于 P_1 的价格 P_2 为A 提供其供求短缺的商品数量 OQ_1Q_4 , 此时在经济体A 内部会产生有利于A 福利提高的贸易创造效应和会降低A 福利水平的贸易

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如图1中三角形abe 和三角形cdf 代表的面积之和, 贸易转移效应的大小为四边形bcgh 的面积, 经济体A 能否从与B 建立的自贸区中获取经济收益取决于三角形abe、cdf 的面积之和与四边形bcgh 面积的大小。

假定 OQ_1Q_4 与B 中的数量 OQ_5Q_6 相等, 那么B 在将商品出口给A 后为了满足自身对商品的需求数量, 将会以 P_3 的价格从自贸区外的世界其他经济体进口 OQ_5Q_6 数量的商品。在此过程中, 由于B 保持对自贸区外的进口关税不变, 因此B 进口商品将获得海关征税收入, 收入大小如图2 中四边形jkmn 的面积。因此, B 与A 建成自贸区后B 的经济效应为正, 会获得额外的经济收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 组建自贸区后, 将更加有利于劳动生产效率更高、商品价格更低的经济体, 其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会增加, 而对于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的经济体, 其福利水平是否得到提高将取决于由建立自贸区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大小比较。总体来讲, 自贸区能否驱动各成员获取经济收益的情况是不一致的, 但整体的情况是乐观的。

5 实证研究

我们采用GTAP 模型对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 建成后对经济的影响情况进行模拟分析。GTAP 中文含义为全球贸易分析项目, 它是由Purdue University 推出的一种多区域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 主要功能是用来分析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效果及影响, 是一种事前预测分析的方法。

研究使用的GTAP 数据库为GTAP8.01 版本的数据库, 使用的数据以2007 年为基期, 覆盖134 个国家/地区和57个产业部门。模拟分析软件是RunGTAP3.59。采用标准的闭合法则, 求解方法为Gragg2-4-6外推法以提高模拟精度。根据研究需要, 需利用GTAPAgg(2007)将134 个国家/地区和57 个产业部门分别进行汇总分组。

5.1 情景模拟设定

尽管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 建设的终极目标是要取消所有出口商品的关税壁垒, 但

是考虑到谈判的难度和各方对各自敏感行业部门的保护力度,以及秉持逐步取消关税壁垒的谈判原则,故一开始就要求谈判各方之间彻底取消关税的可能性微小。另外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假设三大自贸区谈判的参与方相互之间关税平均削减幅度均为50%,同时选取进口关税税率(TMS)作为冲击变量(模拟情景分类见表2)。

表 2 模拟情景分类			
模拟情景	中韩自贸区	中日韩自贸区	RCEP
情景一	建成	未建成	未建成
情景二	建成	建成	未建成
情景三	建成	建成	建成

模拟情景一表示只有中韩自贸区建成,而中日韩自贸区 and RCEP 未建成;情景二表示中日韩自贸区建成,由于中韩自贸区建成是中日韩自贸区建成的基础,并且考虑到中韩自贸区的谈判进度和前景,因此在情景二下默认中韩自贸区已建成;情景三表示RCEP 建成,由于本文假设三大自贸区关税平均削减幅度均为50%,因此在情景三下默认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已建成。

5.2 模拟结果分析

这里主要从贸易效应、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GTAP 模拟这三种效应以分析“自贸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

(1)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 的贸易效应

贸易效应是通过分析在三种情景下对各参与方尤其是我国的进口总量、出口总量、贸易余额及贸易条件的影响情况,得出研究结论(见表3)。

表 3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 RCEP 贸易效应的模拟结果

	进口总量变动率(%)			出口总量变动率(%)			贸易余额变动量 (百万美元)			贸易条件变动率(%)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中国	0.67	1.59	2.41	0.49	1.24	1.82	26 650	25 751	25 446	-0.003	-0.087	-0.056
日本	-0.12	1.86	2.98	-0.02	0.7	1.22	8 688	4 859	3 318	-0.049	0.569	0.86
韩国	1.96	2.29	2.92	1	1.39	1.61	1 961	1 433	717	0.457	0.265	0.46
印度	-0.03	-0.07	3.58	-0.01	-0.01	4.64	-5 794	-5 674	-7 012	-0.012	-0.034	-0.616
澳大利亚	-0.05	-0.15	3.25	-0.01	0.01	1.33	-522	-403	-2 294	-0.027	-0.081	1.081
新西兰	-0.07	-0.18	1.37	0	0.02	0.78	70	91	-32	-0.058	-0.124	0.31
东盟	-0.09	-0.26	1.59	-0.04	-0.09	1.08	15 422	15 495	13 269	-0.035	-0.113	0.011
NAFTA	-0.04	-0.11	-0.27	-0.01	0.01	0	-78 753	-76 499	-72 683	-0.016	-0.048	-0.115
欧盟	-0.01	-0.03	-0.1	0	0.02	0.02	-11 929	-10 039	-7 043	-0.005	-0.014	-0.035
全球其他经济体	-0.05	-0.14	-0.33	-0.02	-0.03	-0.07	44 208	44 986	46 315	-0.02	-0.05	-0.142

根据表3,整体来看无论是何种情景,缔结自贸区基本都会驱动各成员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非成员的对外贸易发展将受到抑制,即产生外部不经济。具体来看,不论是何种情境下,自贸区建成后都将会驱动各成员进口贸易总量和出口贸易总量的提高,而且自贸区的成员数量越多、开放市场规模越大,各成员的进口总量和出口总量变动率数值就越大。除RCEP 建成后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贸易余额为负,表明是贸易逆差外,其余的RCEP 成员以及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各成员的贸易余额均为正数,表明是贸易顺差,有利于经济状况改善。观察贸易条件指标,在RCEP 建成后,除印度的贸易条件恶化幅度较大,数值为-0.616%外,其余各自自贸区成员的贸易条件均将得到改善或轻微恶化。

重点分析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 建成后对我国产生的贸易效应。总体上观察,无论是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还是RCEP 建成后,都将驱动我国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产生积极的贸

易效应。从进口和出口总量变动率指标来看,自贸区的参与方越多对我国进口总量和出口总量的驱动作用就越大,具体来讲,当只与韩国建成自贸区后,我国进口总量会提高0.67%,出口总量会提高0.49%;当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我国进口和出口总量分别会提高1.59%和1.24%,比中韩自贸区提高0.92个百分点和0.75个百分点;当RCEP建成后,我国进口和出口总量分别会提高2.41%和1.82%,比中韩自贸区提高0.82个百分点和0.58个百分点,比中韩自贸区提高1.74个百分点和1.33个百分点。另外还可发现,无论在何种情境下,进口总量提高的百分比一直大于出口总量提高的百分比,同时在三种情景下我国的贸易余额均呈现贸易顺差,顺差额度分别为26 650 百万美元、25 751 百万美元和25 446 百万美元,顺差的数额呈下降趋势,这与前面提到的进口总量提高的百分比一直高于出口总量提高的百分比有关。从贸易条件指标来看,无论是何种情景,我国的贸易条件都出现轻微恶化,恶化幅度分别为0.003%、0.087%和0.056%,贸易条件一直恶化,但恶化幅度均控制在0.09%以下,这表明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建成后,总体上我国单位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单位进口商品的价格是下降的。

(2)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 的经济效应

经济效应主要从生产资料变动率、资本存量变动率和GDP 总量指数变动率三方面进行探究(结果见表4)。

表 4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 RCEP 经济效应的模拟结果

	生产资料总量变动率(%)			资本存量变动率(%)			GDP 总量指数变动率(%)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中国	0.069	0.167	0.255	0.01	0.025	0.039	0.005	0.03	0.062
日本	-0.044	0.424	0.622	-0.003	0.026	0.039	-0.001	0.012	0.028
韩国	0.776	0.887	1.264	0.07	0.08	0.114	0.084	0.091	0.22
印度	-0.009	-0.034	0.561	-0.001	-0.005	0.081	-0.001	-0.004	0.32
澳大利亚	-0.019	-0.081	0.978	-0.002	-0.008	0.095	-0.001	-0.006	0.068
新西兰	-0.034	-0.12	0.433	-0.003	-0.01	0.037	-0.002	-0.007	0.033
东盟	-0.061	-0.22	0.938	-0.005	-0.019	0.079	-0.003	-0.016	0.078
NAFTA	-0.017	-0.069	-0.159	-0.001	-0.006	-0.013	0	-0.001	-0.002
欧盟	-0.015	-0.062	-0.139	-0.001	-0.004	-0.01	-0.001	-0.002	-0.004
全球其他经济体	-0.027	-0.091	-0.204	-0.002	-0.008	-0.017	-0.002	-0.005	-0.007

由表4 可知,总体上观察,无论是何种情景下,自贸区建成后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变动率、资本存量变动率和GDP 总量指数变动率都是正数,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会给各成员带来积极的经济效应,而非自贸区成员的三种衡量指标都是负数,表明自贸区建成后将对非成员产生外部不经济。此外,从情景一到情景三,随着自贸区成员数目的增多,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三项衡量指标的数值呈现逐步增大,而NAFTA、欧盟及全球其他经济体等非成员的三项指标的数值都是越来越小。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 谈判若成功达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经济驱动效应非常明显,其中,中韩自贸区会驱动我国的生产资料总量提高0.069%,资本存量提高0.01%,GDP 总量指数提高0.005%; 中日韩自贸区会进一步驱动我国生产资料、资本存量和GDP 总量指数的提高,提高百分比分别为0.167%、0.025%和0.03%,比中韩自贸区分别提高0.098个百分点、0.015个百分点和0.025个百分点; RCEP 对我国三项指标的驱动作用最大,生产资料、资本存量和GDP 总量指数的增幅数值分别为0.255%、0.039%和0.062%。由此可知,三大自贸区建成后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明显,我国将从这三大自贸区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这会有效地缓解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减速和下行压力的现状。

(3)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 的福利效应

福利效应的衡量指标是代表全社会总体收入的福利变动量，通过模拟三大自贸区建成后带给各经济体的福利变动来判断对各成员的福利影响情况(结果见表5)。

表 5 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 RCEP 福利效应的模拟结果

	福利变动量(百万美元)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中国	271	459	2 161
日本	-365	4 589	7 464
韩国	2 727	2 027	4 200
印度	-43	-124	2 057
澳大利亚	-49	-181	2 485
新西兰	-22	-51	157
东盟	-305	-1 070	1 467
NAFTA	-467	-1 407	-3 205
欧盟	-356	-997	-2 462
全球其他经济体	-766	-1 913	-4 829

通过表5 中数据可以发现，三种情境下产生的福利效应，与三种情境下带来的贸易效应、经济效应，在结论方面基本一致，即在三种情景下都会提高各成员的福利水平，各成员的全社会总体收入都会增加，而且从情景一到情景三，各成员的福利增量基本呈上升趋势；而非成员的福利水平会下降，并且下降幅度越来越大。

观察三种情境下自贸区建设对我国福利水平造成的具体影响，可以发现与我国建成自贸区的经济体数量越多、自贸区的市场规模越大带给我国的福利增量也就越大，全社会总体收入也就会不断提高。当中韩自贸区建成后，我国全社会总体收入会增加271 百万美元；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我国全社会总体收入会增加459 百万美元，比中韩自贸区提高188 百万美元；RCEP 建成后，我国全社会总体收入会增加2 161 百万美元，比中日韩自贸区增加1702 百万美元，比中韩自贸区增加1 890 百万美元。总之，无论是何种情境下，自贸区建成后都会增加我国全社会的总体收入，提高我国的福利水平，同时，参与自贸区的成员数目与我国福利水平的高低呈显著正比关系。

6 研究总结及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 若建成都将会驱动各成员的经济增长，带给各成员积极的贸易效应、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同时对非成员产生外部不经济，抑制非成员的贸易发展、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对我国，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与RCEP 都能起到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驱动力大小不同，三者当中，首推RCEP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最大，中日韩自贸区的驱动力次之，中韩自贸区的驱动力最小。由此可见，规模越大、市场越大、参与方越多的自贸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等就更大，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就越大。或许由此经济方面原因的考虑，目前我国认为能够为我国提供更大自贸区“舞台”的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时机已经成熟，提出要积极推进FTAAP 建设。

自贸区驱动经济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既然自贸区驱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利，那么为让“自贸区驱动”能够发挥驱动力的最大效能，国家决策部门首先要加大对自贸区建设的重视力度，从顶层设计自贸区发展战略，做好整体规划。其次要坚持以周边自贸区谈判为主的发展方针，切实做好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东亚地区的自贸区谈判，并以周边自贸区的谈判为基础，加大与其他洲际经济体的自贸区合作。此外，在对外实行自贸区驱动政策的同时，对内积极推进上海自贸园区等的建设，通过自贸区驱动与自贸园区驱动“双轮驱动”的模式，共同驱动我国经济“升级版”的建设。

作者：赵亮 陈淑梅

来源：《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创意产业与经济结构转型



1 引言

经济结构转型是现代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趋势，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与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所解释的Kaldor 事实不同，当前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呈现出不平衡增长的特点，即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产值比重逐渐下降，工业部门占比先上升后下降，而服务业占比则逐渐上升。研究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尤其是对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认识。关于结构转型的解释，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需求偏好，由于农产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产品供给结构的变化，最终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即三次产业的不平衡增长；二是技术因素，强调各产业不同的技术进步率导致的不平衡增长和结构变化。随着创意产业的出现，其全新的增长方式、产业间的融合程度以及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不仅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经济结构转型带来了新的推动力。

创意产业由概念形成至今已有近二十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通过创意或知识而非仅靠劳动力或资本来创造财富的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经济振兴和迅猛发展的重要方向，是继高新技术产业后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增长点。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极高的附加值，是一个“引擎”产业，在技术、知识产权、专利制度、金融服务等发展条件的支撑下，以居于价值链高端的地位渗透到所有产业，并决定着生产过程的利润分配。同时，创意产业包含的专业领域十分广泛，与高科技产业、文化艺术产业等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具有产业融合的特点。它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互融合，为产业发展提供新路径和新价值，从而开启一个完全由创意主导的价值链。近年来，创意产业迅猛发展，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UNCTAD）的统计表明，在2003~2012 年的10 年间，创意产品贸易额以8.68%的增幅高速扩张。同时，我国政府于2009 年通过了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规划指出要加快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确立其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把推进文化体制创新，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作为十六项主要改革决定之一。可见，作为经济转型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创意产业也受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目前已有关于创意产业特征和增长机制的研究，但关于创意产业与结构转型相互关系的文献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将尝试对该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通过构建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模型，本文分析了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机理，并采用2003~2012年237 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意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可持续的正向影响，而且各类细分创意产业部门对结构转型影响的程度也具有差异性。这不仅可以丰富和拓展有关创意产业以及结构转型的研究范畴，而且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深入研究创意产业与经济结构的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论述，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需求偏好和技术层面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从需求偏好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通常是以恩格尔定律的非位似效用函数为基础。Echevarria (1997) 指出，当偏好的非一致性随时间逐渐衰减为一致性偏好时，结构转型过程停止，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经济增

长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最终实现稳定增长。Kongsamut 等 (2001) 将结构转型的经验规律总结为“Kuznets 事实”, 并提出了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即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 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份额下降, 服务业部门的份额相应上升而工业部门则保持不变。Foellmi 和 Zweimüller (2006) 将非位似偏好 (异质性偏好) 引入基于创新视角的增长模型,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各种产品的消费量不平等如何引起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变化, 即引起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国内学者陈晓光和龚六堂 (2005) 构建了一个三部门、两产品的经济增长模型, 得出不同商品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别导致经济内部结构变化 (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变化) 的结论。

从技术层面考察结构转型的文献则认为, 不同产业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导致了经济结构发生变化。Baumol (1967) 最早提出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他把经济分为技术进步部门和非技术进步部门, 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不同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下的情况, 得出了产业间不平衡增长的结论。之后, Baumol 等 (1985) 对美国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进行了测算, 发现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显著高于工业部门, 从而为其理论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Ngai 和 Pissarides (2005) 构建一个多部门模型, 对 Baumol 的研究结论做了更加严格的论证和进一步拓展, 将经济结构变化最终归结于各部门的生产技术增长率的不同。Buera 和 Kaboski (2009) 详细分析和讨论了导致经济结构变化的偏好原因和技术原因。陈体标 (2007) 则从生产技术角度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 将经济分为最终部门和多个中间部门, 由于各中间部门的技术增长率不同而导致各中间部门之间要素流动和产值相对份额发生变动, 最终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王勋和 Anders Johansson (2013) 从制度扭曲的角度研究结构转型, 通过构建金融抑制和非平衡的结构转型理论模型, 发现金融扭曲政策通过抑制服务业, 保护和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发展, 从而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

纵观已有文献, 关于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 大多文献都集中在探讨这一新兴产业的特点、价值创造的模式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等方面。创意产业是基于创造力而形成的产业, 具有原创性、文化价值和体验效用等主要特征。褚劲风 (2005) 认为, 创意产业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数字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 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 跨越多个行业、渗透诸多行业, 在企业组织形式上呈现小型化, 空间分布上出现集聚化的特征与趋势。韩顺法 (2010) 研究指出了创意产业的特点和价值创造方式, 创意产业具有高渗透性, 可以和其他产业紧密结合, 带来高额附加值与垄断利润, 且其规模报酬递增, 创意产品的边际成本低, 平均成本会随产量上升而下降, 同时创意产业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外溢性特点。关于创意产业发展与人才的关系, Florid (2002) 提出“创意资本说”, 认为创意产业的发展, 使一个地区具有创造性、多样性和容忍度, 进而会吸引创意人才, 从创意产业和区域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阐述创意产业与经济的关系。李振华 (2008) 对上海市创意阶层休闲消费的实证研究发现, 在上海从事创意产业的人群中, 最高学历为本科的比例为 81.5%、硕士占比 17.3%、博士占比 1.2%, 这表明创意产业对人力资本有更高的要求, 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对于创意产业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Hall (2000) 认为, 创意产业将艺术与科技相结合而产生出一个新行业和新市场, 如当年硅谷一样, 必将推动经济发展。韩顺法和郭新茹 (2012) 采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 实证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 文化创意产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厉无畏 (2012) 指出, 创意产业强调创意和创新, 要求把文化技术、产品 (服务) 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 它不仅能为人们提供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从而有效刺激内需, 形成新的消费市场; 而且还可以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产业创新和结构优化, 有效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中对创意产业的讨论, 进一步探讨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三次产业的不平衡性作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 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得到了其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结论。

3 创意产业与结构转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借鉴 Ngai 和Pissarides (2005) 的做法, 本文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均衡同时实现的情况下, 通过效用函数来分析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为简化分析, 设立基本假设如下: (1) 资本为唯一的生产要素投入; (2) 各部门产出的资本弹性相同; (3) 市场只存在两种产品, 分别由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生产, 生产服从C-D 生产函数形式; (4) 产品市场是出清的; (5) 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 (6) 市场只存在一个消费者, 并用其代表社会总需求。基于以上假设, 构造不变替代弹性 (CES) 效用函数为:

$$U = \left(\phi_1 Y_1^{(\varepsilon-1)/\varepsilon} + \phi_2 Y_2^{(\varepsilon-1)/\varepsilon} \right)^{\varepsilon/(\varepsilon-1)} \quad (1)$$

其中, 下标1代表制造业部门, 2 代表服务业部门; ϕ_i 表示各部门产品对效用的贡献比率; $\phi_i > 0$ 且 $\phi_1 + \phi_2 = 1$; ε 为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 若两部门产品为互补关系则 $\varepsilon < 1$, 若为替代关系则 $\varepsilon > 1$; 若 $\varepsilon = 1$ 则效用函数退变为C-D 形式, 当两产品为完全替代关系时, $\varepsilon \rightarrow \infty$, 效用函数退变为直线。

在给定效用水平 U_0 与禀赋水平 (Y_1^* , Y_2^*) 下, 服务部门和制造部门产品的边际替代率为:

$$MRS_{21} = \frac{\Delta Y_1}{\Delta Y_2} = - \frac{MU_2}{MU_1} = - \frac{\partial U / \partial Y_2}{\partial U / \partial Y_1} \bigg|_{(Y_1, Y_2) = (Y_1^*, Y_2^*)} = -(\phi_2 / \phi_1) (Y_1^* / Y_2^*)^{1/\varepsilon} \quad (2)$$

由上式可知, 在给定禀赋水平下, MRS_{21} 的绝对值与 ϕ_2 / ϕ_1 成正比。同时, 边际替代率 MRS_{21} 的绝对值也表示在同样效用水平下, 为了获得新增的一单位服务部门产品, 消费者愿意放弃制造部门产品的数量, 因而与需求偏好密切相关。考虑到创意产业发展会影响居民需求偏好, 所以其与边际替代率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定义此关系如下:

$$MRS_{21} = -\Phi(C) = -(\phi_2 / \phi_1) (Y_1^* / Y_2^*)^{1/\varepsilon} \quad (3)$$

其中, C 表示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 函数关系 Φ 将在后文中具体讨论。

因为只考虑资本要素投入, 所以各部门的生产按照C-D 生产函数构造如下:

$$Y_i = A_i K_i^\alpha, \quad i=1,2 \quad (4)$$

其中, α 为产出的资本弹性, 且 $0 < \alpha < 1$; A_i 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对知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要素的直接测度, 而创意产业发展会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这些要素, 所以, 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 定义该函数关系如下:

$$A_i = A_i^* C^{\beta_i}, \quad i=1,2 \quad (5)$$

其中, A_i^* 涵盖除创意产业外其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因为本文主要分析创意产业的影响, 故认为 A_i^* 为常值; β_i 度量了创意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 (5) 式带入 (4) 式可得:

$$Y_i = A_i^* C^{\beta_i} K_i^\alpha, \quad i=1,2 \quad (6)$$

那么, 效用函数在预算约束下的最大化条件为:

$$\begin{aligned} \text{Max } U &= \left(\phi_1 Y_1^{(\varepsilon-1)/\varepsilon} + \phi_2 Y_2^{(\varepsilon-1)/\varepsilon} \right)^{\varepsilon/(\varepsilon-1)}, \\ \text{s.t. } I &= P_1 Y_1 + P_2 Y_2 \end{aligned} \quad (7)$$

其中, P_i 表示各部门的产品价格, I 表示消费者收入。之后通过构造拉格朗日方程求解 (7) 式

而得到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均衡条件, 经整理后为:

$$Y_2/Y_1 = (\varphi_2 P_1 / \varphi_1 P_2)^\varepsilon \quad (8)$$

将 (6) 式生产函数代入 (8) 式的消费者均衡条件中, 得到:

$$\frac{Y_2}{Y_1} = \frac{A_2^* C^{\beta_2} K_2^\alpha}{A_1^* C^{\beta_1} K_1^\alpha} = C^{\beta_2 - \beta_1} \frac{K_2^\alpha}{K_1^\alpha} = (\varphi_2 P_1 / \varphi_1 P_2)^\varepsilon \quad (9)$$

由于各部门的生产都遵循利润最大化的要求, 因此, 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成本, 而上文假定在模型中只有资本要素投入, 且要素市场完全竞争, 所以均衡状态下的要素成本即为市场利率 r , 得到下式:

$$r = VMP = P_i \alpha A_i^* C^{\beta_i} K_i^{\alpha-1} \quad (10)$$

根据 (10) 式可进一步得到:

$$\frac{P_1}{P_2} = C^{\beta_2 - \beta_1} \frac{A_2^* K_2^{\alpha-1}}{A_1^* K_1^{\alpha-1}} \quad (11)$$

继而将 (11) 式代入 (9) 式整理后得到:

$$(K_2/K_1)^{\alpha+(1-\alpha)\varepsilon} = (C^{\beta_2 - \beta_1})^{\varepsilon-1} (A_2^*/A_1^*)^{\varepsilon-1} \Phi(C)^\varepsilon (Y_2^*/Y_1^*) \quad (12)$$

通过对 (9) 式取对数和一阶全微分, 可得:

$$(\alpha + \varepsilon - \alpha\varepsilon) (dK_2/K_2 - dK_1/K_1) = (\varepsilon-1)(\beta_2 - \beta_1) dC/C + \varepsilon \frac{\dot{\Phi}(C)}{\Phi(C)} dC \quad (13)$$

该式即为消费均衡和生产均衡同时达到情况下的一般条件。在该等式的左端, 因为 $0 < \alpha < 1$ 和 $\varepsilon > 0$, 所以有 $\alpha + \varepsilon - \alpha\varepsilon > 0$ 成立。下面本文将详细讨论该等式右端的各项对上述均衡条件的影响作用。

首先, 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产品替代弹性 ε 的大小, 在经济体结构转型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具有不同的结论。处于转型初期、中期的经济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 所拥有的产品与服务较少, 因而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较大, 且对价格比较敏感, 所以一旦价格出现较小变化就会引起产品和服务需求的较大变动, 即替代弹性 ε 大于 1。而处于转型末期的经济体则一般都是发达国家, 其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对价格变化不敏感, 且对服务的需求会大于产品需求, 因此, 两者的替代性较低, 即替代弹性 ε 小于 1。Ngai 和 Pissarides (2005) 根据处于转型末期的美国历史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美国各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为 0.33。而张为付 (2007) 通过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第一、二产业 (贸易部门) 和第三产业 (非贸易部门) 的替代弹性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 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产品综合价格指数相关系数竟高达 0.9496, 表明两者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 而且测算出我国非贸易部门对贸易部门的替代弹性均值约为 4。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转型过程中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所以主要研究对象应是处于转型初期和中期的经济体, 而这些经济体与目前我国所处的转型时期类似, 所以其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品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 即 $\varepsilon > 1$ 。

其次, 创意产业的知识外溢作用会显著影响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且影响大小具有差异性。创意产业具有明显的双向知识外溢性, 创意的生产依托于知识与文化, 在数字时代, 知识文化的传播成本极低而速度极快, 这使得好创意很容易被模仿和改进。同时, 创意部门也可以从周边的环境中获得创新灵感, 这种相互作用会促使创意产业通过知识外溢提升社会知识水平。相比于制造业, 对创意和知识依赖性更强的服务业更会因为社会知识水平的提升而受益, 最终使得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更为明显的提高。此外, 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会提升劳动力素质。创意产业对知识和创意的巨大需求会吸引大量教育与研发投入, 这些投入会促进居民教育水平提高, 从而能够提供更多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 创意产业通过提供大量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的产品, 不仅满足了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也能够提升居民的文化修养以及对知识的尊重和渴望程度,间接促进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而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更为强烈,因此,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会给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第一个结论:创意产业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即 $\beta_1 > 0$, 并且服务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的促进作用比制造部门更显著,即 $\beta_2 > \beta_1$ 。随着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表征其水平的变量 C 也会随之增长,即 $dC/C > 0$ 。所以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供给方面的影响使得 $(\varepsilon - 1)(\beta_2 - \beta_1)dC/C > 0$ 。

最后,从创意产业的发展对需求方面的影响来看,创意产业会对高水平人力资本产生巨大需求,进而促进创意阶层(具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再生产,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受教育年限,改变整体劳动力结构。而高素质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都将改变居民的产品需求结构,提升居民对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 3000 美元收入的地区,商品效用与价值的相关度下降到 2% 以下,即人们愿意为观念价值或效用付出比商品价值本身更多的金钱(厉无畏等, 2006)。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复兴紧密相连,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产业聚集特征。创意产业和区域环境相互作用,会促使地区具有创造性、多样性和容忍度,从而吸引大量人才和相关产业聚集于此(Florida, 2002)。统计数据显示,英国 1/3 的演艺公司、70% 的唱片公司、90% 的音乐活动、75% 的广播与电影收入、46% 的广告从业人员、85% 的服装以及其他各类设计师都集中在伦敦(褚劲风, 2005)。创意产业对城市复兴和产业聚集的作用将极大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城市发展与人口涌入,居民的整体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对服务体系、法律系统的完善以及文化服务产品的需求会不断提升。由此可知,创意产业的发展会促使社会对服务部门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在同样效用水平下,为了获得服务部门新增的一单位产品,人们愿意放弃更多的制造部门产品,即在给定效用水平下,服务部门和制造部门的产品替代率 MRS_{21} 的绝对值增加,与 C 同向变化。因此,本文得到第二个结论: $\Phi(\cdot)$ 是单增函数,即 $\Phi(C) > 0$, 并且,当创意产业不断发展时,创意产业对需求方面的影响使得: $\varepsilon \Phi(C)dC/\Phi(C) > 0$ 。

综上所述,并结合(13)式的均衡条件可得: $dK_2/K_2 - dK_1/K_1 > 0$, 即服务业的资本增长率大于制造业,进而促使服务业的比重加大、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从而最终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因此,本文得到第三个结论: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影响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4 计量模型和数据

4.1 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STRUCTURE_{it} = \beta_0 + \beta_1 CREATE_{it} + \beta_2 CREATE_{it-1} + \beta_3 X_{it} + \alph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4)$$

其中, $STRUCTURE_{it}$ 为第 i 个国家在 t 时间的经济结构变量,这里用 GDP 中服务业份额与工业份额的比值表示。 $CREATE_{it}$ 为第 i 个国家在 t 时间的创意产业发展水平指标,本文选择用各国创意产品与服务出口额的对数形式表示,同时模型还包括了其滞后项 $CREATE_{it-1}$ 。 X_{it} 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用取对数的人均实际 GDP ($LNGDP_{it}$) 表示;人口结构变量 ($POPULATION$),用各国 14 周岁以下及 65 周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表示;贸易开放度变量 ($OPEN$),用进出口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 α_i 为未观测到的国家特定效应, λ_t 为未观测到的时间特定效应, ε_{it} 表示未观测到的既随国家变化又随时间变化的误差项。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2003~2012 年)

变量	样本个数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服务业占 GDP 的比例	2370	59.445	13.221	20.804	93.566
工业占 GDP 的比例	2370	29.450	9.870	6.434	70.043
经济结构 (服务业/工业)	2370	2.379	1.487	0.439	14.542
取对数的创意产业出口额	2370	2.568	1.343	-2.699	5.231
人口结构比例	2370	35.800	6.211	19.793	52.597
贸易开放度	2370	46.185	31.364	9.178	233.812
取对数的人均 GDP	2370	3.735	.666	2.070	5.051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370	42.717	25.294	0.423	101.759
妇女的工作参与率	2370	51.436	15.179	11	88.8
每百万人中 R&D 研究员数量	2370	2168.93	1945.694	7.661	9117.793
取对数的专利收入	2370	7.667	1.593	2.086	11.094

通过对2003~2012 年237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计算, 本文得到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数据。图1 和图2 描绘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 横轴表示取对数的人均实际GDP, 纵轴分别表示GDP 中服务业与工业份额的比值和GDP 中工业份额的占比。图1 表明, 服务业与工业份额之比与人均实际GDP 呈现U 型曲线关系。图2 表明, GDP 中工业产出的份额与人均GDP 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 型关系, 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经济中工业部分的产出份额占比会先上升后下降, 这与结构转型的理论分析相符合。

图 1 服务业/工业产出比与人均实际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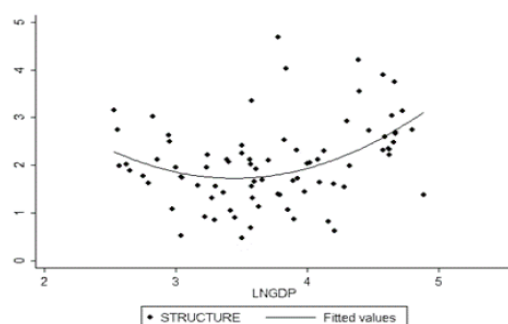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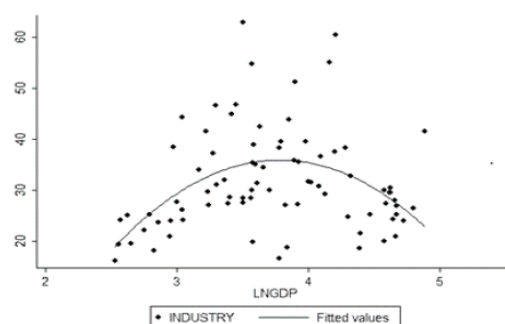


图 2 工业产出占 GDP 份额比与人均实际 GDP



5 实证结果和分析

5.1 基本分析

本文采用软件STATA12.0 对模型 (14) 式进行估计, 表2 给出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前四列的解释变量中只包含创意产业出口额的当期项与滞后项的对数值, 在此基础上, 后三列中加入了控制变量: 取对数的人均实际GDP、贸易开放度和人口结构比, 同时考虑到结构转型与收入水平之间的U 型关系, 在模型中也引入了人均实际GDP 的平方项, 并基于技术进步随时间变化的特点, 控制了个体和时间效应。

表2 的估计结果显示, 不论是否控制相关变量, 创意产业出口额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均在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从长期平均来看, 创意产业出口额对经济结构转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而验证了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在模型中引入控制变量后, 人均实际GDP (LNGDP) 的系数估计值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而其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则显著为正, 这初步验证了服务业与工业份额之比与收入水平之间的U 型关系, 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工业产值占GDP 的份额开始下降, 而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会逐渐超越工业产品。贸易开放度 (OPEN) 的系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贸易开放度增加, 贸易品部门 (工业) 的需求增加会导致非贸易品部门 (服务业) 相对比例下降。

人口结构变量 (POPULATION)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儿童和老人占总人口的比

例提高,会导致对部分服务业(教育和医疗等)产品的需求增加,使得服务业占比上升而带动经济结构转型。F 检验和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以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为例,创意产业出口额的滞后项系数估计值为0.096,表明长期来看,创意产业出口额每提升1%,GDP 中服务业与工业的份额之比会平均增加0.096 个百分点。

表 2 创意产业出口额与服务业/制造业

解释变量	未包含控制变量				包含控制变量		
	FE	RE	FE	RE	FE	RE	IVFE
常数项	2.052*** (0.046)	2.016*** (0.104)	1.907*** (0.065)	1.862*** (0.113)	2.913*** (1.019)	2.947*** (1.005)	-0.302 (3.616)
<i>CREATIVE</i>	-0.04 (0.017)	0.004 (0.0167)	0.006 (0.0188)	0.005 (0.019)	0.013 (0.019)	0.016 (0.019)	0.274 (0.374)
<i>LAG-CREATIVE</i>	-	-	0.050*** (0.020)	0.056*** (0.02)	0.096*** (0.023)	0.096*** (0.022)	0.331** (0.166)
<i>LNGDP</i>	-	-	-	-	-1.058** (0.445)	-1.203*** (0.431)	-0.546 (1.483)
<i>LNGDP-SQUARE</i>	-	-	-	-	0.146** (0.059)	0.174*** (0.057)	0.020 (0.196)
<i>OPEN</i>	-	-	-	-	-0.006*** (0.001)	-0.006*** (0.001)	-0.009*** (0.003)
<i>POPULATION</i>	-	-	-	-	0.027*** (0.010)	0.029*** (0.009)	0.081*** (0.031)
<i>COUNTRY-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370	2370	2370	2370	2370	2370	2370
F Test	237.17*** a	-	230.88*** a	-	200.94*** a	-	27.06***b
Hausman Test	-	4.85**a	-	9.40***a	-	22.04***a	28.79***b
R ²	0.047	0.053	0.050	0.054	0.138	0.167	0.120

注:(1)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GDP 中服务业份额与工业份额的比值;(2)***、**、*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3)回归系数部分括号内为标准差;(4)F 检验中a 对应是否选择混合估计模型的检验,b 对应工具变量是否为弱工具变量的检验;(5)Hausman 检验中a 对应是否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b 对应模型是否具有内生性问题的检验。

由于经济结构转型也会对创意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上述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分析。Florid (2002)的3T 理论指出,技术、人才和包容是一国创意产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本文选取每百万人中R&D 研究员的数量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人才数量的衡量标准;用一国每年通过专利获取的收入作为技术的衡量指标;而包容度通常难以度量,这里采用性别平等程度衡量,并通过15岁以上妇女的工作参与率来体现平等程度。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的第7 列,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水平上无法接受创意产业出口额外生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原假设;而F检验的结果则表明模型中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创意产业出口额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在5%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表明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转型确实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长期来看,创意产业出口额每提升1%,GDP 中服务业与工业的份额之比会平均增加0.331 个百分点。

从上述回归结果可知,不论是仅包含创意产业出口额当期项的模型,还是同时包括其滞后项的模型,创意产业出口额当期项的系数估计值均不具有显著性,但其滞后项却具有显著性。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可能是由于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具有时滞,所以当期影响并没有在当期体现出来,而且,创意产品的出口额反映了一国当期的创意产业发展状况,但其创意产品的产值会按照GDP 统计口径计入当期的工业产值中,所以当期的创意产品出口额会与工业总产值同向变动,因而会影响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并进而影响模型中系数估计的准确性,但滞后期的创意产品出口额与当期工业产值不相关,因而不会存在上述问题。本文也尝试在模型中引入创意产业出口额的滞后二期项,但因为回归结果同样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所以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模型仅包含创意产业出口额的滞后期一期项。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在文中报告相关结果。

5.2 扩展分析

由基本回归分析可知,创意产业发展对经济结构转型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将分别按照创意产业的定义和统计口径两种分类方式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创意产业内部各类部门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为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在UNCTAD 的创意产业报告中,

表 3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2003~2012 年)

变量	样本个数	均值	比例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遗产类	2370	1.076	2.87%	1.383	-5.699	4.167
艺术类	2370	0.817	1.58%	1.404	-6	4.132
传媒类	2370	1.435	6.55%	1.455	-3.757	4.097
功能类	2370	2.568	89.00%	1.403	-3.380	5.281
创意产品	2370	2.336	55.90%	1.264	-1.209	5.179
创意服务	2370	1.910	20.96%	1.395	-2.398	4.565
相关创意服务	2370	1.953	23.14%	1.543	-3	5.135

创意产业被分为为四大类:遗产类、艺术类、传媒类和功能类。而UNCTAD 对创意产业贸易进行统计时,又将创意产业分为创意产品、创意服务和相关创意服务三类。各分类创意产业出口额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根据UNCTAD 报告中对创意产业定义的分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因为Hausman 检验表明以下各模型均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文中同时给出了工具变量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由表4 可知,创意产业中的传媒类部门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最大,且创意产业出口额变量对应的系数估计值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其次是功能类部门;而艺术类和遗产类部门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值均没有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传媒类部门对结构转型的影响,通常表现为企业通过生产视听与印刷出版物,向社会提供大量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从而提升社会公众知识文化水平、增加精神文化需求、改变需求结构,最终从需求方面促进结构转型。而功能类产品则是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从供给方面影响经济结构转型。这主要表现在功能类产品的生产将知识创意与产品相融合,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存在双向知识外溢作用,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平衡增长,最终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传媒类部门的影响程度比功能类更大,表明创意产业通过改变需求结构促进结构转型的效果要比通过供给因素促进结构转型的效果更为显著。由表3 可知,传媒类部门占整个创意产业产出的比重明显低于功能类部门,可见其发展程度相对较低,但是,传媒类部门对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又明显高于功能类,这说明了传媒类部门更具有发展潜力与发展价值。因此,本文建议可以采取相应产业政策扶植传媒产业发展,并以此作为促进创意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的主导力量。艺术类部门与传媒类的作用途径比较相似,但是与大众传媒相比,其传播速度与广度明显较低,且对公众需求层次的影响需要较长时间的累积,所以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较弱。而遗产类部门的职责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其对经济结构的

促进作用更加间接。

表 4 创意产业报告分类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遗产类		艺术类		传媒类		功能类	
	FE	IVFE	FE	IVFE	FE	IVFE	FE	IVFE
常数项	3.048** (1.205)	-5.717 (9.220)	2.933** (1.214)	-23.328 (41.884)	3.094** (1.222)	17.943* (9.613)	3.457*** (1.009)	1.236 (3.173)
解释变量	遗产类		艺术类		传媒类		功能类	
	FE	IVFE	FE	IVFE	FE	IVFE	FE	IVFE
<i>LAG</i> <i>-CREATIVE</i>	-0.010 (0.020)	2.368 (1.574)	-0.022 (0.022)	4.076 (5.970)	0.027 (0.024)	1.688** (0.770)	0.108*** (0.023)	0.374*** (0.133)
<i>LNGDP</i>	-0.986** (0.499)	1.489 (3.618)	-0.950* (0.502)	7.350 (14.624)	-1.044** (0.507)	-7.057* (3.870)	-1.256*** (0.428)	-0.953 (1.347)
<i>LNGDP</i> <i>-SQUARE</i>	0.157** (0.065)	-0.347 (0.529)	0.154** (0.066)	-1.056 (2.048)	0.161** (0.066)	0.640 (0.408)	0.169*** (0.057)	0.097 (0.171)
<i>OPEN</i>	-0.005*** (0.001)	-0.003 (0.006)	-0.005*** (0.001)	-0.002 (0.015)	-0.005*** (0.001)	-0.005 (0.005)	-0.006*** (0.001)	-0.008*** (0.002)
<i>POPULATION</i>	0.020* (0.011)	0.105 (0.067)	0.021* (0.011)	0.212 (0.272)	0.022** (0.011)	-0.044 (0.068)	0.024** (0.010)	0.069*** (0.024)
<i>COUNTRY</i> <i>-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i>-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370	2370	2370	2370	2370	2370	2370	2370
F Test	167.25*** ^a	47.95*** ^b	164.87*** ^a	77.37*** ^b	165.59*** ^a	85.47*** ^b	207.51*** ^a	151.62*** ^b
Hausman Test	12.12*** ^a	9.72*** ^b	10.17*** ^a	102.23*** ^b	17.22*** ^a	13.65*** ^b	21.64*** ^a	30.38*** ^b
R ²	0.148	0.0022	0.140	0.024	0.180	0.034	0.138	0.114

注：（1）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 GDP 中服务业份额与工业份额的比值；其余同表 2 的注（2）～（5）。

按 UNCTAD 的统计口径对创意产业进行分类回归，从表 5 的结果可知，创意产业的所有统计项目均对经济结构转型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创意产品的影响最大，创意服务和相关创意产业服务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创意服务包含了直接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以及为产品生产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并不直接与制造生产部门紧密融合，而提供创意产品的部门，其产业融合程度相对较高，创意产品的生产涉及创意元素与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但与相对独立的创意服务相比，创意产品能够更加直接地整合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即将生产与服务集中在一个部门内完成，因而能够使产品制造与创意服务更紧密地融合起来，更有利于知识与创意的传播扩散，进而更有利于通过供给层面的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因此，可以通过大力扶持创意产品生产以促进创意产业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5.3 稳健性检验

尽管上述分析均支持创意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结论，但考虑到样本选择或者经济结构的不同衡量方法可能会给模型的估计结果带来影响，因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相关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按统计口径分类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创意产品		创意服务		相关创意服务	
	FE	IVFE	FE	IVFE	FE	IVFE
常数项	3.270*** (1.204)	-2.421 (5.489)	2.682** (1.221)	23.080** (11.455)	2.489** (1.154)	3.660 (3.522)
<i>LAG-CREATIVE</i>	0.089*** (0.034)	2.451** (1.036)	0.030* (0.018)	0.917** (0.440)	0.039** (0.018)	0.289*** (0.112)
<i>LNGDP</i>	-1.147** (0.501)	-0.641 (2.167)	-0.867* (0.503)	-8.287** (4.200)	-0.763 (0.480)	-2.071 (1.497)
解释变量	创意产品		创意服务		相关创意服务	
	FE	IVFE	FE	IVFE	FE	IVFE
<i>LNGDP-SQUARE</i>	0.168*** (0.065)	-0.135 (0.301)	0.135** (0.067)	0.907* (0.465)	0.117* (0.064)	0.219 (0.181)
<i>OPEN</i>	-0.006*** (0.001)	-0.006 (0.004)	-0.006*** (0.001)	-0.016*** (0.005)	-0.006*** (0.001)	-0.008*** (0.002)
<i>POPULATION</i>	0.021* (0.011)	0.068* (0.040)	0.024** (0.012)	-0.130 (0.101)	0.026** (0.012)	0.086*** (0.027)
<i>COUNTRY-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50	250	2370	2370	2370	2370
F Test	168.90*** ^a	71.64*** ^b	148.96*** ^a	97.61*** ^b	178.91*** ^a	261.57*** ^b
Hausman Test	21.74*** ^a	11.34*** ^b	15.89*** ^a	23.50*** ^b	10.62*** ^a	34.77*** ^b
R ²	0.180	0.006	0.093	0.050	0.104	0.026

注：（1）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 GDP 中服务业份额与工业份额的比值；其余同表 2 的注（2）～（5）。

本文首先从 237 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由于 G20 成员国涵盖面广、代表性强，且其 GDP 占到全球经济的 90%，贸易额占全球的 80%，人口数占世界总人口数的 2/3，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黄范章，2010），而且，其科技投入、科技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制度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更有利于创意产业的发展，所以本文基于 G20 选取了 2003～2012 年 25 个较发达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由表 6 的前三列结果可知，创意产业出口额的系数估计值均在 1%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且符号为正；人均实际 GDP 及其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也表明，经济结构与收入水平呈 U 型关系，这些与前文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根据 Acemoglu（2009）的解释，经济结构变化是指产出和就业在经济各产业间的内部构成变化，具体可表现为农业占比不断下降、工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占比则不断上升。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工业占 GDP 份额和服务业占 GDP 份额分别作为经济结构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表 7 的后四列中可以看出，创意产业出口额的增加能够明显降低工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而显著增加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这与理论分析指出的经济结构转型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从长期来看，创意产业出口额每提升 1%，工业占 GDP 的份额会平均下降 0.05752 个百分点，而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份额会平均增长 0.05777 个百分点。同时，其他变量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与前文的分析结论也基本相同。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 CES 效用函数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创意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机制，即创意产业的知识外溢性会提高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影响大小的差异性会使得服务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制造业部门，而且，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会促使社会对服务部门的产品

表 6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经济结构			工业占 GDP 份额		服务业占 GDP 份额	
解释变量	FE	FE	IVFE	FE	IVFE	FE	IVFE
常数项	-0.024 (0.294)	-11.040** * (3.037)	-9.392 (6.034)	2.166 (11.937)	66.419** (35.810)	61.573*** (12.415)	-20.190 (36.047)
<i>LAG-CREATIVE</i>	0.615*** (0.073)	0.644*** (0.097)	1.341*** (0.315)	-0.761*** (0.245)	-5.752*** (1.555)	0.562** (0.254)	5.777*** (1.565)
<i>LNGDP</i>	-	3.234*** (1.239)	2.425 (2.572)	15.751*** (5.151)	-2.272** (15.313)	-7.555 (5.358)	1.047 (0.159)
<i>LNGDP-SQUARE</i>	-	-0.402*** (0.155)	-0.395 (0.320)	-1.932*** (0.687)	0.837 (1.933)	1.386** (0.715)	19.390 (15.414)
<i>OPEN</i>	-	-0.002*** (0.003)	-0.002 (0.005)	0.094*** (0.013)	0.067*** (0.024)	-0.079*** (0.013)	-0.063*** (0.024)
<i>POPULATION</i>	-	0.138*** (0.027)	0.101* (0.053)	-0.114 (0.117)	-0.710*** (0.282)	0.183 (.121)	0.956*** (0.284)
<i>COUNTRY-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50	250	250	2370	2370	2370	2370
F Test	161.10*** a	79.33***a	126.30*** b	214.26*** a	152.13*** b	242.60*** a	152.13*** b
Hausman Test	7.41***a	52.17***a	78.58***b	11.08***a	20.81***b	41.53***a	22.60***b
R ²	0.129	0.086	0.018	0.197	0.061	0.283	0.118

注：同表 2 的注（2）～（5）。

需求不断扩大。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在经济中的产值比重会逐渐下降，而服务业的产出比重会逐渐上升，最终创意产业通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作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在此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2003～2012 年间 237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以及稳健性检验均支持理论模型的结论。通过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创意产业中传媒类行业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同时创意产品比创意服务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创意产业中创意产品部门的扶持力度，利用其高产业融合特性与技术外溢特征，充分发挥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效应，并促进创意产品部门中传媒行业的大力发展。虽然，现阶段的传媒行业占创意产业的整体比重偏低，但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会对结构转型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因而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予以扶持，利用传媒行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强大动力。

此外，政府还应该建立创意产业园区，尤其是创意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园区，并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经营环境；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创意产业特别是传媒类部门发展提供健全的法律保护体系；增加教育投入，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新鲜血液；在全社会营造重视文化、尊重创新的氛围，鼓励居民文化消费，并鼓励优秀的创意企业走出去，将中华文化产品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将促进资本和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动，能够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结构转型带来新的推动力，从而顺利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

作者：赵娜 王昱勋 李雄飞

来源：《经济科学》2014 年第 6 期

中国商品流通费用的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马克思流通费用构成的经验识别



1 引言

近年来,商品流通领域的成本上升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2012 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经济工作时提出“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的具体要求。最近两年国务院密集出台一些重要文件,多次提及和强调“降低全社会物流总费用”、“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等目标和任务,充分说明解决该问题的迫切性和严肃性,但目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物流方面。而在中国现行流通体制下,商流本身的费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既有体制性成本、也有运行性成本,国内学者(丁俊发,2012;宋则,2013)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角度已经提出了一些对策思路。事实上,来源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流通费用”概念明确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与物流活动较为密切的生产性流通费用;二是发生在买卖交易等商流过程中的纯粹流通费用,但在后来研究中关于商流活动费用的经验分析并不多见。虽有文献在探讨分销渠道选择(John 和 Weitz,1988)、国内贸易壁垒(Poncet,2003;Bai 等,2004)等问题时有所涉及,却没有把反映商品流通运行的因素作为研究重点。所以,将分析视野由物流拓展到商流,关注纯粹流通费用的发生机制,对于全面认识流通成本问题很有必要。本文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构成和影响机理出发,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流通费用的影响因素,也是对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的进一步延伸。

2 流通费用的构成与影响因素

2.1 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构成

流通费用的概念起源于马克思对资本流通过程的探讨。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流通费用按照经济性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生产性流通费用,包括保管费用、运输费用、仓储费用等;二是纯粹流通费用,包括买卖费用、簿记费用和货币费用等。其中,生产性流通费用是因为在流通领域有生产过程(如商品的运输、派送、保管等)补充进来而产生的费用,其“目的本身不是价值的形式转化”,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纯粹流通费用则是从纯粹的商流活动中产生的、属于商人业务所特有的流通费用,这种费用“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虽然其劳动耗费“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为价值的形式变换作中介的劳动”,但却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必须发生的费用,是社会财富的一种绝对扣除。并且,无论是生产性流通费用还是纯粹流通费用,虽不加入直接的生产过程,“但是加入流通过程,因而加入再生产的总过程”,都是属于经济运行总成本的流通费用。可见,除了物流费用以外,由商品的价值形态变化而引起、贯穿于若干次买卖关系中的纯粹流通费用,也是商品流通费用的重要构成。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纯粹流通费用“在单个商品生产者那里只是转瞬即逝的、几乎觉察不到的因素,是同他的生产职能形式并行或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形式在表现为巨额的流通费用时,却可以令人触目惊心”,这种费用不仅数额巨大,而且会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并行增长。

但马克思对不同的流通费用构成偏重探讨一般性质、并没有考察其详细的量化形式。从现代流通业运行过程来看,由于信息流和资金流可以看作商流与物流必然存在的内涵物,流通最本质的存在就是商流和物流两种不同性质的“流”(张育林,2007;王之泰,2013)。当今学界所强调的以及官方

所统计的物流费用,实际上接近于马克思所指的运输、保管、仓储等生产性流通过费用,而马克思所指的纯粹流通过费用则主要是内生于商品流通渠道的商流费用。本文对流通费用的主要构成及其影响机理的分析,主要是从物流层面考察生产性流通过费用,从商流层面考察纯粹流通过费用。但需要注意的是,生产性流通过费用和纯粹流通过费用虽然相互区别但却不能完全分割,二者既可以有机融合、又可以相关且独立存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也正是流通过费用所面对的状态。

2.2 流通过费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 生产性流通过费用:物流层面的考察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高达18%,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9.5个百分点左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6.5个百分点,高于印度和巴西5~6个百分点。近20多年来,中国物流费用的GDP占比只有6个百分点的下降,最近五年内基本在18%左右且无明显下降趋势(见图1)。

关于我国物流费用持续居高的原因,一方面是与物流发展水平相关。近年来,中国物流基础设施水平虽有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物流设施的公益性缺失、物流资源的网络化利用不足,可能降低了物流设施水平提高对于降低物流费用的积极作用。比如,有实证研究(刘建,2013)指出,高昂的公路收费可能极大地削弱了公路交通网密度的增长对提高运输效率的正向影响,反而提高了国内运输成本。另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3年发布的数据,在海铁联运方面,中国港口集装箱的海铁联运比例仅为2.6%左右,而目前国际水平通常在20%左右、美国为40%,说明中国物流资源的网络化利用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物流以商流发生为前提,物流费用偏高需要尤其重视商流层面的影响。结合商流费用的影响因素(见后文),本文主要考虑其中三个方面的影响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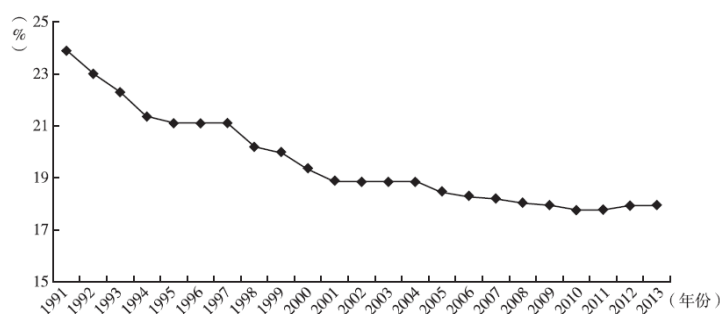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物流费用总额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物流年鉴》。

① 渠道批零结构。

一般而言,随着流通渠道的中间环节增多,商品所需的转运次数增加,仓储等待和运输时间均有延长,进而导致运输、库存和保管费用上升,从而推高总体物流费用。比如,中国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农超对接”措施,就是试图通过精简商流环节来降低物流费用。

② 流通组织化程度。

随着渠道主体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商品流通过程中“商物流”的可能性增加,即商品不需要伴随所有权的多次让渡而发生多次转移,在中间商通过组织化运作实现商流汇聚之后,商品实体的物流线路可以采取不同于交换线路的直接路径,从而节省物流费用。

③ 批零结构和组织化程度的交互影响。

增加流通环节对于推高物流费用的可能性,还需要结合组织化程度进行判断。在批发商组织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流通环节并不一定增加物流费用,反而由于如上提及的“商物流”而优化物流线路;反之,若小微型批发商“各自为战”,“商物流”可能导致商品“相互倒手”,增加运输过程,这时批发环节增多就会导致物流费用上升。

应当看到,马克思将物流费用定义为“生产性流通过费用”,充分说明了这种费用在经济性质上的

独特性。在物流业发展初期,流通学界的普遍认识是把物流业作为流通业的子系统,但从物流活动的经济性质来讲,物流所内含的生产性劳动决定着物流也是生产的子系统,福特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生产物流概念。因此,对物流费用本身的关注应当是全面的、复杂的、也是超越商品流通过程的,后文计量分析中对物流费用的刻画也将不限于商品流通阶段。

(2) 纯粹流通费用: 商流层面的考察

由于商品流通渠道就是“商品在其价值形态变换中由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所经过的交换线路”(纪宝成, 1991), 对反映商品价值形态变化的纯粹流通费用的刻画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就应着重在商品流通渠道中进行。批发和零售是重要的商品流通环节, 本文采取问题导向的典型因素分析, 重点关注在批零商业中讨论较为集中的渠道结构、组织化程度和盈利模式的影响。

① 渠道批零结构。

商品流通渠道中批零势力的对比, 直接关系到商品交换的次数和效率, 从而影响到商流费用; 但批零比值的大小与商流费用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一方面, 从批零演进的角度看, 渠道结构本身就存在着时序变化。在小批量、零散化交易居多而中小商人大量活跃时期, 特定商品几乎就是借助不断延展的交换关系集合而流向远方市场的。随着产销组织的规模扩张, 渠道结构呈现“去中间化”发展, 大多表现为批发环节的精简。比如, 美国在 20 世纪初、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 都曾经有过传统批发商疲于奔命的发展困境。但这种趋势并不是对批发商业必要性的质疑, 而是对流通效率的一种市场化筛选, 流通组织经过转型调整可以推动渠道结构的“再中间化”(Engel, 1933; Rosenbloom, 2007), 日本批发商经过两次流通革命重新确立市场地位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 流通系统环境不同也会引致批零结构不同, 日本的“大批发小零售”或美国的“大零售小批发”(吴小丁, 2010), 都是基于批零协调的市场选择。

可见, 虽然渠道批零结构能够影响商流费用, 但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批发商的市场效率和渠道协调程度, 即批零比值增大可能伴随商流费用的不同变化。其一, 对于批零比值增加伴随商流费用降低的情况, 主要是借助批发商渠道作用的发挥。批发商作为上下游交换关系的衔接者, 可以直接提供集中采购、商品配齐等流通服务(後藤一郎, 1991), 并在中间环节发挥集中化的信息筛选、质量监测、交易激励、市场定价等增值功能(Spulber, 1996), 这些均能有效降低渠道成员由于信息缺失、低效谈判等原因产生的商流活动费用。其二, 对于批零比值增加伴随商流费用增加的情况, 一般与低效率的中间环节增多有关, 如果中间商运营效率不高, 则流通环节增多难免引起批零主体在市场搜寻、沟通谈判等方面的营业费用上升, 并且可能由于商业腐败、渠道冲突、交易切磋等而增大招待费、潜在诉讼费等管理成本支出, 这些都体现为商流活动费用的增加。

② 流通组织化程度。

目前, 中国流通业组织化程度较低, 流通主体大部分是微型流通企业和个体户单位。按照美国产业组织学家贝恩对市场结构的分类, 市场集中度指标 $CR_4 \leq 30\%$ 或 $CR_8 \leq 40\%$ 时, 该产业就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数据显示(见图 2), 中国限额以上批零企业及商品交易市场的 CR_8 指标全部在 8% 以下, CR_{20} 和 CR_{50} 指标分别不足 15% 及 26%, 即便以 CR_{100} 指标来衡量, 也仍与判定完全竞争状态的市场集中度水平相差较远, 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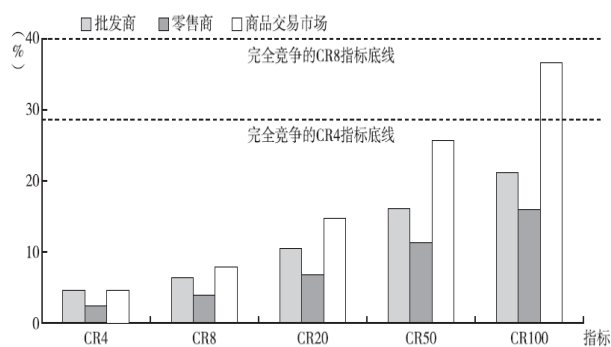


图 2 商品流通主体的市场集中度对比

资料来源: 根据 2009 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计算; 2009 年以后统计数据不再列示大型流通企业或商品交易市场销售总额排名。

中国流通领域的竞争型市场结构尚且是在小微型企业居多的激烈竞争下实现的。

虽然关于合理的流通组织化程度,“量化的标准固然难以精确,精确的量化也未必合理”(王晓东,2013),但若结合中国流通业的变迁主线可以看出,流通组织化程度过低,流通领域便会滋生很多瓶颈问题,最终引致商流费用的升高。比如,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批发市场,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摆脱摊位制、粗放式的低组织化运行状态,导致其现代交易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商流活动效率受到极大制约;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原本是为了寻求有效竞争的市场效率,但由于本土零售企业“小而散”的状态没有改善,组织化水平甚高的外资零售不断加剧竞争威胁,增加了本土零售商的运营成本;传统“一二三”级批发环节的精简,原本是为了减少冗余流通环节带来的效率损失,但由于新型中间商普遍缺乏组织化发展,专职批发职能的分散化和小微型中间商的大量存在导致有些领域的流通环节远远多于传统“一二三”级,反而增大了商流活动的费用。

可见,在中国小微型流通主体居多的情况下,流通组织化程度提高有助于降低商流费用。其一,组织化程度增加,流通单体规模增加、市场集中度增大,流通组织在一体化、网络化扩张中,普遍会在存货供给的基础上发展出物流整合、产品设计、市场开发、采购代理等新型流通职能(Olsson等,2013),综合服务职能和渠道增值能力的提高将有效减少交易摩擦,增大商流的聚集效应,从而节约流通费用。其二,组织化程度增加,流通组织的跨区域流转能力提高,商品流通渠道中的小微型流通环节将明显减少,单个流通环节的资源整合程度提高,供需之间的搜寻成本降低,供需匹配程度提高,这些都代表着商流费用的节省。以中国现阶段的批发商业为例,在传统“一二三零”的分配型流通模式瓦解以后,在新时期的“批发体系重构”(王晓东,2011)议题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型中间商的组织化发展,所谓批发重构并非意图增加流通环节,而是通过批发环节的“再组织化”来减少低效率的“小微型”环节,从而降低流通过费用。

③ 流通盈利模式。

当前的流通盈利方式在“贱买贵卖”基础上普遍延伸出以下三种:一是佣金型盈利,即流通主体并不直接买进和卖出商品,而是通过撮合买卖活动来提取交易佣金,比如香港利丰贸易有限公司在其全球采购业务中承担的“有声望的代理人”角色即是如此。二是供应链型盈利,即先由流通企业根据需求信息、市场预测等形成产品创意和大致规则,进而选择上游供应商、生产商和集成商,利用品牌规则约束和组织生产,目前大型流通企业基于模块化原理而推出的自有品牌产品多是这种情况。三是租金型盈利,即流通主体并不从事商品购销业务,而是将其掌控的货架、店面、柜台等销售资源出租给供应商或品牌商,并收取租金、提成、管理费等,当前大型超市、百货店普遍收取的进场费、联营扣点多是这种情况。

表 1 主要百货店自营收益比重 单位: %

年份	百盛百货	银泰百货	天虹百货	新世界百货
2010	34.8	31.6	30.1	21.2
2011	34.4	36.4	27.5	19.9
2012	30.5	37.6	26.7	19.4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上市公司年报整理计算。

本质上,上述前两种盈利方式虽然不是通过“先买后卖”来媒介商品流通,但却体现了流通主体在资源整合、关系聚集、生产控制等方面的更高运营能力,仍然反映了其推动商品价值形态转化的专门媒介职能。对于第三种情况的盈利方式,目前在理论界争议较多,但在中国实践中却得到迅速发展。型百货店为例,目前自营收益比重大约在 20%~30%,大部分收益来自销售佣金、租金收入和管理费收入等,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且租金型的收益比重整体仍有上升趋势(见表 1)。本文认为,零售商如果不做“买卖”而偏重“租店”,就没有为商品流通承担实质性的媒介作用(这些职能实际由生产商自己完成),则这种出租商业资源而获取收益的方式就可能增加流通过费用。

租金型盈利方式对于抬高商流费用的影响机制在于:第一,是借助供应商货款进行“滚动式”开店而产生的资金成本。由于网点数量也是零售商“扣点”谈判的重要资本,在租金收益的驱动下,依

靠供应商的应付账款进行店面扩张就成为很多零售商的现实选择,这期间发生的“跑马圈地”、店面装潢以及供应商支付的新店“赞助费”等,都直接推高了商流费用。第二,是供应链的信息失衡导致的市场成本。在租金型盈利模式下,坐收租金的零售商已经偏离了需求预测职能,没有向供应链上游传递有效的市场信息,不利于上游生产预测和供应链上下游的供需匹配,这不仅是零售末端资源的浪费,也由于供需失衡而产生了较高的市场成本。第三,是“零供”矛盾产生的寻租成本。在渠道势力不对等的情况下,“通道费”、“扣点率”很容易成为“零供”冲突的导火索,这种渠道冲突和交易摩擦本身就是一种流通效率损失;同时,不对等的渠道关系也会滋生与“商品进场”、“货架争夺”等有关的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这些共同推高了商流费用。

3 经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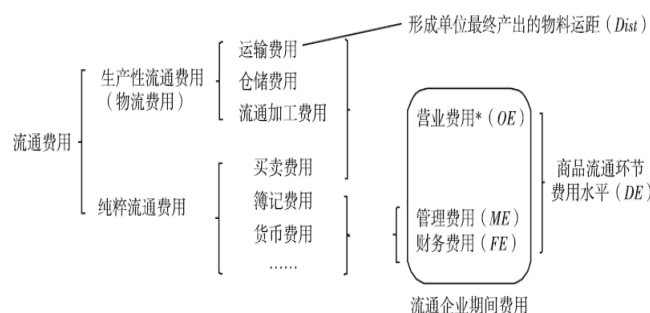
3.1 流通费用的衡量方法

关于因变量的衡量,在现有的统计数据和统计口径下构建单一指标来同时反映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这两大流通费用构成具有一定难度,在此需要对二者进行分别考虑。基于前文的论述,我们考虑构建两个指标,其一侧重考察生产性流通费用,但不限于流通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前文所述的物流费用应当超越商品流通过程的复杂性;其二反映商品流通渠道所涉及的批零环节的费用,其中包含纯粹流通费用的一部分生产性流通费用。

(1) 侧重生产性流通费用的指标构建

物流费用历来被称为“冰山成本”,难以直观体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社会物流总费用”虽然较为完整和权威,但总量数据难以支撑本文的计量分析。在行业角度,物流统计目前主要侧重货运量、线路长度等业务规模指标,缺乏成本数据,经济普查中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数据也仍不能全面反映物流费用。不过,考虑到物流活动的需求由生产和流通过程产生,其费用支出会反映在制造业和批零商业的成本当中。但问题在于,基于企业财务数据统计的行业数据中并没有直接归集物流费用的指标。虽然“营业费用”包含了销售环节中运杂费、装卸费、包装费、仓储费、损耗费等反映物流活动的费用支出,但因为采购环节的物流费用没有被计入,同时纯粹流通费用中的买卖费用也有较大部分可以归入营业费用,用该指标衡量物流费用并不准确。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将采取数据较为丰富的运输业务指标,构建反映运输费用的代理变量来衡量物流费用水平。

为了更好地考察商品流通环节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运输费用的决定因素分解为单位运费、货运量以及运输距离。考虑到单位运费一般由运输条件和规模经济决定,货运量虽然与流转环节有关、但更多地取决于当地的生产与销售活动的经济规模,本文选用运输距离作为运输费用的代表因素。不论是商业企业还是其雇佣的第三方物流企业,都会尽可能地选择最短运输路线,从而在提供相同最终消费产出的情况下,运输距离(记做 Dist)能够反映出在产销环节中由迂回程度、流转次数、商物分流等交易特征所决定的物流费用水平。以 Cargo 表示货运量, Turnover 表示货运周转量(距离×货运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RSCG 表示最终产出,具体计算公式为: $\text{Dist} = (\text{Turnover} / \text{Cargo}) / \text{RSCG}$ 。



(2) 反映商品流通环节费用水平的指标构建

图3 流通费用的范畴与因变量(代理变量)的构建

注:营业费用不包含采购环节的物流费用。

前已述及, 本文重点关注发生在商品流通渠道中批零环节的商流费用, 其中的买卖费用主要归入批零企业统计数据中的“营业费用(OE)”(旧称“销售费用”), 簿记费用和货币费用等其他纯粹流通费用则在现代会计制度中采用了“管理费用(ME)”和“财务费用(FE)”的划分方式。我们将这些期间费用加总, 得到能够反映批零环节中商流费用水平的流通费用(DE)。但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营业费用”中包含了一部分反映物流活动的费用支出且无法与商流费用拆分, 所以反映商品流通环节费用水平的指标(DE)实际上不仅包含纯粹流通费用、也反映了发生在批零环节的一部分生产性流通费用。由于期间费用的高低与企业销售活动的规模密切相关, 本文最终采用了流通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RPB)的比值, 即 DE / RPB 。

后文计量分析将分别以 Dist 和 DE / RPB 作为因变量, 并通过对 DE 内容的细分来进一步来考察、验证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图 3 对因变量流通费用的刻画进行了总结。

3.2 自变量、数据与计量方法

根据前文对流通费用影响因素的分析, 自变量选取主要包括物流和商流两个层面。第一, 在物流层面, 选取物流业的基础设施水平(Infra)作为自变量, 在此采用 Demurger (2001) 的计算方法, 以交通网密度来反映, 计算时采用铁路营运里程、等级公路里程、内河航路里程三者之和与相应省份面积的比值。第二, 在商流层面, 主要选取三个自变量: (1) 渠道结构变量(RatioWR)。商品在中间批发环节多次流通, 这一过程产生的批发销售总额与零售环节的销售总额相比, 能够体现流通渠道的长短特征; 考虑数据可获性, 一般采用限额以上批发企业销售额与限额以上零售企业销售额比值来计算。(2) 组织化程度变量(RatioChn)。中间环节的组织化程度, 代表着流通企业横向、纵向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否紧密。目前, 连锁经营具有较为典型的组织化网络特征(传统的供销社体系在转制中也部分地改组为连锁零售企业)。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合理性, 这里采用连锁经营零售企业的销售额占零售总销售额的比重来表示流通组织化程度。(3) 盈利模式变量(PftMode)。由于零售企业收取的促销费、广告费、场地费等通道费用一般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因而在此用其他业务利润与营业利润的比值来表示这部分租金型的收益在形成企业最终利润中的作用。

本文统计的流通企业的期间费用、用于计算批零比率的销售额以及零售企业利润构成等财务数据均取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运输里程数、连锁经营销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分省年度数据库”。本文采用的是 2006—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因前述原因舍去上海、天津两个港口型直辖市, 并剔除营业利润为负的样本, 实际样本量为 201。

对于此类面板数据, 计量分析通常需要先选在混合模型(Pool)、固定效应模型(FE)、随机效应模型(RE)之间进行选择, 主要根据“三角形法则”, 通过 F 检验、豪斯曼(Hausman)检验、B-P 检验来完成。由于本文所采取的省区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组间相关等问题, 从而影响估计结果, 因此需要分别采用沃尔德(Wald)检验、皮尔逊(Pesaran)检验, 对经典假设是否满足的情况进行考察。FE 模型应同时考虑对异方差和组间相关问题采用稳健的标准误来进行统计推断, RE 模型则主要检验后者。此外, 由于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在时间跨度上较短, 时序相关问题并不突出。

3.3 计量结果与分析

(1) 侧重反映生产性流通费用的回归结果

根据前述方法得到的计量结果如表 2 所示。以单位最终产品所需运距 (Dist) 为因变量的回归最终都选择了采用稳健标准误的随机效应模型 (第 (1) - (5) 列)。可以看到, 物流设施发展水平的变量 (Infra)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物流设施建设有利于运输成本的降低, 符合一般的理论预期, 关于前文所述的物流设施公益性缺失、物流设施网络化利用不足等问题, 并没有完全抵消物流设施水平提高所带来的物流费用节省。

表 2 计量分析结果: 流通过费用总体的影响因素

		(1)	(2)	(3)	(4)	(5)	(6)	(7)
因变量		Dist					DE/RPB	
模型设定		RE	RE	RE	RE	RE	FE	RE
自变量	Infra	-2.09362*** (0.25536)	-1.76155*** (0.26220)	-1.70859*** (0.24996)	-1.79508*** (0.23167)	-1.79016*** (0.24012)	-0.01960** (0.00840)	-0.01252** (0.00578)
	RatioWR	0.06837** (0.02923)		0.04311 (0.02824)	0.05136* (0.02710)	0.05107* (0.02844)	-0.00200* (0.00116)	-0.00286** (0.00119)
	RatioChn		-0.29464*** (0.07661)	-0.27497*** (0.08499)		-0.00914 (0.12401)	-0.00889*** (0.00318)	-0.01016* (0.00566)
	RatioChn × RatioWR				-0.06717*** (0.01797)	-0.06514** (0.02716)		-0.00030 (0.00119)
	PftMode	0.00459 (0.26685)	-0.25709 (0.18704)	-0.24465 (0.19360)			0.02104*** (0.00498)	0.01651*** (0.00546)
	常数项	-10.3034*** (0.29701)	-10.1729*** (0.23076)	-10.3585*** (0.27411)	-10.3864*** (0.27080)	-10.3878*** (0.26627)	0.0777*** (0.00639)	0.0779*** (0.00782)
整体显著性		100.01***	117.00***	144.11***	147.36***	149.82***	17.05***	73.02***
		(1)	(2)	(3)	(4)	(5)	(6)	(7)
因变量		Dist					DE/RPB	
模型设定		RE	RE	RE	RE	RE	FE	RE
模型选择与诊断	FE 检验(F)	95.26***	134.53***	136.64***	139.07***	138.18***	13.53***	13.39***
	Hausman 检验	0.39	0.03	0.05	0.01	0.03	9.43*	5.21
	B-P 检验	523.14***	499.27***	493.94***	491.11***	492.08***	/	150.31***
	组间相关	13.118***	11.012***	11.890***	13.053***	13.084***	1.112	1.752*
	异方差(Chi2)	/	/	/	/	/	2569.66***	/
	稳健标准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注: (1)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标准差。(2)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p 的取值在 10%、5% 和 1% 以下。(3) 整体显著性检验中, FE 和 RE 模型分别报告 F 和 Chi2 统计量及显著性。(4) 组间相关采用 Pesaran 检验, 原假设为各组独立; 异方差采用 Wald 检验, 原假设为同方差。

关于商流因素对物流费用的影响,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表 2 的逐步回归结果 (1) 当中, 反映渠道结构的批零比例指标系数 (RatioWR) 显著为正, 表明中间环节增多以后, 实现每一单位最终产出所需的中间运输过程增加, 生产性流通过费用上升。这种现象多在“商物合流”情况下出现, 即商品实体需要在各级批发商之间不断流转, 从而增加物流费用。结果 (2) 中, 以连锁零售销售额占比 (RatioChn) 来体现的流通组织化程度与物流费用水平负相关, 符合组织化程度提升后增加聚集效应、实现规模经济的理论预期。结果 (3) 中加入了所有自变量, 我们发现, 在控制组织化程度之后, 批零结构的指标不再显著, 相应解释在于渠道结构与组织化程度指标间存在负的偏相关关系, 即“短渠道”一般与“高组织化”相伴随, 提高组织化程度本身有利于流通环节的精简。

为了进一步考察组织化程度提高与渠道批零结构的协同作用, 我们在回归过程中进一步加入了两者的交互项。从结果 (4)、(5) 可以看到,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在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同时发挥中间批发商的流转作用, 并不会增加运输费用。其现实原因如前文所述, 高组织化程度的批发环节有助于商流过程与物流过程的分离, 即交易需求经过专职批发商、连锁企业集采中心等环节的信息传递, 商品实体可以在实现产需对接的商流汇聚之后采取不同于商流线路的运输路线, 以直接路

径实现集中化、效率化的运输配送。此外，零售企业经营模式的变量（PftMode）在对运输费用的回归结果中并不显著，表明两者间关系较弱。

（2）反映商品流通环节费用水平的回归结果

以流通环节相对费用水平（DE / RPB）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6)可以看出，物流设施水平（Infra）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与前述结果一致，这是由于因变量中包含的营业费用反映了一部分物流费用支出所致，也有可能是物流设施本身也会影响纯粹流通费用，后文将进一步细分考察。批零比例指标系数（RatioWR）显著为负，结果不同于前。可以推断，在目前流通环节较为零散的格局下，批发商的正向渠道作用得以发挥，能够抵偿中间环节增加所带来的流通成本上升，在总体上体现为批零比例与流通费用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反映组织化程度的指标（RatioChn）显著为负，体现了组织化流通网络本身能够节约流通费用的特点，与理论预期一致。有所不同的是，代表两者协同效应的交叉项回归结果虽然为负、但不再显著（结果（7）），这是由商流费用与物流费用在发生机制上的差别所导致的。

零售商非销售性活动的利润占比（PftMode）与流通企业相对费用水平显著正相关，该结果印证了零售环节商业资本职能缺失能够抬升社会流通费用的推断。零售企业将场地租金、通道费等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做法，削弱了流通渠道终端环节的信息优势，对供应链的供需匹配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围绕渠道中的利益分配、资金占用等问题而发生的“零供”冲突也会加大流通环节的内耗，产生额外的流通成本。

为了进一步分析前述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在此对流通环节期间费用的三个构成部分加以细分，分别以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的相对水平（与主营业务收入相除得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计量分析结果：流通费用细分部分的影响因素

		(1)	(2)	(3)
因变量		营业费用水平 (OE/RPB)	管理费用水平 (ME/RPB)	财务费用水平 (FE/RPB)
模型设定		RE	FE	RE
稳健标准误		否	是	是
自变量	<i>Infra</i>	-0.00825** (0.00343)	-0.01184*** (0.00401)	0.00042 (0.00048)
	<i>RatioWR</i>	-0.00178*** (0.00058)	-0.00071 (0.00067)	-0.00011 (0.00012)
	<i>RatioChn</i>	-0.00609*** (0.00171)	-0.00328*** (0.00109)	-0.00006 (0.00031)
	<i>PftMode</i>	0.00669 (0.00529)	0.00656** (0.00255)	0.00549*** (0.00145)
	常数项	0.04675*** (0.00356)	0.03065*** (0.00330)	0.00324*** (0.00061)
整体显著性		38.43***	17.96***	17.81***
组间相关检验		1.442	1.394	8.374***
异方差检验		/	5820.76***	/

注：限于篇幅略去用于模型选择的检验结果。其余同前表。

在表3可以看到，物流条件、渠道批零结构与组织化程度对营业费用的影响方向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且依然显著；零售环节盈利模式指标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但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表3中的第(1)列）。根据前文对营业费用构成的说明，关于物流条件的结果易于理解。反映渠道结构的批零比例指标回归系数为负且十分显著，体现的也是中间交易环节所具有的经济性，即相对于扁平化流通渠道而言，经过批发商的集采配齐，能够减少流通过程中买卖双方搜寻、沟通与谈判的成本。流通环节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能够在开展广告、展览、促销等活动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节约营业费用，比如大型连锁零售集团的自有品牌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

就管理费用而言（表3中的第(2)列），物流设施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便利

的交通条件能够减少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差旅费和场地租赁费。组织化程度对管理费用的影响机制与营业费用类似,交易对象的集中化、规模化以及交易次数的减少不仅能够直接节约招待费、潜在的诉讼费等管理成本,而且能够通过提高销售机构的效率来间接地缩减对管理活动的需求。盈利模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于渠道上下游围绕通道费用、扣点返点等利润分配规则进行谈判的过程,以及发生矛盾纠纷后的处置乃至诉求将产生大量的管理费用。

最后,对于财务费用(表3中的第(3)列),主要受到零售环节经营模式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零售环节信息职能削弱所导致的商品滞销、库存积压等不良后果最终会体现为渠道主体的资金回笼缓慢,甚至会因为企业破产风险增加而进一步抬高流通环节的融资成本。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关于流通费用包括生产性流通费用与纯粹流通费用两大组成部分的基本论述,强调了流通费用不仅限于物流费用的观点,认为应当充分考虑商流过程中的各种耗费对流通费用总体水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经验分析考察了可能影响流通费用的因素。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物流设施建设能够从节约物流费用和商流活动成本两方面降低流通费用。第二,提升流通组织化程度既能够促进商物流,减少物流环节的迂回损耗,也能够通过发挥中间交易网络的信息和信用作用来降低商流费用。第三,渠道结构对于流通费用的影响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对流通环节的多少加以优劣判断。在物流费用方面,单纯地增加零散的中间环节会引致运输成本的上升,但若批发商具有组织化特征和明确的环节职能(即批发商之间进行专业采购、商品配齐、信息汇集等职能的再分工,而非简单的职能重复),则有利于物流效率的提高;在商流活动方面,批发商可以提高买卖效率、分担流通风险,有助于降低流通费用。第四,零售商偏重场地出租、租金收益的盈利模式虽然对物流费用影响不大,但会削弱流通渠道的信息反馈职能,降低商流活动的整体效率、增大潜在的渠道冲突,从而加大流通渠道的内耗。既然商流费用是总体流通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流通组织运行会对生产性流通费用、纯粹流通费用同时产生影响,则本文的主要研究启示在于,未来对流通费用的关注应从物流拓展到商流,降低流通费用的途径也应从加强物流设施建设、减少运输环节收费、推进物流一体化发展等思维扩展到改善营商环境、调节渠道结构、提高流通组织化水平、优化零售盈利模式等多个方面。具体到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一是应当尽快摆脱以批发环节多少来评判流通费用高低的传统思维定式,重视发挥批发商业对于节省全社会流通费用的积极作用,着重通过重塑专职批发职能、孵化大型批发主体、加强批发环节的职能再分工等手段,增进批发环节的市场化运行效率。二是应当高度重视零售发展方式对于流通费用的影响机制,尽快突破本土零售商过度依赖租金收益的发展瓶颈,强化大型零售企业在自主定价、商品采购和信息反馈等方面的优势,适度地回归商业资本职能,逐步向自主经营重心调整。三是鉴于组织化发展对于提升批发和零售商业的运营效率均有重要意义,政府一方面应加强通用型标准和公益性平台的支持,降低流通组织化发展的技术门槛,另一方面要转变商业发展思路,从强调“招商引资”引入大型流通企业转向引导流通领域的企业间合作,重视新型连锁方式在构建区域经销网络、提升组织化程度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 谢莉娟 王晓东

来源: 《财贸经济》2014 年第 12 期

NSFC 资助下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 投入产出分析

技术经济及管理 1 引言



作为中国独创的一门学科,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发展轨迹在当前理论界并未达成共识,且缺乏明确认识,这必然会影响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探析该学科演进过程中的发展规律,例如该学科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暗含着哪些规律?

基础研究主要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其成果通常只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或在感兴趣的同行中传播。Nelson 提出可以把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看成是一种“公共物品”投资。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公共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科研基金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73”、“863”、火炬计划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创新研究和人才培养已成为 NSFC 的战略重点。

以 NSFC 为数据来源探究研究对象的投入产出成为一种既定范式。刘云利用简化的知识生产函数测算了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际科技产出的函数关系,发现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研经费投入量和科研人员投入量与科技产出总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但这种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政府对基础研究投资的直接产出形式是新的公开发表的成文知识,其有利于后续研究的开展。将科研产出限定为论文产出时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如何?许娇利用 2003-2007 年中国内地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统计数据,以国内中文期刊科技论文数为基础知识产出形式,以人员投入、经费支出为基础知识投入变量,对知识生产函数进行了 GLS 法估计,发现人员投入与论文产出呈非显著负相关关系,经费支出与论文产出则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本文试图从宏观层面借助知识生产函数,以 NSFC 项目资助额和获资助博导人数作为投入要素,以 NSFC 下论文发表数量为产出指标,揭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的演化规律。

2 模型设定及指标选取

2.1 知识生产函数

分析区域知识生产与溢出较常用的工具模型是知识生产函数(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 KPF)。Griliches 认为知识生产函数是分析高等院校获得国家公共资助开展研究对区域创新能力地理溢出的概念性框架。知识生产函数 $Y = F(X, K, u)$, 式中 Y 是宏观或微观水平的产出; X 是正常的生产投入向量,比如劳动力与资本; K 表示技术知识水平,由现在和过去的研发费用决定; u 是其它因素的作用或随机误差。

在 Griliches 提出知识生产函数后,众多学者对该函数进行了拓展和改进。在知识生产函数基本形式的基础上,Crespi 重新构造了如下生产函数: $Y_{it} = A_i X_{ait} K_{bit} e^{\lambda t + u_{it}}$ (1)

其中, Y 为知识产出, X 为持续投入如人力或其它控制变量, K 可以用过去及当前研发投入衡量, A 为初始技术条件, 不随时间变动, λ 为技术自然进步率, $Ae^{\lambda t}$ 为趋势项, $\lambda > 0$ 表示增长趋势, $\lambda < 0$ 表示减少趋势。该函数符合 Cobb-Douglas 函数的形式, 且为希克斯中性和规模报酬不变, 同时假设资本、劳动与知识以外的其它投入相对不重要。

2.2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分析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测度使用 Crespi 构造的知识生产函数, 为此课题组于 2013 年 4-6 月期间, 通过互联网搜集了 58 个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历年招生简章共计 439 份, 最终筛选确定 2005-2013 年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博导的总人数为 396 名;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ISIS 系统中获取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历年 NSFC 资助项目信息, 最终采集到 1999-2012 年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获得 47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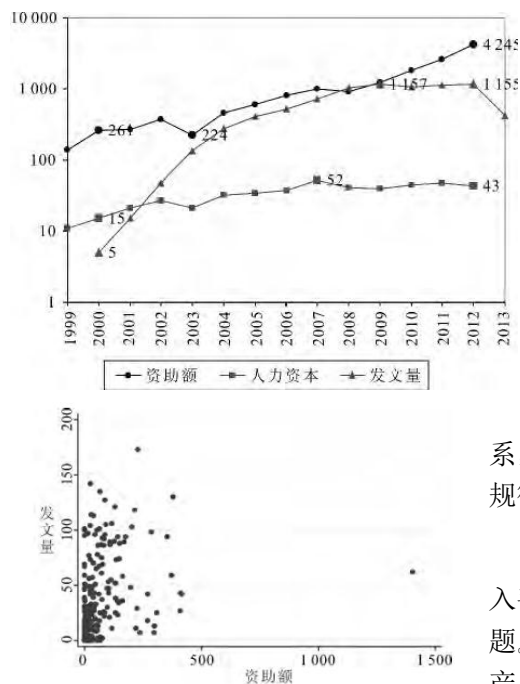


图 2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发文量与资助额的关系

从全国总体形势来看,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 NSFC 资助额从 2009 年起出现急剧增长趋势, 而相应的发文量却几乎保持了平稳态势, 人力资本在 2007 年达到最高, 为 52 人, 此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领域获得 NSFC 资助的博导数均未突破该数目(见图 1)。依据所得样本, 发文量与资助额间关系如图 2 所示。

仅考察发文量和资助额两个变量时, 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但当存在其它影响因素以及时序条件时两者将呈现怎样的规律?

根据图 1、图 2 中所揭示的规律, 需从时间和省域两个角度入手, 进一步探析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问题。首先给出函数各变量的度量指标: 知识生产函数中的知识产出 Y 即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 NSFC 资助下的论文产出, 使用 CNKI 上标注 NSFC 项目批准号的 CSSCI 检索论文的数量作为

度量指标, 记作 $\ln no. pub$; 令 X 为人力资本, 选取当年获批 NSFC 项目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博导人数作为度量指标, 记为 $\ln no. res$; K 采用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博导所获 NSFC 项目的资助额度作为度量指标, 记作 $\ln no. grant$; A 的度量使用各省域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历年博导人数的平均值作为替代指标, 记为 $\ln lev. ini_tech$ 。对式(1)两侧分别取对数,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 no. pub_{it} = \beta_0 + \beta_1 \ln lev. ini_tech_{it} + \beta_2 \ln no. res_{it} + \beta_3 \ln no. grant_{it-1} + \beta_4 year_{it} + vit \quad (2)$$

其中, $\ln no. pub$, $\ln lev. ini_tech$, $\ln no. res$, $\ln no. grant$, $year$ 分别表示论文产出量、初始技术条件、人力资本、资助额以及时间, β_0 表示截距项, 误差项为 vit , $i=1, 2, \dots, 19$, 为横截面下标, $t=1, 2, \dots, 14$, 为时间单元下标。 $\ln no. grant_{it-1}$ 的设定是因为 NSFC 资助的项目批准时间与起始年份相差一年(见表 1)。

表 1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	样本数
$\ln no. pub$	27.425	35.185	173	0	11	43	294
$\ln no. res$	1.578	1.7736	8	0	1	2	294
$\ln no. grant$	50.980	111.39	1403	0	15	55	294

对于知识生产函数中资助额的估计应考虑基础研究耗时较长, 当前的研究可能几年以后才会形成生产力, 即存在“时滞”。Arora 使用 5 年滞后期分析美国公共资助的论文产出, OECD 国家高校联盟的论文产出时滞分析结果显示 1~6 年的滞后期是显著的。在欧美国家, 对基础研究进行资助后, 论文产出

最为显著的影响出现在第 5~6 年。Benavente 以 FONDECYT 项目为样本,对以获得项目资助后若干年内发表的论文数量为产出的知识生产函数,使用 OLS 估计发现科研人员数与论文产出在 1%显著性水平下相关系数为 0.1029。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投入产出存在怎样的规律?本文将利用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3 投入要素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论文产出的影响

3.1 基本回归分析

经过 LLC 单位根检验,发现 no. pub、no. res、no. grant 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不存在伪回归,可以直接进行回归。Westerlund 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 no. pub、no. res、no. grant 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说明这 3 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Hausman 检验值为 33.11,且 p 值为 0,应拒绝原假设;检验统计量 F 的值小于横截面固定效应 F 检验在 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即 $19.78 > 1.88$ 。F 检验统计量的值与临界值差距较大,因此,应拒绝模型截距和系数对各截面相同的假设。根据上述检验结果,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利用固定效应和混合 OLS 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发现两者所估参数方向相同,大小相差较小,且后者的统计特性和经济意义较为理想。另外,模型(1)中的初始技术条件 lev. ini_tech 为各省域固定不变,使用固定效应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发现其被剔除,造成模型估计的不完全。综合来看,应使用混合 OLS 估计法,结果见表 2。

表 2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基本回归

被解释变量:Lnno. pub	(1)	(2)	(3)	(4)	(5)	(6)	(7)
Lnno. res		0.139 2 (0.405)	0.133 9 (0.398)	1.789 4 *** (0.313)	1.825 0 *** (0.312)	1.745 0 *** (0.343)	1.656 7 *** (0.370)
Lnno. grant	0.390 8 *** (0.043)	0.292 7 (0.289)	0.398 9 (0.281)	-1.134 6 *** (0.225)	-1.239 7 *** (0.222)	-1.141 3 *** (0.227)	-1.237 6 *** (0.222)
Lnlev. ini_tech			1.452 9 *** (0.346)	1.806 0 *** (0.251)	2.860 5 *** (0.381)	1.819 2 *** (0.255)	12.508 4 (9.193)
Year				0.665 8 *** (0.043)	0.696 4 *** (0.041)	0.670 3 *** (0.045)	0.709 6 *** (0.044)
Lnno. grant × Lnno. res						0.009 1 (0.029)	-0.026 8 (0.031)
Cons.	0.971 5 *** (0.215)	1.239 5 (0.809)	-3.344 2 *** (1.345)	-6.214 9 *** (0.988)	-7.982 4 *** (1.086)	-6.205 1 *** (0.990)	-37.744 (27.983)
v_i	no	no	no	no	Yes	no	Yes
Ods.	266	266	266	266	266	266	266
Adj. R ²	0.236 2	0.233 6	0.279 2	0.624 9	0.664 1	0.623 6	0.663 7

注:数据来源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数据库; v_i 表示个体效应, i 表示省域;括号内数字表示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当仅引入 no. pub 时, no. grant 与 no. pub 显著正相关,弹性系数为 0.3908,拟合优度为 0.2362,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 no. grant 对 no. pub 的显著性影响消失。在模型(2)和模型(3)中,只考虑 no. res、no. grant、lev. ini_tech 时, no. grant 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且 no. grant 的系数值较小,说明科研产出与经费投入之间没有统计上的关系。模型(3)的拟合优度为 0.2792,说明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较差。方程(2)~(3)的 no. grant 弹性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刘云、许娇的回归结果一致。

引入控制变量 year 后,解释变量系统构造完成,模型(4)中 no. grant 对 no. pub 呈现显著负向影响,弹性值达到-1.1346,与模型(1)中的弹性数值大小相差近 3 倍,此时拟合优度为 0.624 9, F 检验值为 111.35,说明方程显著,这一结果显示科研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不一定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这虽然与我国诸多学者发现的结果相矛盾,但与 Crespi 的结论不谋而合。另外, no. res、lev. ini_tech、year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 cons 的弹性系数显著为负。控制变量 year、常数项 cons 与 no. pub 的相关关系虽在作用力度上存在大小差异,但在作用方向上与 Crespi 保持一致。

总的来看, no. res、no. grant、lev. ini_tech、year 联合起来对 no. pub 有显著影响, 且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较好, 说明随着时间的推进, 增加 NSFC 项目的年度授予量以及提升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博导人数均有助于论文发表数量的提升, 从而映证了 NSFC 五年期发展规划在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顺利实施的效果, 符合并体现了我国当前基础研究的实践情况。

进一步控制省域固定效应, 结果模型 (5) 中各变量的系数均未发生大的变化且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在控制省域的固定效应之前即模型 (6) 中, no. grant 与 no. res 交互变量的弹性系数为 0.0091, 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说明 no. grant 并未随着 no. res 的升高而变得更为重要。交互变量的系数为正, no. res 的弹性系数为正, 而 no. grant 的弹性系数为负, 说明 no. res 的升高会加强 no. grant 与 no. pub 的负相关关系, 但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控制了省份的固定效应之后即模型 (7) 中, 交互变量的系数方向发生变化, 由正变负, 系数绝对值大小迅速变大, 说明 no. res 的升高会减弱 no. grant 与 no. pub 的负相关关系, 而这种减弱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此时发生两个剧变: 在控制省域固定效应之前, lev. ini_tech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弹性系数为 1.8192, 而控制省域固定效应之后虽然弹性系数升至 12.508 4, 但此时不显著; 与此类似, 常数项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弹性系数为 -6.205 1, 而控制省域固定效应之后虽然弹性系数升至 -37.744, 但此时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各省域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自主产出意愿较强且差异较大。当前, 我国将科研成果数量作为评价科研人员学术贡献的主要指标, 因而科研人员数量多的省域, 其论文产出自然更多。

本文中当滞后期为 4 年时, no. grant 的系数由负转为正即 0.039, 说明中国基础研究特别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论文产出滞后期可能延长为 4 年。由于所得弹性系数显著性差, 因此需要再积累更多年度的数据以作进一步观察。

不论是否引入交互变量以及是否对省域的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本文所得关于 no. res 的系数在数值上都差距不大且均在统计上显著, no. grant 的系数在数值上差距不大且均在统计上显著, 说明无论是否控制省域固定效应以及是否引入交互变量, 关于 19 个省域的跨省数据并不分散且足够集中, 从而保证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但这一结果是否存在稳健性, 需要引入动态面板模型作进一步考察。

3.2 稳健性分析

本文在 OLS 估计时引入 no. grant、no. res 的滞后项, 在模型 (2) 右侧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 从而造成了估计的内生性问题, 为此可以采用广义矩估计法。由 Blundell 和 Bond 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GMM) 在 Arellano 和 Bover 提出的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的基础上增加了水平方程, 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 减小了一阶差分 GMM 估计量的偏误。GMM 估计包括一步 GMM 估计和两步 GMM 估计, 由于两步估计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 一步 GMM 估计利用了更多样本信息, 可以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 因此, 使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GMM 对方程 (3) 进行参数估计, 结果如表 3 所示。

而从模型 (10)~(13) 可以看出, 不论是否考虑 no. res 与 no. grant 的交互项, Sargan 统计量和 Arellano-Bond 的 1 阶及 2 阶自相关检验都显示, 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和二阶序列相关等问题, 呈现出良好的稳健性, 各模型所构造的工具变量均较为有效。

为了解决各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对总方程中的 no. res、no. grant、no. res $\times$ no. grant 均取滞后 1 期。与 Crespi 使用 PDL 估计所得结果相近, 进行基本回归时发现 no. grant、year、cons 与 no. pub 的相关关系与 Crespi 所得结果一致; 采用 SYS-GMM 时 no. grant 与 no. pub 的相关关系仍与 Crespi 的结果保持一致, 但 year、cons 与 no. pub 的相关关系却发生了反向, 从而进一步发现了回归结果的不稳定性。

模型 (9) 中, 滞后 1 期的 no. res 与滞后 2 期的 no. gran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意味着滞后 1 期的 no. res 的升高会减弱滞后 2 期的 no. grant 与 no. pub 的负相关关系, 从而引导滞后 2 期的 no. grant

与滞后 1 期的 no. pub 的正相关关系的发展。从模型 (8)~(9) 中可以看出, no. res 对 no. pub 的增加有显著的滞后促进作用, no. grant 对 no. pub 的增加有显著的滞后弱化作用。对比模型 (6)、(8)、(9) 发现, 加入 no. res、no. grant 的滞后项后, 各解释变量发生了如下变化: no. res、lev. ini_tech、year 的系数有小幅下降, 但仍显著为正, 而 no. grant、cons 的系数绝对值有较大幅度减少, 但仍显著为负, 3 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变化微小。虽然 no. res、no. grant 的弹性系数大小有较大变动, 但 no. res、no. grant 的弹性系数的显著性及方向与模型 (4)~(9) 的估计结果一致, 说明前述结论有较强的稳健性(作用强度改变, 但作用方向未变)。从模型 (10)~(13) 与模型 (4)~(9) 的对比发现, lev. ini_tech、cons 的作用强度变化不大, 但作用方向发生反向, year 不仅作用强度变化较大, 而且作用方向发生反向。

表 3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稳健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i>Llno. pub</i>	OLS		SYS-GMM			
	(8)	(9)	(10)	(11)	(12)	(13)
<i>L1. Llno. pub</i>			0.760 5*** (0.058)	0.759 4*** (0.058)	0.758 4*** (0.063)	0.770 3*** (0.068)
<i>Llno. res</i>	1.196 7*** (0.236)	1.307 0*** (0.240)	0.623 6*** (0.172)	0.586 5*** (0.226)	0.570 4*** (0.175)	0.543 7*** (0.186)
<i>Llno. grant</i>	-0.735 5*** (0.161)	-0.803 2*** (0.163)	-0.371 1*** (0.116)	-0.370 6*** (0.119)	-0.324 4*** (0.115)	-0.305 0** (0.122)
<i>Lnlev. ini_tech</i>	1.513 4*** (0.339)	1.581 7*** (0.328)	-0.195 9 (0.200)	-0.167 2 (0.196)	-0.270 2 (0.187)	-0.339 6** (0.173)
<i>L1. Llno. res</i>	0.692 8*** (0.227)	0.316 9 (0.252)			-0.029 3 (0.141)	0.077 9 (0.155)
<i>L1. Llno. grant</i>	-0.350 9** (0.157)	-0.381 6** (0.167)			0.047 5 (0.081)	0.058 4 (0.083)
<i>Llno. res</i> × <i>Llno. grant</i>				-0.006 0 (0.198)		
<i>L1. Llno. res</i> × <i>L1. Llno. grant</i>		-0.070 4*** (0.022)				0.019 9 (0.020)
Year	0.522 7*** (0.050)	0.562 6*** (0.053)	-0.049 7* (0.028)	-0.0463 (0.033)	-0.063 1** (0.031)	-0.084 5** (0.041)
Cons.	-3.790 9*** (1.132)	-3.557 0*** (1.146)	3.027 8*** (0.649)	2.959 4*** (0.665)	3.189 4*** (0.721)	3.349 7*** (0.679)
Ods.	247	247	247	247	247	247
Adj. R ²	0.623 9	0.638 5				
Sargen			0.682 2	0.682 0	0.668 4	0.711 5
AR(1)			-2.768	-2.792	-2.810	-2.810
AR(2)			-0.942	-0.993	-0.890	-0.962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主要结论及启示如下:

(1)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产出与资金投入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 1% 时呈现负相关关系, 使用 OLS 估计以及 SYS-GMM 估计均发现该结论得到了映证, 虽然结果与当前众多研究结果不同, 但与 Crespi 的结论不谋而合。另外, 本文数据来源于 CNKI 上公开发表的论文, 由于部分期刊未入网, 无法检索得到, 因此, 未入网期刊上所发表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获得 NSFC 资助的论文虽是项目产出, 但无法被广大研究者所获取, 形成了知识壁垒, 降低了产出效应, 其一旦形成规模势必影响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效率。

(2) 由于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在显著性水平为 1% 时呈现正相关关系, 且系数值较大, 在短期内大于 1.19, 在长期内大于 0.54, 所以, 增加 NSFC 项目的年度授予量以及提升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博导人数均在较大程度上有助于论文发表数量的增加, 这映证了 NSFC 五年期发展规划在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顺利实施的效果。因此, 应重点增加所获 NSFC 项目数量以提高学科基础研究的人力资本水平而非单纯提升项目资助额度, 以克服资金投入对产出产生的负效应。

作者: 胡琳娜 张所地 陈劲

来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 年第 19 期

MBA 会计学课程之教学思考

会计学



1 引言

我国自 1991 年第一批 9 所院校开办 MBA 会计学课程以来,到 2010 年新增 52 所第九批 MBA 培养院校,目前已有 236 所 MBA 招生院校。各个院校在 MBA 培养目标的表述上各有差异。如,清华大学 MBA 项目培养“具有综合管理能力的未来领导者”;中央财经大学 MBA 培养目标是“具备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力,拥有金融财务专长,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管理人才”。虽然表述上各有侧重,但最终落脚点都是培养经营管理人才。

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和财务管理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知识。但对于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会计学的专业技术性较强,比较难以理解,甚至有理工科背景的 MBA 学生都感到“会计学课内容听起来像天书”。怎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呢?为此,本文就 MBA 会计学教学课程设计等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2 MBA 会计学课程的设置

我国各个院校在 MBA 会计学课程设置上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只在核心课程中设置会计学,包括财务会计和报表分析内容,还包括成本和管理会计内容,学时安排上有 36 课时的,也有 54 课时的。另一种是将财务会计设为核心课程,另设财务与会计方向选修模块,选修课程包括管理会计、成本管理与控制、高级财务会计、内部控制与审计、高级财务管理、会计报表分析等,核心课程为 36 学时或 48 学时,选修课程为 36 学时。

笔者认为,MBA 会计学课程设置应包括财务会计(初级、中级和高级)、成本和管理会计以及会计报表分析内容。只在核心课程中设置会计学课,如果学时安排为 36 课时,则教学内容只能包括财务会计和报表分析内容,成本和管理会计内容就不能纳入其中了,否则受课时限制,教师讲解及学生理解都难以深入透彻。即使是只包括财务会计和报表分析内容,要在短短 36 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如果安排为 48 或 54 课时,则除了财务会计和报表分析内容外,还可包含成本和管理会计内容,并注意不要与财务管理课程内容重复。

3 MBA 会计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安排

1. 学习会计的语言和方法,理解并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提升学生阅读和理解财务会计报告的能力。这里的基本方法主要指各种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包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判断力,但不包括借贷记账法和会计核算程序等技术性方法。

MBA 会计学课程不是要把学生训练成为专业会计师,因此不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的会计技术方法,如借贷记账法。通常,初级财务会计学的教学要讲到会计核算程序,即企业经济业务发生后,首先要审核和填制原始凭证、再填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直到编制财务报表。中高级财务会计的内容涉及对企业各项经济业务编制大量的会计分录。而在 MBA 会计学课程中,这些内容完全可以不讲,可以直接将企业经济业务对应于各个报表项目,这就需要借助会计等式这个工具。例如,用银行存款支付办公费 1400 元,此项经济业务的会计分录如下:借:管理费用 1400 元;贷:银行存款 1400 元。

不过,即使对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讲,要完全搞清楚并记住应借记还是应贷记,借记或贷记哪个科目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MBA 会计学课堂教学完全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可以舍弃会计分录而以会计等式来代替。上述经济业务用会计等式可表述如下:

$$\text{资产} = \text{负债} + \text{所有者权益} + (\text{收入} - \text{费用})$$

具体来说,发生这笔业务,使银行存款和管理费用各减少了 1 400 元。这种方式可以直接将经济业务与报表项目联系起来,简单明了地呈现企业经济业务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绕开了借贷记账法。

学习各种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要能够评价不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理解管理层的会计政策选择,理解各种会计处理背后深层次的经济内涵和实质。例如,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有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两种模式下各自是怎样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的?对同一个投资性房地产项目,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式,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差异有哪些?差异有多大?为什么我国有的上市公司选用成本模式,而有的上市公司选用公允价值模式?对不同企业业绩进行比较分析时,如何考虑不同计量模式的影响?

2. 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方法,提升学生使用财务会计报告的能力。财务会计报告的阅读和分析,最好全部采用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实例,使财务会计报告的阅读和分析立足于真实的经济环境当中。在教学环节安排上,报表分析的内容不要全部放在一章讲,可将其其中的一些内容分散在平时进行,具体来说:

(1) 第一章导论课后,分小组进行作业,每组选取一家上市公司,再选取同行业 3 家上市公司,以便对比分析。通过收集这 4 家上市公司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了解该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所选上市公司的经营战略及竞争地位、股权结构和发展沿革等。

(2) 第二章“营业收入与速动资产”,应讲解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商业债权周转率;第三章“存货与营业成本”,应讲解存货周转率和商业债务周转率;第四章“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应讲解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第五章“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应讲解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每次课后各小组计算所选 4 家公司近三年的这些比率,并进行比较分析。

(3) 第六章对外投资与合并报表课讲解完后,各小组编制所选 4 家上市公司的趋势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动)分析表,分析发展趋势,包括成长性和波动性,分析资产负债结构和质量。

(4) 第七章“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应讲解毛利率、核心利润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和经营现金流流动负债比等比率。课后各小组计算所选 4 家公司近三年的这些比率并进行比较分析;编制 4 家公司的趋势利润表和利润表结构(变动)分析表,分析发展趋势,包括成长性和波动性,分析利润结构和质量。

(5) 第八章会计报表分析课讲解完后,各小组对所选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整体分析和对其财务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并对企业发展前景进行预测。

4 MBA 会计学课程教材的选择

目前国内 MBA 专用会计学教材,有的只讲财务会计的内容,有的既包括财务会计内容,又包括管理会计内容。这些 MBA 专用会计学教材与会计专业用教材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如章节安排上不再单纯按会计要素或报表项目来设置,而是考虑经济业务循环与报表项目之间的逻辑联系,如营业收入与货币资金、应收账款为一章、存货与营业成本为一章、对外投资与合并报表为一章。每一章后,增加了较多的案例分析和讨论题,而且多是采用中国本土的上市公司案例,更贴近中国的经济现实。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教材通常的弊端是侧重讲述会计要素的具体核算,缺乏对相关经济环境背景、企

业经济业务运作信息、各种会计原则和会计处理经济内涵与实质的阐述,内容不够丰富,体现更多的还是会计专业术语和会计核算等专业技术性内容。MBA 学生普遍反映教材“难懂”、“抽象”、“难以理解”,不如国外教材通俗易懂。

我国引进的西方尤其是欧美流行的会计学教材,多由蜚声国际的专家教授撰写,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较多地阐述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财务会计在现实世界中的基本问题,如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等,并配有大量丰富的案例。但国外教材的内容是以欧美社会经济环境为背景的,与中国的现实经济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不适合我国 MBA 会计学的教学。因此,应立足于自编教材的本土化,对 MBA 会计学教材进一步更新和完善,同时借鉴国外经典教材的优点,大量增加企业经营管理情境的设计,展示企业管理活动、管理决策与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使教学内容生动易懂。要考虑绝大多数 MBA 学生的非会计专业背景,不仅教材结构内容要改变,而且语言表达、叙述方式也要避免过于抽象和专业化,力争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5 考虑生源特点设计教学环节

MBA 生源的绝大多数是理工科或文科的学习背景,未接触过经济管理和会计学的知识,专职从事财务工作的人也很少。以清华大学 2012 级在职 MBA 学生为例,从学科背景来看,工科占 45.25%、理科占 7.60%、文科占 15.21%、商科占 30.04%、其他占 1.9%,可见非商科生源占大多数,总计 70%。从工作性质来看,财务只占 6.08%,其他按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综合管理 39.16%、项目管理 11.79%、市场管理 10.27%、销售管理 6.8%、技术管理 6.08%。从所处行业来看,IT/通信业 28.9%、商业银行 6.84%、机械制造业 5.7%,房地产 4.94%,其他还包括证券投资、贸易、咨询、能源/公用事业、教育培训、传媒广告业等。另外,在职 MBA 生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时间很紧张,因为平时要坚持工作,用于看书的时间很少。

MBA 会计学教学环节的设计必须考虑生源特点,以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在首次上课前,教师应取得所有学生学习工作背景的资料,将不同背景的学员安排在不同的学习小组,以便于学员在作业和讨论中取长补短。针对学员学习时间和精力有限的现实,课堂教学不能只由教师讲,学生被动听,应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笔者的做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每次教师讲课前抽取一个小组的报表分析作业进行展示和讨论。二是根据每次课程内容设计案例分析练习题,且练习题要与教学总目标和各章节分目标相关,侧重评价不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对企业的影响,如第二章营业收入与速动资产,案例练习题要求学生分析不同收入确认方式对企业利润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变更对企业利润的影响。要求所有学生当堂完成并提交练习题。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的学习效率和效果。

6 案例教学的思考

MBA 教学特别强调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在如何选择教学案例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是直接采用国外案例并不合适,迫切需要优秀的中国本土化案例。在我国各高校商学院建设的案例库中,原创性本土案例比重偏低,而且切合教学实际的案例很少(王冬梅,2012),存在着案例采编质量不高、素材来源渠道有限、使用率不高(王淑娟、胡芬,2008)等问题。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直接采用案例库中的案例,有的根据需要对案例库中的案例修改加工后使用,还有的采用自编案例。

针对 MBA 学生的专业背景非商科特点,笔者认为,在 MBA 会计学教学中不适合运用过多的案例,适宜采用课堂讲授为主、案例教学为辅的方法。根据课堂讲授的知识框架,设计相应的案例教学环节,具体包括:①分小组,选用不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对比分析;②针对每次课程中的知识点,选用

难度适宜的中小案例，侧重评价不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③对课程进行总结性学习时，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程度可以选用有一定难度的综合性案例进行分析。

作者：盛庆辉 张秀萍

来源：《财会月刊》2014 年第 7 期

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学》教学思考



2012 年被称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这一年，以中国平安和腾讯以及阿里巴巴在上海成立合资保险公司为引爆点，互联网金融进入“爆炸式增长”或者“野蛮增长”时代。一时间，余额宝、“微银行”等新兴词汇甚嚣尘上。那么，迅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将会对传统金融体系造成何种影响？以阐释金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学》课程教学体系又该如何随之变化？基于这一逻辑，本文将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互联网金融对金融体系可能的影响，以及由此，《金融学》教学上应有的改变。

1 互联网金融发展态势及特征

1.1 互联网金融发展态势

（1）互联网金融模式越来越多样

2012 年后，互联网金融取得迅猛发展，各种互联网金融模式纷纷出现。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一是传统金融业建立自己的互联网渠道来开展业务。如 2012 年 6 月，建行启动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平台“善融商务”；随后，华夏银行和交通银行又分别推出了“电商快线”和“交汇博”。二是互联网巨头进军金融行业。如，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提供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苏宁电器与香港苏宁及苏宁电器集团共同出资设立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都属于此类。三是互联网企业与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如中国平安等十余家险企入驻淘宝网和京东商城，直接在网上销售保险。四是新设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如宜信、红岭创投等新设立的 P2P 公司。

（2）互联网金融的体量增长迅速

尽管互联网金融兴起较慢，但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以 P2P 行业为例，我国第一家 P2P 网络平台宜信公司于 2006 年 4 月才正式成立。2011 年以后，P2P 网贷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据统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有 43 家（实际营业的是 31 家，有些在统计时还没有开展业务）网贷平台，为 16692 名借款人和 49625 名投资者提供交易平台，成交金额为 109.96 亿。安信证券 2012 年底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到 2013 年底，P2P 网贷平台的成交规模或可达 600 亿元。互联网金融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300%，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3）互联网金融行业越来越规范

在追求体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互联网金融行业也通过不断地自律与他律，规范行业经营秩序，积极拓展行业发展空间。同样还是以 P2P 为例，整个行业也是处于不断规范的过程中。2012 年 11 月，

P2P 行业委员会成立；12 月，首届 P2P 小额信贷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峰会在北京召开；2013 年 8 月，全国首个基于互联网提供服务的征信系统——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正式上线；同月，《个人对个人（P2P）小额信贷信息咨询服务机构行业自律公约》正式对外发布。

1.2 互联网金融的特征

（1）交易双方广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边界。互联网金融中的活动主体呈现的是散点网格状的多对多的形式，参与对象为非特点主体，因此，其参与者极其分散和广泛。在 P2P 借贷中，借贷者只要有良好信用，即使缺乏担保抵押，也能够获得贷款；而投资者即使拥有的资金量较小，对期限有严格要求，同样能够找到匹配的借款人。并且每一笔贷款中可以有多个投资者。

（2）交易规模大成本低

信息尤其是信息整合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保证了互联网金融能以更低的成本为更多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以阿里巴巴的小额贷款为例，截至 2012 年 9 月，阿里小贷已累计为 13 万客户提供融资服务，贷款规模超过 260 亿元，日均可以完成近 1 万笔户均贷款金额 7000 元的贷款。并且不良贷款率为 0.72%，低于我国银行业 0.95% 的水平。在成本方面，供应商利用京东供应链金融平台获得融资的资金成本为每日 0.019%，也远低于同类银行贷款产品的年利率。

（3）交易方式灵活高效

互联网金融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及个人消费贷款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包括贷款审批流程简单、放款速度快、产品类型丰富多样等。例如，专注于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阿里信贷，其淘宝商户贷款流程包括：3 分钟申请、没有人工审批、1 秒到账到帐。而在 P2P 借贷中，从借贷金额、利息、期限到还款方式和担保抵押方式方面，借款者和投资者的需求都是多样化的，需要相互磨合和匹配。而这种磨合中，形成了多样化的产品特征（尤其是市场化的利率）和交易方式。

2 互联网金融对《金融学》教学的影响

（1）互联网金融带来金融理念的改变与一般的民间金融不同，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交易双方并不需要熟识。交易双方可以在交易前、交易中，乃至交易后都不认识。而与正规金融又不同的是，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借款人并不需要抵押和担保，而只需要提供资信证明。因此，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金融理念是“信用创造价值”。

（2）互联网金融打破了商业银行的服务边界由于服务低端客户的收益与成本不匹配，商业银行不能高效地应对中国最庞大的“金融弱势群体”——中低收入工薪族、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这些借款人往往缺乏有效担保和抵押，且对贷款产品的需求个性化特征明显，因此被传统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而互联网企业的进入，去除了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的障碍，不仅作为工具提升交易效率和降低成本，同时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与便捷信息流而产生的征信手段的创新，拓宽了金融业服务的目标人群。

（3）互联网金融将挑战商业银行金融中介功能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交易双方之间完全依赖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进行联系和沟通，客户信用等级的评价以及风险管理也主要通过数据分析来完成。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互联网金融不仅有助于交易双方信息沟通充分、交易透明、定价完全市场化，而且也能大大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收集成本、信用等级评价成本、双边签约成本以及贷后风险管理成本。

(4) 互联网金融挑战传统金融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方式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 市场参与者更为大众化和普及化, 普通公众、中小企业可以像大企业客户一样, 通过互联网参与各种金融交易。而且最重要的是, 与传统金融体系下客户的基本诉求不同的是, 方便、快捷、参与和体验成为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客户的基本诉求。此时, 传统金融为客户提供的那种基于密集知识和复杂技术的金融产品的优势将被削弱。

3 对《金融学》教学的反思

进入数字化时代后, 金融发展日新月异。金融运行的理念、基石都在悄悄发生变化。而且, 在传统金融中普通大众往往难以直接参与的金融活动,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却能很方便地参与。因此, 《金融学》教学应该体现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的这些变化。具体来说:

首先, 在教学目标上, 应强调提高学生的金融素养。传统《金融学》教学往往以理论教学为主导。结果, 过多生硬且落后于金融实务发展的理论学习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学生也会认为所学知识没有用处而没有动力学习。而互联网金融时代, 金融实践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 不仅关注理论知识学习, 《金融学》课程还应该鼓励学生关注金融热点, 参与金融活动, 提高自身金融素养。

其次, 在教学内容上, 应适当补充非正式金融的内容。现有的《金融学》教材基本没有非正式金融的内容。但是, 互联网金融尽管方兴未艾, 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形式也还只是一种民间金融。而且, 从逻辑体系来讲, 缺乏非正式金融的介绍, 学生也往往难于理解。比如, 在关于信用中, 现有的四种或五种(加上国际信用)分类, 并不能囊括学生所观察到的常见信用现象, 必然会引发疑问。因此, 在教学内容安排上, 可以通过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当补充来引入互联网金融。

最后, 在教学方法上, 应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强调体验式教学。在传统金融体系下, 因为参与资金、参与成本的限制, 学生很少能参与金融活动。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一个变化是, 学生能以极少的资本、极低的成本参与一些金融活动。这样, 通过体验式教学, 不仅让学生能积累起金融实践知识, 而且, 学生也会通过自己对微观金融活动的体验, 提升对宏观金融的分析能力。

作者: 熊芳

来源:《教育科学》2014 年第 2 期

创新生态系统: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



创新被认为是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中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经济全球化、环境动荡性的背景下, 单一组织很难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 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其他类型组织之间的协同共生成为了研究与实践的新趋势。创新的商业不能在真空中演化, 必须吸引各类资源, 吸纳资金, 合作伙伴, 供应商, 客户, 以创造合作网络。由此,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了全球化经济变革时代创新创业、政府管理、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创新生态系统, 如同生物系统一样, 从要素的随机选择不断演变到结构化的社群。从系统的角度, 企业不再是单个产业的成员, 而是横跨多个产业的生

态系统的一部分, 在一个生态系统之中, 企业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提升能力: 他们依赖合作与竞争进行产品生产, 满足客户需求并最终不断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 由关注系统中要素的构成向关注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间的动态过程转变。实践领域对于创新生态系统做了许多探索, 并从国家政策、产业环境改善、文化氛围打造、人才支撑、经费投入等各个方面做了深入。2013 夏季达沃斯论坛以“创新, 势在必行”为题, 强调经济体系、发展环境、行业企业等在面对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治理体系等新兴产业、技术和管理的不断创新时, 应成为一个开放、吐故纳新、动态的系统, 一个有强健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然而,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 首先, 自 Moore 提出生态系统概念以来, 已经有 20 年时间, 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仍处于隐喻与概念探讨阶段, 研究多从案例出发, 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架构; 其次, 基于前一个缺口, 现有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基于不同的出发点, 形成了缺乏共同知识基础且较为分散的文献, 进而减弱了文献对话与理论互通的可能性, 限制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意义与理论价值的延伸。基于此, 本文试图采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 从理论源起和知识演进的角度全面梳理创新生态系统的。

1 研究方法

1.1 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 这是因为运用数学方法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和整体进行量化研究, 有助于揭示其发展规律。具体而言, 本文采用共被引分析 (co-citation analysis) 的方法, 这是因为基于共被引分析的基础, 研究开始关注于可视化技术的应用, 可以描绘创新生态系统领域的结构与知识动态。可视化技术与方法能够绘制学科知识图谱, 动态清晰、直观形象地全面解读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进展、热点前沿、学科知识结构及其动态演化关系。

1.2 分析工具确定

本文以共被引分析为基础, 采用 Citespace 分析软件进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讨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知识基础、理论进展和研究趋势。Citespace 软件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教授陈超美开发, 用于分析科学文献与理论的发展趋势和演进并将其可视化。Citespace 的主要功能包括作者、机构、国家、术语和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引文、作者和期刊的共被引分析, 文献耦合分析, 爆发词或爆发文献探测等。

1.3 数据来源与检索规则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 创建的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其为国际上最重要、最有学术权威性的引文信息源。在数据库的基础之上, 本文围绕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主题, 限定“主题= ecosystem”, “文献类型= Article”, “类别= management or business or operations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or economics”, “时间跨度= 所有年份”, “数据库= SCI-EXPANDED, SSCI, A&HCI, CPCI-S, CPCI-SSH, CC R-EXPANDED, IC”, 对英文文献进行检索, 共计检索到 1236 篇, 并根据 citespace 要求, 导出全部文献及其参考文献, 以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池。分析展开时, 本文选取时间范围 1980—2013 年, 以 1 年为时间片段, 对数据池中所有文献及其参考文献的主题, 摘要, 关键词等进行选定, 并应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 分析结果: 理论源起、聚类特征与知识演进

2.1 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源起

Moore 是第一个系统而又科学地论述企业生态系统的学者，他将企业生态系统定义为一种“基于组织互动的经济联合体”，并进一步认为“企业生态系统是一种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机构、工会、政府、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组织或者群体构成的动态结构系统”。在此基础上，Iansiti 和 Levin 提出生态位的概念来阐述创新生态系统，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由占据不同但彼此相关的生态位的企业所组成，一旦其中的一个生态位发生变化，其他生态位相应也会发生变化。进一步，Adner 关注于创新生态系统本身，其认为创新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的变化与生态系统的成员参与，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一种协同机制，企业这种协同机制将个体与他者联系，并提供面向客户的解决方案，输出价值。

2.2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聚类特征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学问或专题。依据本文的分析规则，数据池一共选定有效的参考文献 18280 篇，无效参考文献 5 篇，形成整合的创新生态系统知识网络包含 256 个结点，1059 条关联路径。知识图谱的聚类特征如图 1 所示。图 1 中，每个圈由不同颜色的环构成，环代表该年份的文献的被引情况，环越大，则该文献被引的频率越高，对于红色或粉红色的环，则说明该文献在某一年份引用率突进，也即该主题成为研究热点。由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知识演进聚类特性出发，30 多年的经济与管理领域中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聚类群（以高频主题词的聚类特征描述）包含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价值创造(value creation)，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s)，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气候变迁(climate change)，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理论架构(theoretical framework)，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生态服务(ecosystem service)。



图 1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聚类特征

去除文献基础很少，关联系较弱的概念框架、气候变迁、温室气体、理论架构、可持续发展、生态服务这六个关键词，进一步分析可得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研究的研究热点包括以下彼此高度聚合的四个关键聚类——商业生态系统、价值创造、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聚类以 **Moore, Lansiti** 等人的研究为基础，是生物生态系统概念向组织管理领域的最早延伸，将企业由作为独立、自治的实体转向企业与利益攸关主体间的利益共生、相互依存转变，未来的企业竞争将由单个公司之间的技术竞赛，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在商业生态系统概念及其战略讨论的基础之上，以 **Adner** 为核心的学者关注创新生态系统聚类，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企业实现与个体或其他行为主体的联系，提供面向客户的解决方案并实现价值输出的协同机制，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单一组织无法实现的价值创造，其优势表现在平台领导、战略支配、开放式创新、价值网络、以及超链接组织等方面；相比创新聚类以 **Chesbrough** 的研究为基础，主要聚焦于研发层次，关注企业研发过程对生态系统伙伴创意与知识的整合，从而引发组织边界模糊与渗透对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最后，价值创造聚类以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目标与绩效切入，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依赖于生态系统中生产互补性产品或服务的组织，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价值创造的途径包括为单一企业创新过程提供便捷，以及为创新群落创造价值溢出。

2.3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知识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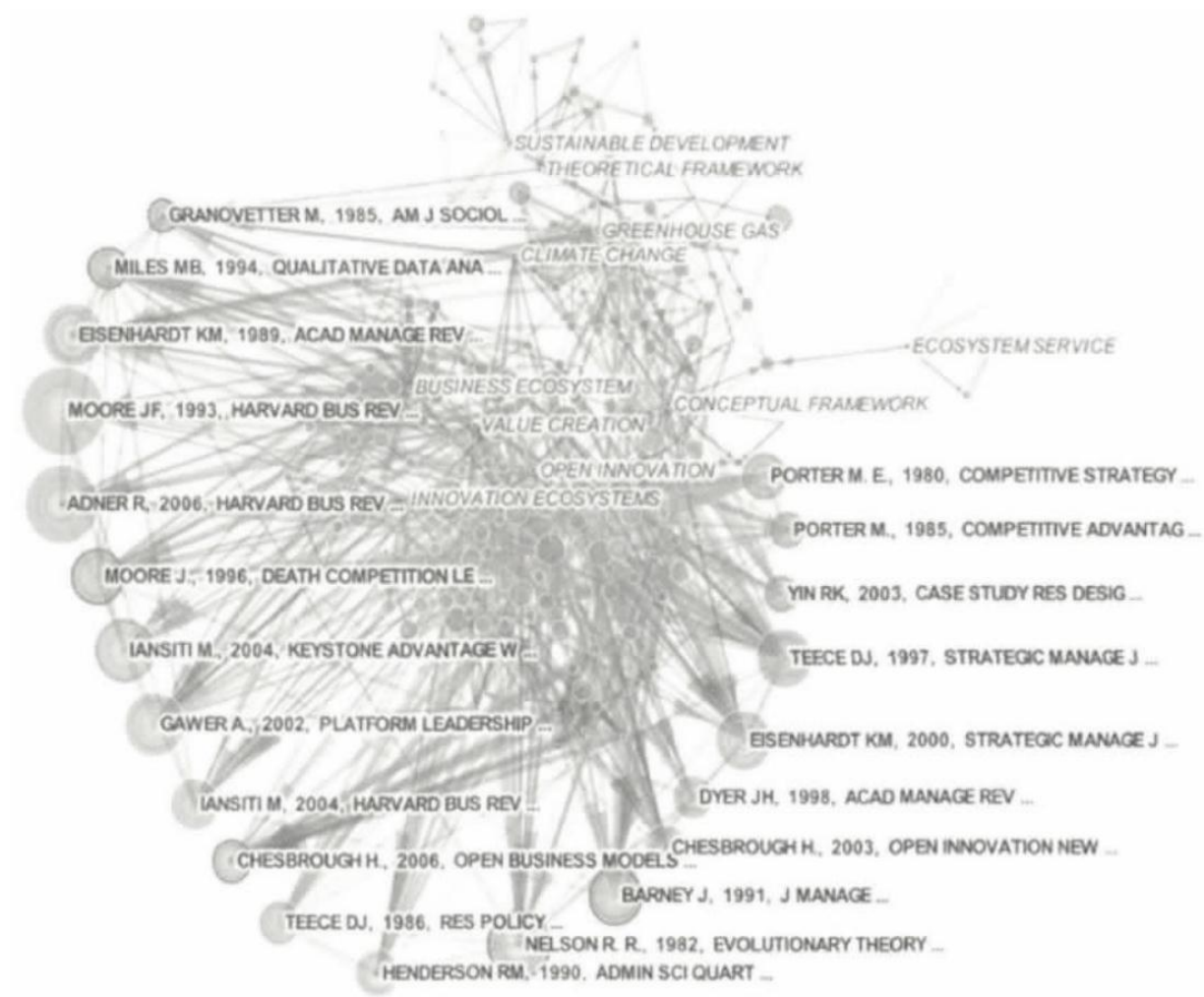


图 2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前沿演进

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也推动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持续演进。普莱斯

(Price) 观察到科学家似乎情形与引用最新发表的文章, 他提出“研究前沿”的概念, 用来描述研究领域的动态本质。刘则渊把研究前沿定义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如研究思路), 研究前沿的引文就形成了相应的知识基础。陈超美认为研究前沿是一组突现(突现测度的是文献被引频次或关键词出现次数等的变化率)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演进, 以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 价值创造(value creation), 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 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s)四个主要主题词的构成了研究的理论核心, 也形成了图 1 中的理论集聚, 聚类中大圈的文献形成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知识节点, 粉红边缘的文献形成了研究主题的突现, 如图 2 所示, 表 1 对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代表作品进行了梳理与整合。

表 1 创新生态系统主要研究成果

序号	年份	作者	年被引 频次	中心 度	文献名	来源	互引 关系图
1	1980	Porter M E	10	0.8	Competitive Strategies	图书	
2	1982	Nelson	13	0.05	Evolutionary Theory	图书	
3	1985	Porter M E	8	0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图书	
4	1985	Granovetter M	6	0.17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	1986	Teece D J	9	0.11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licensing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olicy	
6	1989	Eisenhardt	13	0.2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7	1990	Henderson and Clark	9	0.04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8	1991	Barney J	11	0.8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9	1993	Moore J F	17	0.87	Predators and prey: 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0	1994	Miles M B	8	0.07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图书	
11	1996	Moore J F	10	0.22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Business Ecosystems	图书	
12	1997	Teece, Pisano, Shuen	12	0.48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3	1998	Dyer and Singh	9	0.42	The relational view: 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2000	Eisenhardt M	12	0.49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2002	Gawer A, Cusumano	13	0.2	Platform Leadership	图书	
16	2003	Chesbrough H W	9	0.04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图书	
17	2003	Yin R K	8	0.4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图书	
18	2004	Levien R, Iansiti M	13	0.26	The Keystone Advantage: What the New Dynamics of Business Ecosystems Mean for Strategy,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图书	
19	2004	Iansiti M, Levien R	10	0.02	Strategy as ecolog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	2006	Chesbrough H	8	0	Open Business Models	图书	
21	2006	Adner R	15	0.89	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图 2 与表 1 的研究结果显示: 首先,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被引率最高的文献涉及 21 篇(文献大圈显示), 时间跨度从 1980 年 Poter 的《竞争战略》到 2006 年 Adner 对企业战略与创新生态系统

的匹配研究;其次,最高引用度的文献期刊源显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文献主要来源于组织管理领域;再次,Nelson、Moore、Levien 和 Iansiti、Adner 的研究成果具有最大的被引圈层半径,形成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引用率最高的文献基础;最后,Nelson、Granovetter、Barney、Miles、Moore、Chesbrough 等人的研究成果被引圈层显示外圈粉红色,反应这些研究在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演进的过程中具有突变性,研究贡献在理论演进的某一个阶段显著增长。

3 分析讨论:理论框架构建

基于上文分析,本文构建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如图 3 所示,本文所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核心特征、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三个模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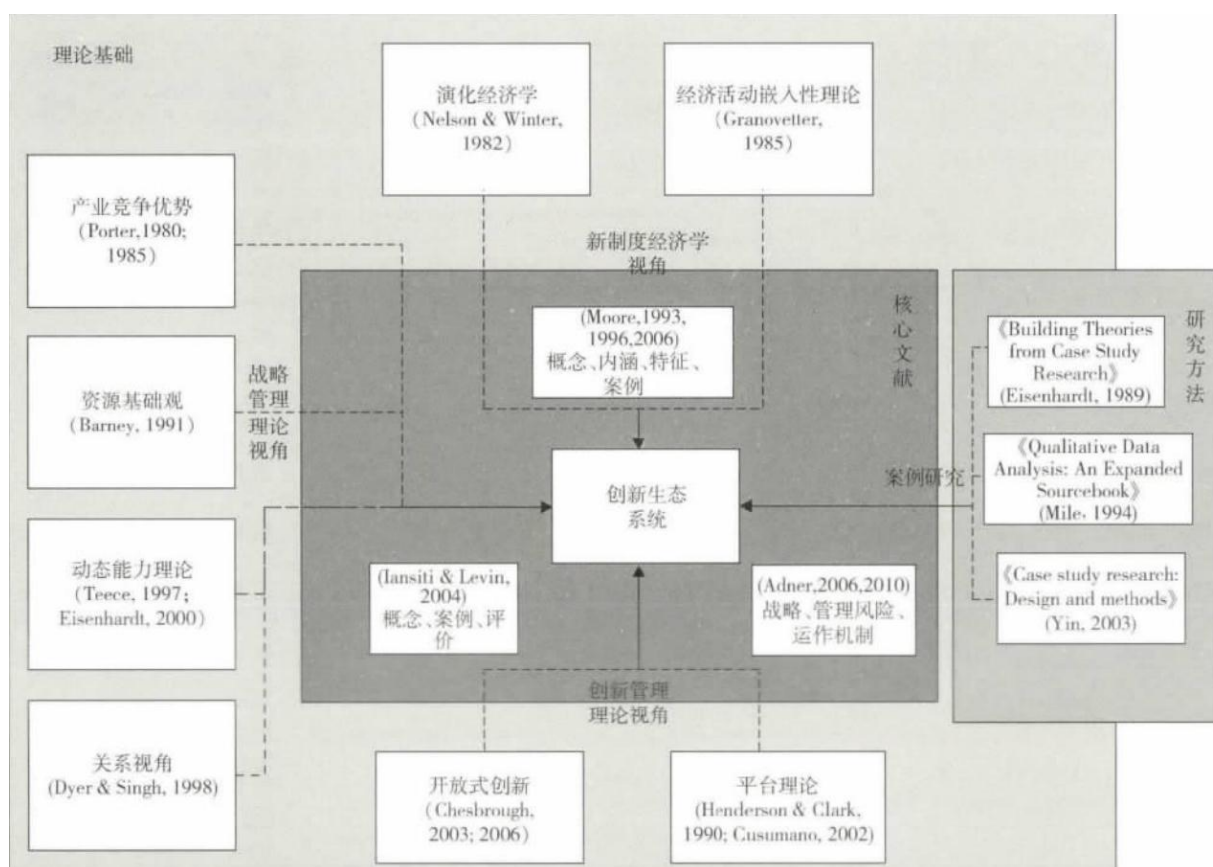


图 3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理论框架

3.1 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特征——共生演化

自然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具有一定大小和机构的整体,其中个生物借助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形成具有自适应、自调节和自组织功能的复合体。创新生态系统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类比概念,Moore 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共生进化”,而不仅仅是竞争或合作。

创新生态系统是由企业、消费者和市场及所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构成的系统,其包含由供应商、分销商、外包企业、产品与服务制造商、技术提供者,其他组织等共同构成的松散网络。这个松散的联结网络为创新生态系统成员创造了共生条件,提供了灵活的关系选择与系统设计条件,共生演化也成为了促进生态联盟有效的最后一条途径。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将商业战略由简单的联合作

业向协同、系统的合作转变,从产品竞争向平台竞争转变,从企业独立的发展向共生演化转变。随着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成员组织与环境动态性的增强,过去传统只强调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而无视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整体利益和生态系统共生发展与繁荣的经营理念已经落后,企业不再将自己看成是单个封闭组织,而有意识地与相关组织组成一个整体,将自身命运与整个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实现共生演化。以国外大公司为例,苹果、IBM、福特、沃尔玛等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纷纷建立自己的服务、工具、技术、价值网络平台,使得生态系统的其他组织成员参与并获得价值回报,同时强化生态系统总体的创新与生产率提升。伴随成员的共生演化,创新生态系统逐步演变为由一个参与者到为多个核心产品提供互补性资产增值、并遵照统一标准的多组织社群,并最终创造单一企业无法创造的价值。

3.2 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经济、战略、创新三大流派

创新生态系统在理论研究中是一个新生的概念,概念本身来自生物学的类比。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分析,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三大流派。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重点强调基于有限理性的共演关系。一方面,演化经济学理论关注并解释事物伴随时间而产生的不断运动与随机变化。许多研究关注于生态系统中要素与过程的演化,如 Cook, Malerba, 以及 Martin 和 Sunley。随着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成员组织与环境动态性的增强,过去传统只强调自身生态系统共生发展与繁荣的经营理念已经落后,企业不再将自己看成是单个封闭组织,而有意识地与相关组织组成一个整体,将自身命运与整个生态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实现共生演化;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嵌入性理论认为,完全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行为不受社会关系的影响是不合理的,行为和制度总是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控制,需要考虑个人与组织在经济行为中的社会因素。其将创新生态系统中个人与组织的商业行为附于社会情境影响因素。

基于战略管理理论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则强调产业和资源对于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影响。首先,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来源于 Porter 的研究成果,研究聚焦于产业组织与产业结构的分析视角下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而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的产业定位以及差异化程度。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基础,企业竞争优势强调成本领先、差异化、集中等战略将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互动过程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参考;其次,资源基础观研究资源异质性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同时测度提升竞争优势的特殊资源。Barney 进一步将企业活动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包含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以及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并强调组织资源与环境进行匹配。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本身属于企业资源范畴,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反映在资源的属性以及生态系统与环境的共生关系之中;再者,动态能力理论认为组织持续的竞争优势不仅仅要求难以复制的资源,还要求组织具备难以模仿的动态能力。动态能力驱动商业企业创建、部署以及保护无形资产以支持持续的商业绩效,它不仅适合创新生态系统,同时通过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其他组织实体间的合作与创新来塑造创新生态系统;最后,关系视角是企业特殊资源的拓展,它认为企业资源延伸了组织边界并嵌入于组织间的资源与共生路径之中。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关系视角存在四种潜在的组织竞争优势资源——包含生态系统成员的特殊关系资产、知识共享路径、互补性资源与能力、以及生态系统的高效治理。

基于创新管理理论视角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强调打破边界实现跨组织的功能互补。一方面,以开放式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聚焦内部研发过程中对于创意与知识的联系与应用,强调组织在创新投入、创新产生以及创新商业化过程总的边界渗透与模糊化,其聚焦于研发,而非企业的商业战略。作为理论视角的一种探索,当创新生态系统分析的对象为研发密集型企业时,一个特定的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了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以平台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概念涉及市场中的不同物品(产品线)、软件工程(软件系统)、经济要素(汇聚两面市场客户的产品与服务)、信息系统、以及工

业组织等,其由多个模块共同构成,功能共享,并实现生态系统模块间的互动与信息流通。平台理论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建立在那些服务、工具、技术等能够为生态系统成员创造绩效与价值的平台之上的,焦点企业是平台的中心,提供平台的核心功能,生态系统的其他成员丰富完善平台的功能,形成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模块。生态系统通过合理的划分机制形成各自相对稳定的平台以及一组相互支持、功能互补的模块,从而改变系统整体的设计规则,形成生态系统层面的架构创新。

3.3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案例分析

根据 Citespace 对创新生态系统核心文献及其共被引关系的分析,高被引度的文章涉及研究方法的包含三篇,分别为 Eisenhardt 1989 年的文章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Mile 1994 的书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以及 Yin 2003 年的书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三篇参考资料均涉及案例研究方法的介绍。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与试验、问卷调查等其他研究方法相比,案例研究更有利于摆脱现有文献和过去经验的束缚,从而更适于应用于全新的社会研究领域以及构建新的理论框架。Yin 指出案例研究方法通过采集数据与资料研究一定情境下的现象特征,从而全面和深入的调查分析现象的本质。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构念尚处于研究状态的情况下,案例研究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主导方法。Moore 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每阶段的案例分析深入描述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历史,一共涉及八个阶段:包括(1) IBM 公司的模块化技术与惠普公司的柔性组织;(2) 苹果公司的生态系统远景与发展实践;(3) Sun 与 AT&T 公司推进开源系统以反对商业垄断的突破;(4) 康柏公司与 IBM 试图通过生态系统的资深成员阻滞英特尔公司的创新发展;(5) IBM 与惠普打造共同目的的生态志愿者社群;(6) Web2.0 的发展;(7) 美国企业利用司法系统完善创新生态系统的规范;以及(8) 生态系统的组织被广泛推行等。Iansiti 和 Levien 在其代表作中也讨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案例,如 IBM 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平台、设计规则与纵向一体化;苹果运作的关键在于松散耦合的创新生态系统与网络;以及微软成功的关键在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其生态系统包含顶级增值经销商、校园经销商、小型专业公司、广泛增值经销商、培机构、系统集成商、开发服务商以及独立软件供应商等。Rohrbeck 深入挖掘了德国电讯公司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案例,认为德国电讯公司成功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开放传统的流程同时大量应用生态系统的外部创意与知识资源。Yan Ru Li 分析了思科创新生态系统的典型案例,认为思科价值创造与竞争优势提升的关键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平台建设。Adner 分析了美国空中客车公司 (Airbus Company) 利用创新生态系统成员间技术与组织结构的相互依赖推进技术创新并实现价值创造的机制。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既要精确地分析“焦点企业”的创新变化,又需要讨论外部合作伙伴的创新变化。由此,创新生态系统的主流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为主,案例研究能够描述不同类型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复杂性的深入洞见。

4 结论与展望

伴随研究与组织管理实践的演进,市场、科层、以及生态系统已成为现代商业思想与研究发展的三大支柱。本文以科学计量方法为依据,利用 citespace 对于已有研究数据库中涉及创新生态系统的主题论文进行梳理,描绘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知识图谱,对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源起、聚类特征与知识演进等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框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源起为生态系统理论,在经济管理领域其主要研究热点为商业生态系统、价值创造、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系统、概念框架、气候变迁、温室气体、理论架构、可持续发展、生态服务,以主题词所产生的文献基础及被引数量为依据,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商业生态系统、价值创造、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系统四个聚类。

第二,研究演进的知识图谱显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被引率最高的文献(包含书籍)总计 21 篇,全部涉及组织管理领域,时间跨度从 1980 年波特提出竞争战略到 2006 年 Adner 讨论创新

生态系统战略, 知识图谱形成了以 Nelson、Moore、Levien & Iansiti、Adner 为代表的最高被引率文献与以 Nelson、Granovetter、Barney、Miles、Moore、Chesbrough 等人为代表的突变性文献研究基础。

第三, 在科学计量的基础上, 本文搭建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框架: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以 Moore, Iansiti 和 Levin, Adner 研究成果为核心的圈层, 以共生演化为核心特征, 以案例研究为主流方法, 以制度经济学视角、战略管理理论、创新管理理论为三大主要流派。其中, 新制度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和嵌入性理论, 战略管理理论中的产业竞争理论、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关系视角理论, 创新管理理论中的开放式创新和平台理论等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未来,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如下方面: 首先, 理论方面, 创新生态系统成熟的研究多围绕概念、特征、案例的描述出发, 核心研究的论文多义哈佛商业评论为主要期刊, 由此, 亟待从理论与多理论的逻辑出发寻找解释创新生态系统及其组织运作的原理、机制, 同时探索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成熟构念, 寻找生态系统实践导向下各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 其次, 研究方法上, 既能精确地分析创新生态系统中焦点企业的创新变化, 又能讨论外部合作伙伴的变化, 并可分析各利益主体价值交换之外的创新挑战。未来组织能力的竞争, 是其能否构筑商业平台和生态体系的竞争,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 最后, 创新驱动发展的当下, 中国企业面临高度约束的转型经济制度环境, 基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强调企业依靠自主研发力量完成技术突破, 并取得原创性的科技成果。然而, 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单一组织资源与能力的有限性、产学研合作主体的目标不一致、技术创新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研究需要丰富与深化自主创新的内涵, 异质性主体协同、互利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范式与治理机制探索成为整合资源,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向。

作者: 梅亮¹, 陈劲², 刘洋³ (1.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来源: 《科学学研究》2014 年第 12 期

服务业统计研究的国际进展与展望



0 引言

随着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 服务业统计数据用户的数量 and 需求日益增加。面对大量迫切的数据用户需求, 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大力发展服务业统计工作, 服务业统计质量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服务的特殊性、各国经济水平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差异性、服务生产过程的国际性等因素, 无论是国家层面, 还是国际层面, 服务业统计仍有许多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远远不能满足数据用户的需求。

要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服务业统计的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托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UNS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等国际组织, 促进更多国家的统计机构和经济统计学家开展深入的服务业统计研究, 加强服务业统计研究的国际整合。目前, 服务业统计的国内和国际需求、服务业统计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服务业统计研究与发展的国际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服务业统计的未来研究方向是亟

待研究解决的课题。

1 服务业统计的需求分析

1.1 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的需求

服务业统计首先必须为国家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依据,不同宏观政策的数据用户对服务业统计数据的需求不尽相同:

(1) 国民经济核算:它是服务业统计数据最为关键和最有影响力的使用者,同时也是这些数据的生产者,在统计服务业生产总值的时候,既需要使用结构化数据进行基准统计,也需要辅以短期指标进行推测统计,并尽量做到两者的平衡,才能正确反映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

(2) 中央银行:央行关注的也是宏观层面的数据,除了各种服务价格指数,以及与服务业产值和需求相关的短期指标(如订单、零售、出口、就业和劳动力成本等)外,为了保证货币稳定,央行还需要与贸易和国际收支相关的信息。

(3) 财政部:除了关心与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计量经济模型相关的宏观数据外,财政部还关心与长期竞争力相关的指标,如生产率、经济增长或投资的驱动因素、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等。

(4) 商务部:商务部需要详细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来了解国际贸易进展和监控国际贸易协定。就服务贸易而言,其统计数据除了要满足《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需求,还要满足其他区域贸易协定,如欧洲单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需求。由于大多数服务只能在当地传递或交付,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成为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主要形式,所以对 FATS(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FDI(外商直接投资)、海外临时工提供服务进行科学统计是必要的。

(5) 工业部和各行业协会:除了宏观数据,它们还需要微观层面的工业和服务业数据进行经济分析,以便了解经济增长中的动力和障碍、行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和对 FDI 的吸引力。具体来说,它们更关注有关中小企业的绩效、生产率、劳动成本、人力资本、创新、研发、科技、信息社会、ICT(信息和通讯技术)与其他动态增长领域的统计数据。

1.2 服务企业决策的需求

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企业需要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所以它们对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的发展更为关注,它们需要宏观的工业和服务业数据对经济环境进行分析,也需要微观的企业绩效、生产率、劳动成本、人力资本、创新、研发、科技、信息社会、ICT 等数据对市场和竞争对手进行分析。

1.3 数据国际比较的需求

在国际贸易中,服务业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商业存在、服务外包等发展迅速,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和服务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产生了对服务业统计数据国际比较的迫切需求。此外,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金融、卫生、教育、旅游、交通运输、环境、文化和法律等服务业监管部门对于本国服务业对经济贡献的数据以及数据的国际可比性、本国服务业改变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数据以及数据的国际可比性越来越关注。

2 服务业统计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需求分析可以看到数据用户对服务活动、服务企业竞争力、服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绩效、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统计数据的迫切需求,然而,目前世界许多国家提供的官方服务业统计

数据并不能完全反应整个服务业的规模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服务企业)相关的统计数据不足,已有的统计数据无法真实反应服务业增加值和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大大影响了国家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行为,也使得数据无法进行国际比较,因此,急需改进服务业统计工作。

改进服务业统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服务业统计的研究,企业经营者、专业组织、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媒体等必须充分认识改进服务业统计需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具体的研究内容,见表 1。

3 服务业统计研究的国际动态和最新成果

为了解决表 1 中的问题,2003 年 3 月,UNSC 邀请 OECD 协助开展当时由国际组织和国际专家小组承担的服务业统计研究与发展工作,十年来它们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大大提高了服务业统计的质量,相关的国际动态和最新成果如下:

3.1 服务产品分类体系和方法的修订

目前在国际上对服务产品分类比较有影响力的体系和方法有: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中央货品分类号列(CPC)、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PM)、欧盟统计局(EUROSTAT)关于服务价格及总量计量的手册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分类标准(ANZSIC)、北美工业分类系统(NAICS)和北美产品分类系统(NAPCS)等。这些分类体系和方法规定了服务业和其统计数据的基本概念、定义、框架和国际标准,随着它们的推广实施,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数据越来越多。

从长远观点来看,改进服务产品的术语表,促进其在商业和贸易统计中的使用,是提高服务业统计质量长期目标的重要因素。2004 年 6 月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分类专家组和技术小组(TSG)启动 CPC 第二版修订工作,2008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完成该工作。在当前的 CPC 框架中,对服务的阐述得更加具体;新增了对信息产品的分类;对 ICT、旅游及健康服务的范围进行了扩展。

2004 年,联合国统计署(UNSD)在全球范围内对 ISIC 第四版修订的详细草案进行了咨询,2005

表 1 服务业统计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内容

问题描述	研究内容
(1)如何改进对服务业实际产值的统计?	对服务业活动、产品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 服务业的行业规模、结构和产值 服务业投入和产出 (包括服务投入和产出的价格、服务营业额、服务增值、采购、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科技和资本投入、服务需求、服务供给、产出规模、服务生产者价格、直接的服务产出量、服务进出口价格、短期服务产出指数、经济趋势、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服务产量估计等) 消除产出中可能被放大的部分
(2)如何改进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统计?	服务贸易收支平衡 服务提供模式 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FATS) 自然人流动引起的国际服务贸易 增加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
(3)如何改进对服务活动的统计?	企业注册登记 服务企业的统计口径 选择和定义统计变量 选择样本和确定统计范围 跨国公司商业存在和服务外包等活动 中小服务企业的活动 减轻被统计单位的负担
(4)如何加强统计基础设施建设以提供更可靠的服务业统计数据?	反映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关系 特定行业的统计(包括旅游、医疗健康、金融、保险、信息技术、商业服务、运输、房地产、教育、文化和公共部门等) 其他与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包括生产率、ICT、信息社会、R&D、创新、科技等)
(5)如何改进对中小服务企业的统计?	建立企业统计在服务业统计信息搜集中的优先权 加强企业统计数据与其他数据的联系(如在企业绩效和贸易数据之间建立链接) 发挥国家统计局的协调作用 统计可以用于纵向分析的企业数据。 开发新的统计指标(尤其是反映服务业短期发展情况的短期指标)
(6)其他特殊的服务业统计问题如何解决?	对服务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统计 无偿义务服务的界定 对服务业的国际资源的统计 对使用或租赁非金融资产引起的服务的统计 对非正式经济和未观察经济的统计 改进由于经费和技术限制而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统计

年, TSG 完成对 ISIC 第四版的修订工作, 2008 年 8 月, ISIC 第四版正式发布, 与第三版相比, 它丰富了对服务的描述, 增加了 4 个部分和 27 个分类; 旨在促进国际分类和区域分类的融合; 新增信息和通信分类, 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融合提供了便利; 扩展了专业服务、商业支持服务、文化、娱乐和卫生健康服务的范围; 将供水服务归入环境活动和服务中。

3.2 国民账户体系 (SNA) 的更新

国际国民核算工作组 (ISWGNA) 主要从技术方面负责 SNA1993 版本更新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在它的努力下, 2011 年 SNA 的最新版本 SNA-08 发布。与 SNA-93 相比, SNA-08 版本新增或对以下领域的统计进行了新的规定, 包括对于租赁或自己使用非金融资产, 如软件、音乐和电影版权、R&D 等产生的非金融资产和资金流的处理; R&D 支出的资本化; 源自国有资产的服务; 原版和盗版 (如软件); 关于决定公司和个人如留学生、海员、海外临时工 (这也是 BPM 修订的对象) 住所的指导方针; 非正规经济; 一般政府和公共部门; 和非盈利部门的服务。

经过修改和更新, SNA 中心框架的灵活性得到提高, 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不同需求。SNA-08 逐渐演变为成熟的、具有普适意义的分析工具, 在与其他统计体系的互动中奠定了中心地位。

3.3 国际收支手册 (BPM) 第六版的撰写

BPM 第六版的撰写工作与 SNA 更新工作同步进行,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下, 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 (BOPCOM) 专门成立了技术专家小组, 讨论 BPM 第六版撰写需要解决的问题, 并对这些问题 (特别是与直接投资、货币联盟和其他国际收支相关的问题) 的解决提出建议, 2006 年专家小组最终完成 BPM 第六版撰写建议, 2008 年 11 月, BOPCOM 在其年会上通过了 BPM 第六版, 同年 12 月公开发布。

BPM 第六版解决了 BPM 第五版发布以来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引起的服务业统计问题, 包括: 企业和个人法定住所;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对服务的分类 (这与联合国的分类工作相链接); 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界定 (如修理、加工品、再出口、信息产品和原产地产品) 等。

3.4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MSITS) 的更新

考虑到 CPC、ISIC、SNA93、BPM5 的更新和修订可能带来的影响,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机构间服务工作组 (ITFSITS) 于 2009 年启动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MSITS) 的更新工作, 以保证其实用性和与各国的相关性, 更新仅限于国际服务统计的范围, 不过涉及对 IMP 编制的扩大后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 (EBOPS) 和 4 种服务提供模式统计方法的评价, 2010 年 8 月 1 日更新后的 MSITS 正式实施, 主要涉及服务进出口统计、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统计和自然人统计三方面。

为了更多的国家能够更好地理解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ITFSITS 采取了许多措施, 旨在促进和监督新版 MSITS 在各国的实施、促进各国共享未来有关服务贸易技术援助活动和研讨会的信息。UNSD 成立了一个归属 ITFSITS 的技术小组, 专门负责对由于贸易、移民和就业引起的自然人流动的统计, 主要任务包括: 给新版 BPM 中关于“住所”的章节提供附录、给更新后的 MSITS 提供一个关于服务贸易提供模式 4 (自然人存在) 的章节和改进国际汇兑数据的质量。

此外, UNSD 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专门负责协同各国际组织对服务贸易的数据收集工作, 尽可能地减少数据的重复收集和统计, 如 IMF 在自愿的基础上向其成员国收集基于 EBOPS 的服务贸易数据, 将其作为国际收支平衡的一部分; OECD 将伙伴国提供的 FATS 和服务贸易数据汇总并出版;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主要收集服务企业海外附属机构的数据。在此基础上, UNSD 开发了一个全球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 按照伙伴国、服务类别和供应模式等提供详细数据。

3.5 服务业短期指标

与其他行业相比，服务业特别缺乏能够反映服务业短期发展情况的指标和数据。为了满足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对服务业实际产值短期统计数据的需求，2002 年 OECD 短期经济统计专家小组（STESEG）成立服务业专门小组（TFS），着手制定服务业生产指数（ISP）手册，于 2006 年完成。

TFS 提供了目前最科学、最实用的方法和最适合的指标变量，并向成员国推荐了编制服务业生产指数所涉及的一系列概念和方法。TFS 认为，为了与国民经济核算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构建服务业生产指数的过程中，权重的首选指标应该是实际增加值而不是实际总产出。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如服务业生产指数的周期性指数（月或季度）、部门覆盖（营利性服务部门还是全部服务部门）及其和国民经济核算的关系。

3.6 服务价格和数量

要改进对服务业实际产值和增加值的统计，服务价格和数量的统计非常重要，其中改进服务价格和数量的统计实践和国际可比性是重中之重。

Voorburg 小组一直从事有关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SPPIs）的研究，主要贡献有：提出服务的异质性需要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产出价格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服务业实际产值采用基本报告的形式，以标准格式标明特定类型服务输入的价格，在实践中被证明非常有用；提出了航空运输价格、电信价格、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价格的统计方法。

秘书处间价格统计工作组（IWGPS）负责制定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手册，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物价指数提供概念性的原则和实用的指导。IWGPS 建立了技术专家小组，该小组由 IMF 召集，负责制定关于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指南。

3.7 企业统计

随着宏观政策和经济分析等对服务业统计，特别是服务业竞争力、服务业对其它行业影响力的需求日益增长，更多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企业统计。为此，OECD 成立了服务业统计小组，就下列主题进行研究：（1）制造业及服务业统计的整合。研究表明随着服务业作用日益增强，需要对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互动方式以及互动的结果加以统计；由于供应链是不断变化的，现有的投入-产出表不能完全反映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企业级数据的使用必须明确由服务活动引起的制造业增加值有多少；企业的就业数据可以显示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构成的变化等。（2）服务业产值和生产率的统计。工作小组认为这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挑战；小组提出了测量服务生产率的替代方法，并重点研究了零售业产值的统计。（3）从微观视角对服务增长的驱动因素还包括服务业内部资源配置从生产率低的企业转向和生产率高的企业；成员国关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统计和实证工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服务业的增长。

此外，企业统计数据国际可比性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 OECD 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与各国专家合作，研究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成员国间对于结构商用统计（SBS）的共性和差异，负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统计口径、变量、分类和规模的研究，按照企业规模等级提供年度结构商用统计数据，并对改善企业统计数据在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可比性提供建议。

3.8 信息社会统计

1997 年，OECD 成立信息社会指标工作组（WPIIS），专门负责信息社会测度，以统一 ICT 统计的国际标准。WPIIS 强调 ICT 生产和消费统计必须遵循以下标准：ICT 部门分类、ICT 产品分类、电子商务交易测度定义（包括互联网和所有以电脑为介质的网络）、覆盖 ICT 使用和企业、家庭和个人电子商务的模式问卷。

WPIIS 的许多工作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其他国家和组织进行信息社会测度奠定了基础：（1）其

提出的 ICT 分类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作为 CPC 的补充完成了最新版的修订;(2)其信息社会测度指南除了作为数据库存放 WPIIS 指导信息社会统计的方针,还包括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 ICT 统计领域中的元信息,成为 OECD 继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之后的另一个重要贡献;(3)其修订的用于企业、家庭和个人 ICT 使用的模型调查,旨在提高 OECD 成员国对于 ICT 使用情况统计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并对那些与政策相关程度较高的领域的测度重新定位,如数字化产品、移动接入、IT 安全、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

在全球范围内,信息社会统计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欧盟。刚刚进入 21 世纪,EUROSTAT 就开展了关于 ICT 在企业、家庭或个人中使用的年度调查,即它提供标准问卷,由成员国国家统计局执行,数据由欧盟委员会数据库保留确保了区域内数据收集和统计方法的协同。之后它为全球数据库开发了核心指标和数据传输模式的列表,在欧盟内部进行 ICT 使用测度方法的研究,还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构建了关于通信业的数据库,为其成员国服务。

由几个国际组织共同主办的关于“信息社会测度”的日内瓦会议通过了所有国家搜集 ICT 核心指标的一览表,包括家庭、个人、企业和学校的基本接入和使用;确定技术援助需求;确定那些与千年发展目标相关的 ICT 指标;推进关于 ICT 指标国际数据库的进展等。

3.9 研发和创新统计

OECD 科技指标工作小组(NESTI)旨在改进对科技输入、输出、传播和影响的国际可比数据的统计方法。1963 年,《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诞生,它是对科技活动进行测度的基础。如今,NESTI 已经完成了对弗拉斯卡蒂手册第六版的修订,新版对 OECD 成员国 R&D 各项指标及其测度方法作了详尽的解说,包括 R&D 各项指标的定义、机构分类法则、领域分类、人员与经费的分类、调查方法与程序、政府依据、R&D 预赛拨款或决算等,旨在加强服务业研发活动的覆盖面,例如,建议 R&D 经费支出按照产品领域(或行业服务)来分类,而不是按照企业实际的 R&D 活动来分类。

OECD 与 EUROSTAT 合作完成的《奥斯陆手册》(Oslo Manual)已经成为国际认可的创新调查指南,是世界各国测度创新必备的指导书,如今最新的第三版已经公开发行,涉内容包括创新的定义、类型、数据收集及创新调查的方法与程序等[8]。《奥斯陆手册》第一版关注的是生产过程中产品的技术生产和工艺创新,第二版将创新调查的范围扩大到服务行业,第三版则着重扩大技术创新的概念以便更好地反映服务业创新,新增了市场营销创新、组织创新、有关非技术创新和非 OECD 国家的创新测度等方面的内容。

3.10 服务部门统计进展

医疗服务统计方面,2011 年,OECD 等国际组织出版了第二版卫生费用核算体系(SHA),SHA2011 在核算原则、各核算维度的具体分类上更接近国民经济核算,它将卫生总费用核算维度分为核心维度和扩展维度,增强了卫生费用核算数据的政策应用性。此外,它构建的卫生费用核算国际分类(ICHIA)和统计报告制度与最新版的 ISIC 和 CPC 更加符合,从而增强了卫生费用核算数据的国际国内的可比性。

由于旅游经济的复杂性,多年来 UNSC 一直强调旅游统计领域的国际协同和定期修订。最近的成果是由 UN、WTO、EUROSTAT 和 OECD 共同编制的《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 2008》(TSA:RMF2008)和 UN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与 WTO 合编的《2008 旅游统计国际推荐标准》(IRTS2008)两个文件,大大促进了旅游卫星账户(TSA)与旅游统计的发展。此外,WTO/OMT 开发了关于入境旅游旅客开支的模型调查,对于收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入境旅游支出非常有用。

4 服务业统计研究的国际展望

过去的十年中, 尽管国家统计局和国际组织对服务业统计工作和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努力, 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但是目前的服务业统计数据还是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未来需要继续推进服务业统计的改进, 尤其要着眼于加强国际合作、推进现有国际标准的执行、加强统计基础建设、解决统计概念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4.1 国家层面

从国家统计局的角度来看, 服务业涉及的面广、量大、企业成分复杂, 服务业统计难度大, 因此, 各国要将服务业统计列入优先级列表, 投入更多的研究资源, 尽快解决:

(1) 制定整体的服务业统计战略: 由于新的统计项目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可靠的测度结果, 所以必须精心策划每一个可能产生新的服务业统计数据的统计项目。在许多国家, 应特别关注服务业统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进, 尤其是 SBS (如企业注册登记、统计口径、分类、变量的定义)、服务产品数据开发、服务贸易统计、服务业统计数据间的链接等。此外, 对于服务业短期指标和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也需要特别关注。

(2) 重视企业统计: 如何增加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对于服务业统计的认识和改变服务企业统计口径, 充分理解服务业的实际竞争力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此外, 服务业统计应该在充分收集企业统计信息的背景下进行, 为了降低企业被统计者的负担水平, 必须建立相关的企业统计优先制度。

(3) 借鉴他国经验, 执行国际标准, 与国际接轨: 虽然服务业统计研究中还存在许多方法和概念上的问题, 但是国际最新研究成果中的许多统计方法已经能够解决服务业统计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这些成果的实施和实现将促使各国大幅提高其服务业统计数据的质量, 这方面有不少国家成功的经验供他国借鉴。

4.2 国际层面

从国际组织的角度来看, 为了避免重复工作, 继续推动与服务业统计概念和方法相关的研究工作, 国际组织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尝试解决:

(1) 服务业统计中存在的概念方面的问题: 为了提高这些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性和普适性, 各工作小组在工作中需要关注如何贯彻全球化意识和增加研究成果的可获得性。

(2) 统计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OECD 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查表明现有的各个服务业统计国际标准自身没有明显的缺口, 关键是要推动对各个标准的实施, 特别是其中有关统计方法的实现, 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 现有的指南和手册才能为服务业统计提供新的动力。

(3) 服务价格和数量的开发工作: 这是对服务业统计工作是重中之重, 直接关系与服务业增长相关的统计数据的质量, 需要继续展开研究, 如对阿特金森审查在公共服务产出测度国际实践中的影响进行更深层的思考等。

(4) 提高国际间服务业统计数据的可比性: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国际间服务业统计数据, 特别是 GDP 增长数据, 在可比性方面远远不能让数据用户满意, 需要国际组织和各国统计机构在推进现有国际指导准则的实践中作出更多努力。

(5) 促进更多的国家加入服务业统计的研究议程中: 由于经费预算和技术发展的差异, 各个国家的服务业统计工作进展存在明显的差异, 影响了国际标准的实施和国际间数据的可比性, 所以有必要促进更多的国家加入到服务业统计的研究工作中。从国际组织的角度来看, 要解决以下问题, 即加

强跨部门技术支持的协同和合作、使用多种语言传播统计方法以满足各个国家的需要、让更多的国家加入专家组、对各国实现现有标准和手册加强监督、更加关注各国服务业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严格审查由国际组织执行的数据收集和传播标准以正确反映服务业对现代经济的贡献。

(6) 加强对信息社会统计的研究：由于信息社会统计工作起步相对较晚，虽然已经取得很多进展，但是信息社会领域仍面临很多统计问题和挑战，短期至中期的工作需要跟踪和解决很多问题，如进一步推进现有标准的实现，继续完善 ICT 服务的分类，在数字内容、隐私、信任和安全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利用信息技术从大量的信息源中收集数据等。

作者：焦微玲（江苏盐城工学院）

来源：《统计与决策》2015 年第 1 期

1 月国际贸易收入 2113 亿美元

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启用最新国际标准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按照最新国际标准公布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

按人民币计价，2015 年 1 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 12949 亿元，支出 10315 亿元，顺差 2633 亿元。其中，货物贸易收入 11737 亿元，支出 8066 亿元，顺差 3670 亿元；服务贸易收入 1212 亿元，支出 2249 亿元，逆差 1037 亿元。

外汇局有关人士表示，外汇局公布的货物贸易数据与海关公布的进出口数据会有一些差异。出现差异主要是因为统计原则不同，海关进出口数据按照进出关境原则进行统计，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按照所有权转移原则进行统计；此外，海关出口数据按照离岸价格统计，进口按照到岸价格统计，外汇局公布的货物贸易贷方和借方均按照离岸价格统计；同时，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包含离岸转手买卖（指我国居民从非居民处购买货物，随后向另一非居民转售同一货物，而货物未进出我国关境）、网络购物、查获走私等未纳入海关统计的项目，不含来料出料加工等。

新版统计口径有 3 项主要变化：一是加工贸易从货物贸易调整至服务贸易；二是转手买卖从服务贸易调整至货物贸易；三是新版表式中借方用负值表示，服务贸易分类和细项名称略有调整。

来源：《经济日报》（2015-3-16）

18 重点行业年利润超万亿

23 部委再布局新兴产业

“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个词叫‘风口’，我想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李克强总理在 3 月 15 日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是说。

据李克强介绍，2015 年我国将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支持发展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内容。互联网+，毫无疑问成了今年两会上最时髦的词语之一。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 23 个部委就召开了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部际联席会议。

根据这次会议披露的信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以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 18 个重点行业中，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15.9 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近 1.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5% 和 17.6%，明显高于工业平均水平。

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表示，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多数是优化增量，改善结构，是未来新的增长点，这和当前找准存量与优化增量并举的方向是吻合的。

新兴产业成未来新增长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从 2013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是第三次会议。也正是在这几年来，我国 GDP 增长速度从原来的“八九不离十”，换挡至 7.5% 左右的合理区间。严峻的不只是经济下行压力，愈发突出的环境压力当前，传统经济动力主动减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也就更加凸显。

李毅中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经济质量效益不高，亟待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多数是优化增量，改善结构，是未来新的增长点。这也和我们现在提出的经济新常态之一，即找准存量、优化增量并举是吻合的。

刚刚召开的联席会议透露，2014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以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 18 个重点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15.9 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近 1.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5% 和 17.6%。

而去年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仅增长 3.3%，利润额增长 1.6%。在全社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总额占比接近 19%，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接近 15%。

会议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成为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的重要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引领带动作用。

要注重“新兴与传统”融合

根据 2012 年 7 月份印发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业成为我国重点培育的战略新兴产业。这份规划还提出，到 202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 15% 左右。

据记者了解,在过去几年里,多部门下发了不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这其中就包括 400 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等。

李毅中认为,新技术是新产业的灵魂,没有新技术就没有新产业,但目前 17 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仍在攻关破题中,要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就要破解和掌握这些核心、关键技术。

国家发改委 2015 年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以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其中就包括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李毅中提出,要注重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互联网+”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的体现,传统产业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但传统产业也包含了相当多的高新技术,所以搞新兴产业要依托传统产业。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5-3-15)

第 12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将力推港口物流领域投资合作

第 12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高官会 17 日在广西南宁落幕,中国与东盟 10 国商务投资促进部门的高官特别举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紧扣“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主题,于今年 9 月举行的第 12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力推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港口和物流领域的投资合作。

自 2004 年举办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来,在博览会期间举办投资合作圆桌会和东盟产业园区招商大会,已成为中国和东盟 10 国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中方将积极组织具备港口、物流业投资实力的中国企业到会与东盟商务代表洽谈。”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王旭表示,围绕“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和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第 12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合作圆桌会积极推动港口和物流合作。同期举办的东盟产业园区招商大会,将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港口物流产业园区管理、发展经验的交流,并为园区开拓市场,招商引资提供助力。

“过去 11 年来,累计有 2.3 万家中国和东盟企业,共 45.4 万名客商参加了博览会,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雷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服务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将进一步向各国地方政府投促部门及工业园区延伸,构建覆盖面更广的联系网络,为投资商与地方投促部门、企业、产业园区搭建更直接、更便捷的沟通桥梁。

与会的东盟各国投资促进部门高官表示,将与中方一道,利用好东博会投资合作平台,共同拓展和完善投资合作沟通机制,邀请本国港口和物流园区及相关项目代表参会,共同建好中国—东盟项目信息库,促进与中国投融资机构的合作。

来源：新华网（2015-03-17）

中国央行进一步降息空间或正被封杀

当前，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经历了 3 个月里两次降息和一次全面降准之后，中国面临的通缩压力是否减缓，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如何？

中国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 2 月份，CPI 同比上涨 1.4%，环比上涨 1.2%，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其中城市上涨 1.5%，农村上涨 1.2%；食品价格上涨 2.4%，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此前的 1 月份，CPI 同比仅上涨 0.8%，是近 5 年多来涨幅首度跌至“1”以下，创下逾 60 个月来的新低。对于 2 月份 CPI 上涨的原因，业内普遍认为，春节因素和基数原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2 月 CPI 涨幅较上月有所回升主要是季节因素的影响，春节假期推升农产品价格上涨，3 月后物价还会继续保持地位运行走势。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在解读数据时称，“CPI 同比涨幅扩大的原因，一方面是 2 月份环比上涨较多；另一方面是今年和去年春节错月，2 月份的对比基数相对较低。”

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通过跟踪高频数据不难发现，继 1 月 CPI 回落至 1% 以下之后，2 月受春节因素影响，食品价格有所反弹，但涨幅不及往年春节，此外，猪肉价格仍然保持下降态势，预计 2 月 CPI 保持在 1% 以下仍是大概率事件。

虽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 2015 年 CPI 的增长目标设为 3% 左右，业内认为全年 CPI 涨幅远远达不到 2%。目前，多家机构下调了 2015 年全年 CPI 预测。

光大证券指出，从近期食品价格的走势来看，CPI 在短期内还将继续下探，将 2015 年全年 CPI 预测从之前的 1.8% 下调至 1.6%；海通证券则下调 2015 年 CPI 预测至 1.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也在中国两会期间指出，中国的 CPI 涨幅在可见的未来还是正数，相关部门也在密切关注。但中信证券固定收益研究主管、首席分析师邓海清认为，CPI 回升不是一个单独事件，仅仅归因于春节因素或许会误判，油价止跌走稳才是核心主因，应该结合 PMI 等宏观先行数据信号走势分析，更能全面认识本质变化。

此外，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2 月份 PPI 同比下降 4.8%，连续 36 个月负增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表示，2 月份节假日是使 CPI 环比和同比上涨的主要原因，整体来看，通缩压力仍将延续。

申万宏源宏观团队指出，内需决定型的产品价格涨幅回落是 PPI 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浦发曹阳进一步指出，PPI 远超出市场预期，既有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也在于工业生产延续放缓。石油产业链行业的价格跌幅较大，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环比价格跌幅达到 15.7%，此外产能过剩、与地产产业链相关的钢铁、有色和煤炭行业的价格亦在下跌。

民生宏观团队也强调了房地产下行的影响，只要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经济总需求不足，产能不出现明显去化，PPI 就难见底。

3 月 30 城市高频跟踪的房地产销售套数和面积同环比均大幅走弱。从销售-库存去化-土地购置-开工投资的传导链条看，房地产投资还有持续下行的压力。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走高同时代表生产成本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下跌，象征的中国经济正在切实的走向良性发展。

本届两会，中国政府“去 GDP 化”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引发全球喝彩，但市场对“7%左右”增速目标的解读却截然不同。一则认为是这是增长的底限，另一方则认为已经是增长的上限。这一判断无疑将决定如何定向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从而影响对股债汇市走向的判断。界定 7%的目标是经济增长上限的机构认为，灵活性提高的货币政策将更加宽松，而宽财政将继续发力；相反，界定其为下限的机构则判断，未来稳增长的政策放松力度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招商证券宏观经济研究主管谢亚轩称，（对中国经济增长目标 7%左右）这个判断的不同涉及到的对政策背后的逻辑判断，说到底是对就业形势的判断不同，有人觉得 7%就够了，有人觉得 7%还很难达到目标。他并解释称，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就业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有新增就业，还有结构性的就业问题，以及传统周期部门的失业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不同将引致对经济增长的不同看法。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增长预期 7%左右，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且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7%左右的速度可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中国浦发银行报告称，2014 年 GDP 仅增长 7.4%的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达到 1,322 万人，高于政府制定的增长 1,000 万目标，显示政府“稳就业”压力下降，提高了对经济下滑容忍度，“我们理解这是政府在 2015 年顺势将 GDP 增速下调至 7%的重要原因。这也意味着‘稳增长’需要的政策放松的力度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部分机构明确提出要摒弃“强刺激”预期。光大证券报告称，政府工作报告不再谈“保下限”，且自 2012 年以来首次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而并没有像 2014 年报告所提“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表明政府将在今年进一步放任经济增速的放缓，试探经济保持稳定的底线，托底增长的政策力度不会太大。但界定 7%为经济增长上限的机构观点则背向而驰。华融证券报告指出，中国 2015 年实现 7%左右的 GDP 增长有一定难度，上半年压力较大。

中信证券指出，政策底是由新增就业所决定，由于 GDP 总量的持续增大，新增就业所对应的 GDP 增速将有所放缓，因此淡季的“政策底”也将有所回落，预期政府的单季政策底会在 7%以下，但全年增长依然将达到 7%。

中国上周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 年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通胀控制目标分别降为 7%左右和 3%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目标降为 12%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目标亦降至 6%左右。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由于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今年中国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的难度较大，而通缩风险却在上升。他预计，今年上半年 CPI 涨幅仍会比较低，估计在 1.5%左右，全年不会超过 3%；而 PPI 连续下行的态势也难改变。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确定 7%左右符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律，其又是预期性的、引导性的，发改委有决心、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来努力取得更好的结果。

中国央行上周六(2 月 28 日)将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和存款利率分别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5.35%和 2.5%，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 1.2 倍调整为 1.3 倍。但在这

样的背景下，周一开盘后市场利率普遍上扬，A 股也仅上涨了一个交易日便掉头向下，从市场反应来看，似乎投资者对降息效果并不满意。但随着中国名义利率已逼近二十多年来的低位，加之降息带来的货币贬值、资本流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是否还有更大幅的降息空间成为疑问。

“QE 是一种可能的替代选择，”彭博新闻社引述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 Louis Kuijs 称，而且中国央行“已经采取了一些类似于小型 QE 的措施。”

中国央行去年使用了诸多直接借贷手段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如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向国开行提供一万亿资金，国开行以贷款收益作为抵押，使用这笔资金支援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又如央行通过常设借贷便利（SLF）向诸多金融机构提供总量达数千亿元的 1~3 个月贷款，金融机构以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优质的信贷类资产作为抵押，央行藉此可以引导短期利率的走势。

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Willem Buiter 认为，与国外的 QE 不同的是，中国央行比起资产负债表体量更注重资产负债表的构成。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不断增加，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面临着加大刺激力度的压力。但中国地方政府在过去大兴土木时又积累了巨量的债务，在中国不断开放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加速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如何有效刺激经济成为了难题。

2013 年底时中国审计署审计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7.9 万亿元，而根据瑞穗证券的最新的估算，这个数字可能达到 4 万亿美元（24.5 万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已经超越德国经济总量。此外，由于中国大量行业产能过剩，以更多的投资促进经济的边际效用也在递减。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高负债率国家，其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就指出，货币政策最适合解决高负债国家的问题。

随着今年 1 月份消费者物价和生产者物价双双降至五年来最低位，中国融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严峻。由下图可以看见，尽管去年四季度进行了降息，但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至今还一度上升了 80 个基点。“这意味着货币环境收紧，与疲软的实际活动形成强烈反差，”瑞银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称。所以，可以看出在降息的边际效果越来越弱，负面影响却越来越大的时候，QE 成为另外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汪涛曾表示，通过增加中国国内资金流动性，中国央行就可以在不增加国家债务的前提下稳定中国的物价环境。

不过，不同于日本的降息空间早已经为 0，所以只能祭出 QE 政策，中国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且拥有较低的通胀环境，给央行留出了动作空间。

中国的银行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存贷利差，尽管前两次降息的存贷款利率是双双下调的，但考虑到存款利率有 1.3 倍的上浮空间，而银行往往是将此利率一浮到顶，这无疑更加挤压银行的利润空间，且在经济形势不佳、企业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意愿降低，央行的好意无法直接传导至市场，反而造成市场上资金情况更加紧张。

但 QE 却相对可以更有效的降低市场利率。比如美国版 QE，主要通过购买中长期国债和高评级信用债，压低中长期利率水平，来刺激投资、消费带动就业增长和经济复苏。

中国版 QE 也可以有相同功能，相比降息降准可以释放更大量基础货币，通过压低中期利率这一中间目标，最终传导至终端实体经济领域。

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已经很大，通过购买地方政府或其融资平台的债务，将潜在的风险转移并稀释至央行看起来动机合理。

当然，就中国的情况来说，照搬西方的 QE 存在难度。首先中国的无风险资产很少，国债和部分政府债务作为重要的无风险资产，银行可能未必愿意将其卖给央行，强行收购反而造成银行成本升高；其次，中国债券市场缺乏体量和深度，央行也难以获得足够多的国债供给。

作者：韩洋

来源：BWCHINESE 中文网（2015-3-11）

中国再度降息凸显经济形势严峻

中国央行似乎开始急于放松政策，释放出中国经济令人担忧的信号。

中国央行上周六晚间将基准存、贷款利率分别下调了 25 个基点。这是央行自去年 11 月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政策放松措施，之前有一次降息和一次存准率下调。央行再次降息虽已在意料之中，但来得如此之快有点令人意外。

近期数据表现不佳，中国 1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上升 0.8%，触及五年低点。但大部分分析师将这归咎于季节性因素。春节假期一般会推高食品价格，而食品价格在消费者价格中所占权重很大；今年春节在 2 月中旬，去年春节在 1 月末。

关于月度数据意义的不确定性应会在几周内消除。1 月份和 2 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将在 3 月初公布，届时还将公布 2 月份通胀数据。

中国央行显然不打算作壁上观、看看情况究竟会变得多么糟糕。最新的加息举动揭示出一种紧迫感。是什么令央行如此焦灼不安？

2 月份的初步经济数据都不如人意。周日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2 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两个月徘徊在荣枯分水岭之下。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上周六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China Real Estate Index)公布，2 月份房价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3.8%，降幅较前两个月扩大。有关房地产市场复苏的企盼遭到了当头棒喝。

更多的问题即将出现。中国遏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措施将抑制省市的基础设施支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速。

全国人大会议定于本周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其他官员的讲话将提供关于可能采取的其他财政刺激措施的线索。

中央政府需要放松财政政策以抵消地方政府紧缩开支的影响。进一步放松监管也可能有所帮助，包括下调按揭贷款的首付要求。

中国央行显然看到了风险急剧增加的现实。但只放松货币政策将不足以帮助中国摆脱困境。

作者：Aaron Back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5-3-2）

中国政府准备大规模整合国有企业

中国的领导层准备对中国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整合，这些国有企业将被告知它们需要减少对政府支持的依赖，并要准备上市。

中国经济的放缓增加了提高国有企业回报率的紧迫性。这些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既包括主导石油、银行业和其他战略领域的企业巨头，也不乏经营酒店和生产牙膏的中小型国企。

不过，该整合计划可能进一步强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并使得规模已经巨大的国企进一步做大，而不是像国内外经济学家呼吁的那样降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

据知情的政府官员和顾问透露，中共的领导人计划在未来几个月中发布针对超过 10 万家国有企业重组的整体规划。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下属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领导层决心要啃国企改革这块硬骨头。

上述官员和顾问表示，能源、资源、电信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将进行整合。合并后的实体将被重组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这些公司将获得相关授权，以确保它们的经营更像商业企业，而不是政府的下属机构。

这些官员和顾问称，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将被要求实现公司回报最大化，并为其中多家公司的最终上市做准备。

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面临压力，他们被要求到 2020 年将税后利润上缴政府公共财政的比例从目前的 15% 或以下提高到 30%。其中的部分上缴利润将专门用于与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关的成本。上述官员称，这一新计划增加了一个新目标，即到 2025 年要让那些最大的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达到上市要求。

尽管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一再要求构建更有活力的民营领域，但以很多指标来衡量，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此项国企改革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因为该计划并未采取一些市场改革派人士所倡导的举措：其中的一项就是，该计划将大规模的私有化交易排除在了考虑范围之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称，让资产管理公司来管理国有资产的想法是好的，但不应该通过合并现有的、规模庞大的国企来实现。他表示，这只会削弱竞争。

监管央企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对相关改革方案不予置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周在两会期间发表讲话时称将深化国企改革。他表示，要加快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但他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上个月报道了涉及中国国有企业重组计划的部分内容，即国有石油公司之间可能进行并购，以减少政府官员认为的这些公司在国内市场上有损无益的竞争，从而增强这些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关的重组计划则更进一步，将并购后实体重新包装成投资公司，以便为这些公司的公开上市做好准备。

中国仍期待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上述国企改革计划将为民间投资进入国企提

供支持，不过上述官员和顾问表示，改革计划将不允许私人投资者持有大多国企的控股权。

中国官员称，政府认为，合并、改善监督、公开上市带来的约束等措施的综合作用对于减少国有企业存在的浪费、腐败和管理层失职等问题至关重要。

山东省省长、前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周末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间隙向记者表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财务制度应该达到上市公司的标准。

凭藉国有银行发放的贷款以及政府制定的限制私营企业竞争的相关法规，中国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大力发展，而私营企业则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被国企挤出了市场。经济学家表示，这种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待遇是以牺牲中国纳税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

新加坡经纪行大华继显(UOB Kay Hian Holdings Ltd.)的经济学家朱超平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分析文章中称，从 2008 年至 2012 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飙升了 90%，至人民币 25.1 万亿元（合 4 万亿美元）。不过，根据朱超平的分析，2013 年国有制造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为 11.6%，而私营同行的回报率则达到近 25.7%。

据政府官员和顾问表示，在起草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时，中国高层官员研究了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在淡马锡模式中，新加坡政府将自身角色限制为获得分红的股东，而将日常运作交给资产投资公司按照市价聘请的职业经理人。

但中国政府的国企改革方案并未提出这种做法。上述官员和顾问称，政府将保留为新成立的公司任命高级管理人员的现行做法。

中国政府已通过合并现有国企开始悄然进行组建国有投资公司的试点。去年，国资委选择国家开发投资公司(State Development & Investment Corp.)和中粮集团(Cofco Corp.)进行了试点。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国家开发投资接手了一家证券公司；而作为最大食品加工企业之一的中粮集团兼并了另一家国有食品企业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团(China Huafu Trade & Development Group)，令后者成为其全资子公司。据华孚称，华孚的所有产权都无偿地划给了中粮集团。

国资委官员和上述两家公司的管理人士对此不予置评。

与此同时，在核电领域，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China Power Investment co.)旗下上市子公司上个月递交监管文件显示，中国电力投资正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State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co.)合并。

扩大大型国企规模可能再次引发中国民营企业、西方企业和西方政府的不满，它们多年来一直批评中国政府在信贷渠道、土地和其他资源方面对国企提供补贴。

中国政府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张明称，合并大型国企的做法与中国政府让民营经济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承诺背道而驰。

作者：Lingling Wei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5-3-12)

破除通缩恐惧论

中国宏观经济本轮调整目前已进入最后关键阶段,经济增速与一般物价下行压力有增无减,有关中国经济通缩论与萧条论再度流行。一般物价作为宏观经济变量具有顺周期属性,在减杠杆、去泡沫的调整时期增速走低甚至出现温和负增长是合规律现象,认为物价走低或通货紧缩必然导致经济萧条的观点有待商榷。针对目前形势,需要在分类辨识通缩基础上破除通缩恐惧,加深认识宏观失衡调整的客观规律,坚持北京“十八大”以来制定的优先改革调整方针取向,充实与完善稳增长政策举措,为新一轮内生增长景气到来奠定基础。

1 三类通货紧缩具有不同属性

一般物价下降现象被经济学称作通货紧缩。分析现实通缩现象,首先要科学辨识不同类型通缩产生根源与影响。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类型通货紧缩。一类是在总需求剧减与流动性陷阱等因素构成极为特殊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坏通缩或恶性通缩,二是在生产率增速超过总需求增速、经济仍较快增长背景下一般物价走低或温和下降的良性通缩或好通缩,三是上述两种情况之间不同形态的中性通缩。

坏通缩典型案例是美欧上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对大萧条理论分析认为,在资产负债表危机与流动性陷阱条件下,通货紧缩通过提升实际利率与打压信贷派生加剧通缩的内生作用,使宏观经济锁定在通缩螺旋状态难以自拔,因而需要用超常规措施中断通缩自我强化链条。恶性通缩理论来自对大萧条这个绝无仅有案例的研究。其实大萧条与当时宏观政策方向性失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金本位货币体制等主客观条件有关,并非仅仅由于通缩螺旋因素使然。然而大萧条在美国经济史上极为重要,加上通缩自我强化理论的学术成功,使得有关大萧条类型通缩概念影响巨大,一定程度造成通缩恐惧与谈缩色变的思维定式。

第二种通缩指生产率增速超过总需求增速、经济仍较快增长背景下物价走低或温和下降。由于一般物价走低不是源自资产泡沫破灭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名义利率保持通常正值即不存在流动性陷阱,加上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速,因而这类由供给面合意冲击带来通缩称作良性通缩。国外有关研究分析良性通缩的形成机制,并通过经济史研究发现 19 世纪美欧国家物价下降经常具有这类良性通缩属性。中国新世纪初年经济高速增长,其间也曾发生一般物价走低逼近零值情况,可看作具有良性通缩特点。

第三类是与上述两类通缩不同原因导致的物价低位水平和温和负增长状态,或可称为中性通缩。例如日本经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增速减缓,一般物价增速维持低位并时有小幅下降,一般被看作坏通缩的典型案例,其实属于中性通缩。日本经济过去 20 多年实际上总体稳定,并未发生坏通缩在逻辑上会派生的经济大萧条。战后日本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创新,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已大体成功完成经济追赶收敛,跻身全球最发达经济体之列。问题在于日本受其经济、社会、文化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制约,相对缺乏在技术产业前沿创新的能力,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其实是日本发展新阶段的一种“低增长稳态”,温和通缩则是这种新稳态在物价层面的表现。认为日本经济受通货紧缩拖累而景气低迷,假定能通过超常刺激摆脱通缩重拾早先高增长,好比假定老人吃激素能返老还童,其实并不正确。

另外针对早先过度扩张失衡进行有序调整,也可能派生一般物价走低甚或负增长,也具有中性通缩特点。中国今年物价表现大体可归为这类通缩,与恶性通缩不可同日而语。

2 美国金融危机与通缩恐惧论有关

流行观点认为：“物价下降意味着通缩，通货紧缩意味着萧条”，政府则应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应对和防范。有关大萧条通缩自我强化理论取得成功，然而把真理向前推进一步导致上述过于片面强调通缩危害的认识误区。这方面认知偏颇的政策含义，与美国现阶段债务国地位与减轻债务负担利益要求存在暗合之处，使得通缩恐惧论在美国政学两界具有较大影响力。反思新世纪美国宏观经济史可以看到，部分由于通缩恐惧论误导，美联储在新世纪初年实施过于扩张的货币政策，对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对全面科学认识通缩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经济衰退，美联储十多次降息刺激经济较快走出危机。然而复苏后美国经济回升不够强劲，一般物价在较低位运行，引发美国决策层对通缩的担忧与恐惧。现在回头看得比较清楚，当时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是在经历了 90 年代狂飙猛进后高速增长后经济调整的合规律表现，也是与新世纪初年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追赶加速相联系的开放宏观经济现象。然而受通缩恐惧论思维定式影响，美联储把基准利率从 1.75% 这个就泰勒规则而言本已偏低水平，通过两次超常降息降到极为罕见的 1% 超低状态。

实际负利率加上美联储高调承诺货币宽松的政策指引，对后续房地产以及债市等资产泡沫产生显著诱致助推作用，为美国金融危机酝酿发生提供了适宜的货币环境温床。始料不及的是，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真得落入早先货币政策所极力防范的流动性陷阱状态，具备了恶性通缩自我强化机制发生作用的现实条件。由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双重动机促成的这次政策失误，提供了通缩恐惧促成过度扩张政策诱致资产泡沫危机，最终导致恶性通缩自我实现的典型案例。

好比特殊重病患者需要服用激素，为避免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崩盘和经济萧条，美国实施超宽货币政策刺激具有合理性。然而与世纪初经历类似，美国经济在较快走出金融危机急救室后再次遭遇复苏不振困扰，美国并未真正反思和总结早先通缩恐惧政策失误的教训，更是接二连三加大超常量宽刺激政策力度提振经济增速。长达六年多空前力度刺激政策，虽然带来美国经济去年两个季度经济增速短期回升，然而全面观察后危机时期美国经济表现则其实难以使人乐观，美国主流经济学界也热议经济“长期停滞”问题。超宽货币政策能否给美国经济带来长久繁荣，时间最终会给出答案。

3 中国近年物价走势符合宏观调整期规律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开放景气成长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体改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推动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为经济高速运转持续注入偏快偏热压力，逐步形成宏观经济失衡格局。面对由改革滞后与宏观失衡交织而成的经济综合症，中共十八大以后新领导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主动调整失衡新阶段。宏调政策在积极稳增长同时，力求保持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稳健中性方针，利用市场出清机制有序化解早先失衡矛盾。

虽然面临经济增速走低等方面困难，近年调整政策在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积极成效。一是“挤水分”，即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偏高产能。二是“去泡沫”，即治理房地产等部门多年过度扩张与价格虚高因素。三是“控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一度过快扩张。四是“调预期”，即转变“政策是跌出来的”早先市场流行预期，提升硬预算约束与宏观财金纪律有效性。

一般物价增速逐步趋缓，部分物价指数温和下降，是与宏观调整期的物价形势特点。一般物价作为典型的顺周期宏观变量，近年随着经济增速减缓趋于走低，表现为近来 CPI 增速和 GDP 平减指数回落到 1% 上下较低水平。早先较快扩张的重工业部门，随着供求关系调整价格较快下降，带动 PPI 近三年负增长。

统计分析过去十多年几十种分项价格指数发现，在 2003-2008 与 2010 年前后这两个强劲扩张阶段价格增长较快对象，过去 3 年调整期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前后期价格涨落具有显著负向关系，显示

目前物价形势特点主要与调整早先过度扩张失衡有关。所谓“PPI 通缩”，其实提供了调整早先过度扩张失衡的一种相对价格机制，是在中性宏观政策环境下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失衡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调整期物价走低与通缩表现，与通缩恐惧论隐含假设的恶性通缩不可同日而语。首先，中国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不同于坏通缩环境下总需求急剧持续下降。其次，中国经济早先扩张阶段虽累积局部高杠杆与泡沫因素，然而由于近年主动调整并未发展成普遍性资产泡沫，没有发生全局性资产负债表危机。再次，中国政策利率处于正常区间，超高存准率及其他金融数量管制仍有待逐步退出，金融抑制实况与流动性陷阱假设状态有天壤之别。最后，现今不存在金本位货币制度约束条件，中国政府在调整期积极务实稳增长。因而，中国出现大萧条类型坏通缩可能性微乎其微。

4 中国管理调整收官阶段的政策选择

纵观近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演变，可见目前已进入本轮宏观调整的最后收官阶段。针对目前经济增速与一般物价下行压力，中国需要在科学辨识现实通缩现象实质内涵基础上，坚持北京“十八大”以来双重导向的正确宏观调方针，在保持定力推进结构与失衡调整同时，完善与充实稳增长政策，为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早日到来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进一步明确坚持改革调整的政策取向。在调整深化最后关键阶段，各种深层矛盾和风险会进一步外化，呼吁大规模刺激与回避调整的观点诉求及其影响力会增加。应科学总结晚近时期以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调整宏观失衡的实践经验与客观规律，在对通缩进行科学分类基础上加深认识调整期物价增速走低与通缩现象的内在逻辑，坚持中共十八大以来改革调整的正确目标与方针，避免调整失衡周期在最后阶段功亏一篑。

第二，适度下调经济增速底线目标。由于消化过剩产能与调减过高杠杆等具有减速效应，失衡调整期应允许经济增速暂时低于潜在增速，避免硬性制定偏高增长指标所遭遇的“刀刃上平衡”困扰。依据对中国奥肯关系特殊内涵的认识，考虑近年宏观经济走势与劳动市场数量关系现实情况，建议把经济增速底线目标下调到 7%或略低水平。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变化情况，政府对经济增速目标应更多从预测性和指导性角度加以阐释，不宜特别强调其指令性或刚性效力。

第三，针对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形势，宏观金融政策应适当增加充实稳增长措施。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关系上可更有力，并充分发挥其天然具有的定向与结构调节功能。二是货币政策需避免过度强调定向和结构功能同时，更加重视运用总量工具，以保持广义货币和流动性总量动态适度增长。可酌情追加实施普遍降准举措，逐步退出早先应对通胀实施的高存准率等数量管制，同时发挥货币政策对稳增长的积极作用。三是要深化改革与调整政策，为国内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创造便利条件，由此增加和充实企业资本金，兼收调整期减杠杆与稳增长政策效果。

第四，综合施策治理金融市场失衡因素与潜在风险。失衡调整意味着预算约束硬化与重新洗牌，中国有关部门应允许特定影子银行产品违约，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和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同时采用破立结合、堵疏结合思路综合治理。例如在规范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过大与多头举债问题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合理机制。又如在要求影子银行违规表外业务回归银行表内同时，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常规发展路径。

第五，对超预期小概率事件冲击未雨绸缪。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大体平顺完成本轮调整具有可预期的最大可能性，然而也不应排除内外环境超预期不利变化可能性。需适当提高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并充实计提拨备资金以减少金融系统脆弱性。加强对金融风险触发因素研究预判以增加应金融风险主动性。需加强宏观审慎措施，在劳动市场、企业重组、减免税费等方面研究应对冲击预案，以便在小概率逆向情景万一发生时沉稳应对，以确保调整改革取得成功。

作者：卢锋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15-3-4）

陈春花：互联网公司生命力不够 传统企业春天来了

还没有时间读《从 0 到 1》这本“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商业书”？《中国企业家》杂志本周特专访了管理学专家、新希望六和集团联席董事长兼 CEO 陈春花，详解了书中的观点，并对 2015 年的商业环境、商业变革以及企业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给出了答案。

CE：前不久您在给管理团队的“开年信”里，多次引用了彼得·蒂尔，您是从他的新书《从 0 到 1》中受到了很大启发吗？

陈春花：是的。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启发和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思维的改变。其实它所强调的，今天来讲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应该有一个创新或者创业的思维，更强调创业的思维。创业的思维就是你要把一件没有的事情做到“有”，其实这就是从 0 到 1 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我要去调整我的同事的地方。我们可能还是比较会做从 1 到 N，把一件事从小做到大，从少做到多，其实这是我的同事或者我们中国企业比较习惯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不太习惯做一些没做过的事情。我其实一直在调整我自己，比如“春暖花开”（陈春花微信公众号）为什么要开，我在想我也应该改变一下，既然互联网时代有这样一个传播的办法，你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因为以前微博我就不肯尝试，以前除了写专栏以外，很多的交流我也不是特别愿意做，因为如果从我个性上来讲，我其实是偏安静，不太希望很多人关注我，只不过因为责任使得我不断站在前台，站在灯光下，没有办法。但是在这个时代其实你会发现，你还是要变，所以我想我也变一下，工作就是一个改变，比如我会尝试着去跑马拉松，也是一个改变，你要去试一些东西。

我跟我的同事讲说，你一定要尝试一些你从未做过的事情，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从零到一，就像我们转型很难，或者我们转食品很难，或者我们转互联网属性很难，我说你去做试试，先不要认为它难，不要认为我就习惯了做一个农牧企业，做一个制造企业，做一个规模壮大的企业，先不要这样想，这就是我写开年信的主要原因，你一定是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做一些改变，因为你又迎接一个新的到来，就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会对我们原有的经验和做法都是挑战。

CE：里面还有一个观点，我个人印象也很深刻，以前是鼓励竞争的，但是作者认为过多的竞争是一个错误，这个观点你也很认同。

陈春花：对，这个观点我自己其实提的很早，只不过他的影响比较大吧，我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超越竞争》，2007 年写的，这本书当时拿了本土商业作者奖，而且也确实影响到了很多人。包括我当时在美的做顾问，我告诉他你要离开竞争才可以成功，当时离开了竞争，以这个来做，我之前去辅导六和，我们之所以以很高的速度增长，我基本的方法是离开竞争，我一直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对竞争的理解本身来讲，就是可能对你商业和企业的价值不太自信的方法，竞争最大的伤害是跟顾客没有关系。同行之间在竞争，你们两个打来打去，跟顾客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而我们做企业，

做商业的核心其实是要跟顾客相关，不管你做什么动作，都应该跟顾客相关，跟顾客不相关，肯定没有用的。

我其实在很多观点上不是说受这本书的影响，只是这本书有一点说的非常好，从 0 到 1 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有这个思维方式，而且为什么你要离开竞争，为什么竞争对你是没有意义的，我刚刚说的核心观，因为竞争跟顾客没有关系，而你所有的商业价值或者企业价值是来源于顾客，当你竞争的时候，会把所有的资源投放在这个竞争上，这些资源就没有办法投放到顾客上，所以对你一定是很大的伤害，是这样一个理解。

CE：就今年整体的商业环境，您个人认为有哪些趋势？

陈春花：我除了写这封信之后，又在内部做了一个开年的培训，在这个培训里面我有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我觉得今年我自己称为，叫“互联网的 2.0 时代”，之前应该都叫做 1.0 时代，互联网的 2.0 时代，我为什么把这个作为一个界限来划，互联网 2.0 时代，我觉得是传统企业的机会，互联网 1.0 的时代是互联网公司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互联网 1.0 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核心的创新价值是在营销改变，流量为王和虚拟经济上，这三样东西恰恰是互联网企业会做的，比如互联网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渠道，新的沟通方式，新的传播方式，传统企业不会，它其实是不太在意你赚了多少钱，或者说你能不能赚钱，它只要拥有用户，拥有流量就 OK 了，而且为了拥有这个用户全是免费的，这个对传统企业来讲不能做，因为传统企业做了很大的资产投入，互联网企业就是投入，所以它其实是轻资产，不太需要考虑这个部分，而我们投入的都是工厂，买的都是土地，他甚至连楼房都不用买，租就行了，一堆脑袋就行了，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这个方式做。

互联网的 1.0 版本价值更重要的原因是虚拟经济，你会发现它都不是实体的，都是虚拟的，都在线上，都是一种撮合和互动，所以这是我对互联网 1.0 时代的基本描述，但是我认为现在是 2.0 时代，2.0 时代是创新价值的内容变，第一个它非常强调你要真正的给顾客有价值，你不能仅仅是一个渠道改变。

CE：但是传统企业不能像互联网公司那样去进行免费。

陈春花：还是不能。

CE：不能用他们的方式。

陈春花：当然你有钱，任性可以，你没有钱没办法，其实能不能给用户免费，很大原因取决于你有没有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能免费拿来，拿来之后再想办法赚钱，当然是 OK 的，所以 2.0 的互联网时代，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价值的创造来源于产品，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产品至上，1.0 时代是营销至上，实际上服务为王，就不是流量为王，你要提供服务的，真正的服务，而不是把一堆人组在一起，你肯定不具备，比如说像淘宝，他之前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所有人在上面开小店，接下来淘宝肯定做几件事情才可以把千千万万的商户活好，比如说淘宝要向公众说，我这个地方是货真价实的，淘宝店把这个东西扭过来，如果它不扭过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上去买，这就是它要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他有可能要为一些商户提供资金的能力，或者是升级改造的能力，这也是，所以服务变成为王，不再是流量为王，而且经济是实体经济不应该是虚拟经济，所以这是 2015 年最大的变化，我称之为互联网 2.0 时代到来。

如果是互联网 2.0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相信传统企业的机会来了，因为传统企业能提供产品，传统企业拥有服务的理解和水平，传统企业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实体的经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的互联网企业该焦虑了，为什么？他得想办法说服传统企业跟他合作，他自己再往下走的生命力其实不够了，这是我的判断，所以我从去年开始在筹备和安排布局了我这家公司怎么样去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开年一开始就拆出四大创新平台出来，包括农村互联网金融，包括养猪服务公司，

包括食品控股投资公司，也包括我企业成立的创业实业集团，我做这个的目的就是我才的理解，我要打开我自己所有的东西跟所有的企业来互联，因为你肯定要来找我了，因为你不找我，2.0 时代你的互联网企业也该焦虑了，我实际是这样来判断的。

CE：具体来说，您所谓的 2.0 时代会有哪些核心变化？

陈春花：2015 年我称之为 2.0 时代的开始，我用了两个词来表达，2015 年的核心变化，一个是行业的本质会变，所有行业的本质会变，都要求成为规模增长，或者是盈利的增长，或者是我们讲的产业的增长，可能转化为用户的增长，我们讲的数据精准的理解，还有资源的有效使用，就会转成这个方面，转成这个方面的时候，其实所有东西都会改变的，所以这叫质变，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叫量级增长，所谓量级增长不再是线性，我们以前的习惯是企业今年比去年增长 10%，或者企业比去年增长 200%，其实这还是一个线性，不管你是几何基数的，还是非常微小的，或者你下滑 10%，或者 20%都是线性，2015 年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是量级增长，量级增长它不是线性，它会突然间一个数量级的改变，是非线性的，就像柴静的《穹顶之下》一天五千万注册观众户，你说他会不会有下一个五千万了，不知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来。

CE：农牧行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

陈春花：2014 年之前我对农牧行业的判断，我回到农牧行业到现在，我一直判断农牧行业最大的变化其实是评价体系变了，以前是农民评价农牧企业，现在是终端消费者食品消费者评价农牧企业，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比如说以前你饲料好不好，农民在说，现在是说你养的肉安不安全，这个评价体系变了。第二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都是我称之为“公司+农户”，都是这种方式，这实际是养殖方式的模式决定我们的经营，但是今天来讲，我当时也调了公司的战略，我对这个变化的判断，其实现在是这样，我称之为叫“基地+终端”，你的生产基地一定是能够对接到终端去的，这个实际是很大的变化，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进口产品，因为它是产地的概念，我们会认为可靠性够，这其实是第二个改变，以前我们没有考虑，我们只讲公司+农户，把东西生产出来就好了，但是今天必须改变，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变化实际是商业模式的变化，整个农牧行业企业都要找寻新的商业模式，包括你对消费者的理解，对国际市场的理解，对市场的理解都要做调整，这些是 2014 年农牧行业的变化。

CE：其中的变革因素是什么？

陈春花：这背后的变革因素第一个肯定是消费者认知变了，以前的消费者你肯定也有经验，我们以前的消费者没有对这件事情看的那么重，我们只是把肉买回来就可以了，或者把食品买回来就可以，但是我们今天都会关注它安全不安全，它的产地，这实际是消费者认知的改变，这也跟大家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有关系，也跟信息沟通的透明化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第二个变化的原因我们农牧行业本身产能过剩，其实就跟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产能过剩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饲料这个行业在 2012 年是全行业需求量在下降的，需求量如果在下降的时候，你要讨论的不是能不能把你的饲料做增长的问题，而是想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它改变之后要应因做变化，就不能用原来，原来我们增长因为行业在增长，就像中国经济三十年一直在增长，所以中国企业一直在增长，而我们现在调整了新常态，你就会发现很多企业活的很艰难，甚至有很多企业实际是被调整了，实际是行业变了，行业变了你这个企业发展就要做出调整跟变革，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整个市场格局也在变，比如说养殖环境的改变，他也是在变，比如说国家的一些宏观政策的调整，国际的原料和国际的企业他进中国市场，整个市场格局在变，这个市场格局在变你肯定也是要变的，所以我跟我的同事讲说，现象不是本质，本质是世界变了，你看到我让你变革，这是

一个现象，而且调整过程当中你很痛苦，但是这个不是我想让你痛苦，而确实本质上世界变了，唯有我们去变，这是主要的原因。

CE：你刚才提到“经济新常态”，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词，您怎么看“经济新常态”？

陈春花：所谓的新常态，一个核心的标志就是增速下来，其实这个词是针对以前讲的，以前我们确定为 GDP 平均增长 10% 的时候，告诉大家说 GDP 增长 10% 将成为常态，这是一个常态，所以我们就有了前面三十年一直 10% 的增长，现在我们知道不太可能做到这个，所以就来了一个词新常态，其实是对应那个说的，新常态的意思是我 GDP 的增长调下来了，调在 7 左右，这个词我认为是这么来的，时时常态，新常态是调回中速也是常态，一个是高增长的速度，一个是中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新常态我的理解这个概念的来源。

新常态从我的角度来讲，如果真的要理解这个新常态，核心应该是这几个，核心是等于方式要变，在常态的增长方式其实就是随着环境的增长持续增长部分就行了，什么都涨所以才会有实，今天来讲新常态下，等于增长方式变了，比如第一个新常态的变化，你会发现产能多过剩，你会发现你的增长机会不来源于扩产能增加规模，肯定是来源于产能的结构调整，这不就增长方式变了吗？也就是说产能过了，肯定是淘汰落后产能，拥有先进产能的企业才会增长，这是一个淘汰的过程，不是以前的大家一起涨的过程，这个就变了。

第二个我觉得新常态的很重要的特点是它要用技术创新来获取增长，我们以前实际是资源投放获取增长，你现在必须要用技术创新来做，你的增长方式也是要变的，第三个说你应该真正的做整合和融合才会有机会，而不是你自己去做发展，因为它增速下来的时候，很多的资源其实都变成了有效性的问题，你不能浪费，你不能随便去投放你的资源，一定是有效的使用这些资源，不是粗放的，所以我觉得是变了你的增长方式，一个是结构调整获取，一个是用有效的资源去用来获取，就是用技术创新来获取，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可能通过投放资源，扩大规模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CE：您在过去二十年研究过五家企业，您刚才说这个世界变了，所以企业包括这五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也面临这个世界的变化。尤其是过去这两年，您对他们的变化的体会其实是很大的。

陈春花：是，我觉得他们非常好的地方，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因为研究去跟踪一个企业的话，当然这个企业一直活着才行，所以我当时在 1992 年到 1994 在筛选这些企业的时候，是花了很多功夫来筛，从三千家企业不断的筛出他们五家来。

CE：而且要在不同的行业。

陈春花：对，当时还没有行业的范围在那儿选，实际上当时最强的行业在家电，所以在家电里我选了两家，我当时考验一个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不同的行业，还有一个是国营非国营，我是从三个纬度选的，因为中国当时的企业业态就有这三种，我就选出这五家来，这五家用了蛮长时间来选，从三千家里面筛出来，筛出来之后我就跟踪十年的数据，从 2002 年之前是跟踪十五年的数据，同他们一九八几年就开始跟踪，因为我们国家真正有企业历史，市场概念下的企业历史，从我感觉应该是从 1984 年，1985 年左右开始，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起点，我们常常叫做企业的改革元年，我们改革是在 1978 年，但是改革元年是在 1980 年到 1985 年，前面这十年，那时候会诞生出一些企业来，所以我的跟踪数据是往前推，前面那一段是十五年的数据来看，这五家企业为什么领先，我本来想研究它们为什么优秀，但是从优秀的企业来要求他们，当时我认为他们没有做到，所以我就发现怎么研究它领先，就它比别人跑的先。

这五家企业当时我觉得它们给我的共性的地方，比如它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人，这是一个，我把称为英雄领袖，像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谢企华（当时宝钢）的，李东升，这些英雄领袖，第二它们有一个共性都是用西方的标准来管中国的企业，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理念西方标准，我们很多中国

企业都会觉得西方的管理东西，我们不好用，因为中国国情不同，但是他们这五家企业不这样，我管理就是刚性，我不考虑这个，但是我又能照顾到中国人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是他们做的特别好的。

第三个它们都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很会卖东西，叫渠道驱动，我们以前中国企业品牌的历史不够，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成，我觉得他们会卖，我觉得中国企业很厉害的会卖东西，这是他天赋的一部分，所以像阿里巴巴出现，我觉得也很正常，确切讲也是卖东西，做贸易做交易，就是这个特点，所以它很会卖东西，我叫渠道驱动，不是品牌驱动。

第四个特点是他们去建了利益共同体，这是他们能够领先的四个特点，这是在前一个试点，2002 年到 2012 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十年跟前一个十年有一些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来，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2001 年我们回到世贸，2002 年开始打开中国市场。

你的市场被全球打开了，你做不做国际化是别人来，就像我现在说的市场格局变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其实这个十年跟前一个十年来讲是更特别的，更特别的是他遇到两次巨大的挑战，当然还有第三个巨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新技术的替代，其实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出来了，这个十年实际是对企业的挑战更巨大，我就很关心这十年它们又怎么样，所以第一本书叫《领先之道》，第二本书还叫《领先之道》因为他们还是在领先，还没有回到我说的优秀上，我第二本只是修订版，改写了三分之一，把那十年的三分之一东西拿掉，再讲它这十年又干了什么东西，这十年我觉得这五家企业还是很棒，他们还是在领先的位置上，甚至有一些已经是绝对领先，比如像华为，成了这个行业的绝对领先，不仅仅在中国领先，在全球也已经领先，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发现，这十年当中，我看这些企业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所以新的领先之道把他们做的东西告诉大家，比如说第一个都是能够面对这个变化的企业，比如说他们没有固守他的经验，而是不断的做自己的改变。像海尔他花多大的力气在做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企业转型，用张瑞敏的话讲，我八年来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他们在做的。他们一直在变，这是第一个特点，他们能够接受变化，而且去面对变化，第二个特点是这五家企业都有非常强的危机意识，非常强。任正非你看他的文章，会发现他一直讲的都是危机，他都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反思，张瑞敏也是一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你也可以看到柳传志他的反思和反省，李东升自己遭遇了 2008 年危机之后和 2006 年国际化挑战，所以他就提了一个鹰的重生，你会看到这些企业是非常强的危机意识，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我觉得他们都有能力去在失败中获取价值，比如说李东升的国际化，其实是让他在 2006 年非常的痛，他也是第一次出现下滑，亏损很大，但是他通过这个理解了一个企业怎么样面对国际市场，怎么样做好他的业务战略调整，你也看到联想在 2009 年的时候，也遇到了历史上一次很大的亏损，因为他购并了 IBM 之后，所以柳传志重新回来当董事局主席，这些我相信华为来讲，让他打国际市场的时候，也遭遇很多很多的冲击，所以他才让自己一定要拥有技术，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有能够把华为的狼性文化改成非狼性的文化，这些都是他们从失败当中能够学习的能力，所以我认为第三个他们的能力是让失败变得有价值，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共性。

第四个我觉得他们很强的地方，其实就是像优秀的企业，国际优秀的企业去学习，而且和他们合作，在合作当中超过他们，比如说联想，我一直觉得联想很厉害的，比如说他一开始跟惠普然后超越，跟 IBM 合作学习超越，现在我相信他肯定是像苹果学，我们知道华为就更典型，向 IBM 学习，把爱立信变成他的标杆，终于在 2013 年把它超过，今天他会把微软、谷歌、苹果作为他的学习对象，当他出手机的时候，他也有能力在智能手机市场成为一个强者。这一类的企业它的第四个特点总是跟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去合作，向他学习，并超越它，我觉得这是他们第四个特点。

最后一个特点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上上下下都去做创新，我称之为叫全员创新，宝钢就有一个蓝领创新计划，华为整个公司就是一个创新的血脉，海尔现在做人人是创客，你会发现这

些东西都是他们的特点。我觉得在这十年当中，他们还是保持住了领先的为主，而且成长的更强大，我觉得跟这五点有关系，我当然还要再持续研究他 2012 年到 2022 年，我自己的计划是三十年的研究计划，我设了这么长的一个计划，我觉得企业要经历过几次大的环境和技术改变，你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活下来，像柯达这么强大的企业，数字技术出现就淘汰掉，摩托罗拉这么强大的企业，也是数字技术出现淘汰掉了，像诺基亚这么强大的企业，互联网技术出现把它淘汰掉了，所以一定要经历过一些技术的替代才能检验它，还有一个要经历过经济的周期变化。

2008 年当时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写了一本书叫做冬天的作为，我当时跟他们讲，其实这是中国企业可能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就告诉他说，在环境不增长的时候，其实你依然可以增长，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冬天的作为》，那是我历史上写的最快的一本书，因为一出来，我们实际是 2008 年的 9、10 月份才知道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影响到中国实际是 2008 年底，我们才真切的感受到，我这时候启动写这本书，三个月写完，一个月上架，这是我历史上最快的一本书，出版社也用最快的速度匹配，这本书确实帮了非常多的企业，我当时印象很深的万达在那一年要求内部读书，推荐的书就是这本书，很多企业给我打电话，要我来讲给大家听，我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到 2008 年突然意识到环境不长，甚至有可能是负增长，这时候你企业真的面对考验，所以在我今天看来，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的替代对大家的考验，还有新常态是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大家的考验，这两个考验都要经历，才知道这个企业的能力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才能活下来。

所以我设了一个三十年的研究周期，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都走完了，第三个十年我来看看他们还会怎么样我相信到那个时候还是会有一本书跟大家讲，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五个企业研究，我所关注的一些话题。

CE：这个十年，其实对中国企业来说是有更多的机会，全球的预测都认为未来，包括到 2050 年，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然后是印度，欧洲会衰弱，中国企业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下会面临什么样的机遇？

陈春花：是的，我相信经济的发展，一个方面原因是技术推动，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原因，其实是消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预估中国和印度接着下来，因为这两个地方的人口数最大，你有一个最大的人口数，其实你就有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不需要怀疑。

但是核心在于这个机会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因为这个市场变成全球市场，所以我个人认为，机会是我们的，问题机会你能不能真的拿到，所以我对企业的变革，转型，包括我去研究这五家企业，持续的跟踪，总结他们的经验告诉大家，其实还是取决于企业自己。

作者：夏天怡

来源：前瞻网（2015-3-14）